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9期 2019年6月

研究論文

- 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
- 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

研究誌要

- 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
以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為例

歷史與現場

- 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

書評

- 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
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普通媒介學教程》

學術翻譯

- 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國報紙建構的歐盟移民形象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创刊

半年刊, 6、12月出刊

出版: 2019年6月 第九期

主办机构

媒体改造学社

编辑顾问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井迎瑞	台南艺术大学
王春泉	西北大学
王嵩音	中正大学
王毓莉	文化大学
史安斌	清华大学(北京)
吴予敏	深圳大学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
林元辉	政治大学
林东泰	台湾师范大学
林静伶	辅仁大学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学
胡光夏	世新大学
胡泳	北京大学
倪炎元	铭传大学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翁秀琪	世新大学
张志安	中山大学(广州)
张裕亮	南华大学
张锦华	台湾大学
张国良	交通大学(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学(新竹)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
单波	武汉大学
曹晋	复旦大学
刘海龙	人民大学
黄煜	香港浸会大学
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萧苹	中山大学(高雄)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建三	政治大学
编辑委员	林富美	世新大学
	林丽云	台湾大学
	陈光兴	交通大学
	罗世宏	中正大学(执行编辑)
助理编辑	刘忠博	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

发行人 媒体改造学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号
3 楼之 3

电话 (02)25221499

传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网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黄匀祺

封面设计 冯议彻

订 阅

零售: 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本刊采用创意公有授权条款, 如下



目次

编辑室报告：.....i

一般论文

台湾戒严时期的「假新闻」：〈南海血书〉案例.....邱家宜/1

中国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形成与内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内容分析为例.....刘忠博、陈娟、邵成圆/31

研究志要

数字时代的国族认同建构研究：

以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为例...杨稼民/63

历史与现场

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艾晓明/87

书评书介

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

评介德布雷的媒介学与《普通媒介学教程》.....唐士哲/123

学术翻译

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国报纸建构的欧盟移民形象

.....童静蓉、左岚东着，吕慈芸、黄仁禧译 / 罗世宏译稿校阅

(详见本期编辑室报告说明)

稿约

稿约详情请见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编辑室报告： 民族主义 / 国族认同的形成与建构

本期围绕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及 (或) 国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等相关主题, 汇集了五篇论文 (包括两篇研究论文、一篇研究志要、一篇历史与现场, 以及一篇学术翻译论文)。此外, 与往期一样, 本期也有一篇深度书评。

邱家宜博士的〈台湾戒严时期的「假新闻」:〈南海血书〉案例〉一文,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重新检视 1970 年代末期的「南海血书」事件, 挖掘当年威权体制党国宣传机器如何操作某种「亡国感」的焦虑, 意图透过渲染民间恐共心理来削弱台湾政治反对运动正当性与社会基础, 力求达到「维稳」之统治目的之历史过程: 权力永远拒绝真相被解码, 为了政治目的, 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制造人民的同意、共识, 或甚至是某种爱国情绪或国族认同。虽然分析的是历史事件, 但对「假新闻」现象成为社会与学术议题的当下, 既有反思历史的意义, 也深富观照现实的意义。

刘忠博教授、陈娟教授与邵成圆博士候选人共同撰写的〈中国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形成与内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内容分析为例〉, 以中国大陆「爱国网红」周小平 (批评者谑称其为「周带鱼」) 的网络文章为分析对象, 发现其中夹带某种「爱国网红民族主义」, 而这种特殊品种的民族主义又恰恰是受到官方鼓励的产出。本文指出, 周小平所代表的这种民族主义, 是一种「维护既有政权的民族主义」, 对内是「护党爱国」, 对外是「反美批日」。这种紧贴党国权力、鼓吹「正能量」与显然是内外有别的操作, 成为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民族主义。

国族认同建构的研究, 在数字时代有何不同? 在〈数字时代的国族认同建构研究: 以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为例〉一文,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杨稼民分析两本学术期刊近二十年刊发的研究

论文，希冀探知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的趋势、特征及理论发展。他的分析发现，相关研究论文较少对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理论关系进行探讨。杨稼民建议，从文献中提炼出的若干概念，例如「去地域化」、「虚拟社区 / 国家」、「网络的文化亲密性」、「文化的空间化」与「数字资本主义」，或可对数字时代的国族认同建构研究提供新的考察方向。

第四篇论文 - 〈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 - 的作者是艾晓明教授，她不仅是中国大陆知名学者，也是享誉国际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这篇她在 2018 年花了两个月阅读与观影、来年又重新修订的思考与书写成果里，艾晓明谦称这是她「读杨·T·格罗斯的《邻人》及相关影片笔记」。说是笔记，但其实已经自成相当完整的体系，本文带领读者深入解读的不仅是历史与现场，也涉及历史记忆与纪录的理论与方法，并延伸至纪录片影像的对话。

编委会高度推荐读者艾晓明这篇文章，也推荐读者观看她在 2017 年完成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与《邻人》这本书在 2000 年出版时探讨的是 60 年前发生的波兰小镇犹太人屠杀事件一样，【夹边沟祭事】直面发生在 1957 年中国「反右运动」期间发生的人权迫害惨剧：夹边沟是甘肃酒泉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1957 年有多达 3 千名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劳改，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被迫从事密集劳动，最终纷纷在饥寒交迫的非人待遇下死亡，幸存者只剩下 300 人左右。

经过 60 年的缄默，当年幸存的夹边沟受难者目前已是寥寥可数。5 年前的清明节前后，艾晓明在偶然的机缘下前往夹边沟农场祭拜当年死去的受难者。其后，艾晓明克服各种阻挠，几度走访夹边沟及附近的几个劳改农场，并在各地访问了幸存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留下了珍贵的影像纪录。可惜的是，多位受访的老人来不及看到最后完成的纪录片即已陆续辞世，而迄今能看到这部片子的大陆民众可能也很有限：不仅百度上难以搜到【夹边沟祭事】的超链接，相关页面也很快就被删除。

50 岁以后才开始边学边拍纪录片的艾晓明，用这部纪录片祭奠历史苦难，是为了不遗忘。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记忆就代表着一种反抗，因为极权的巩固与张狂，正是从人们的遗忘开始的。

而过去几年来发生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以及大量移民跨越疆界涌入欧洲的现象，也触发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媒体和民众的多重反应，排外 / 仇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方兴未艾；媒体如何再现移民形象，厥为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洞察媒体如何建构欧盟移民形象，本期原另拟刊发童静蓉教授与左岚东合撰的〈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国报纸建构的欧盟移民形象〉一文，这篇原以英文发表，经作者同意由吕慈芸、黄仁禧译为中文的论文，因为英文期刊出版商的版权政策，我们无法将中译版公开上网；对本篇论文中译版有兴趣的读者，欢迎主动与本刊编委会联系。

最后，读者也千万不要错过本期的深度书评。唐士哲教授以〈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评介德布雷的媒介学与《普通媒介学教程》〉为题，不仅介绍法国媒介学大家德布雷（Régis Debray）其人其事，更深入解读了他的思想轨迹和《普通媒介学教程》一书，读后应有不同于、或甚至是超越主流传播理论思维框架的知识启发。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19年6月23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台湾戒严时期的「假新闻」：
〈南海血书〉案例
邱家宜*

本文引用格式

邱家宜 (2019)。〈台湾戒严时期的「假新闻」：〈南海血书〉案例〉。《传播、文化与政治》，9:1-30。

投稿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

* 作者邱家宜为世新大学兼任助理教授，e-mail: eve59chiu@gmail.com。

《摘要》

1978 年 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副刊刊載據稱為逃離南越途中罹難難民阮天仇絕筆信的〈南海血書〉，該信事後證明為署名譯者的朱桂所虛構，當時正逢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興起，〈南海血書〉問世，透過媒體、學校、機關全面推廣閱讀，「今天不做反共鬥士、明天成為海上難民」成為當時流行的政治宣傳口號。執政者透過「血書」內容，成功將南越陷共與陷共前南越人民對阮文紹政府的反對與抗爭連結在一起，明確影射當時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將會導致與南越相同後果，透過民間恐共心理，意欲削弱仍處於萌芽階段之政治反對運動的正當性與社會基礎，力求維持國府政權穩固。針對這個台灣當代新聞史上有名的「假新聞」事件，本論文將從知識社會學角度，探討當年黨國文宣體制的綿密運作，如何運用國內外情勢與社會集體心理焦慮，以虛構的故事為引爆點，操作出掀動整個社會的風潮，塑造成如假包換的「社會真實」。

关键词：王升、朱桂、社会真实、南海血书、假新闻

壹、前言

「假新聞」(fake news) 这个字眼最近几年非常火红，由于一些研究者指出，刻意制造、迅速散布于网络的不实消息，影响了几场西方民主国家的重要选举结果，尤其是 2016 年希拉瑞·柯林顿与唐纳·川普的竞选结果，被认为足以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使假新闻问题顿受全球热议。因特网可以瞬间跨国流动，去中心化的讯息产出特性，似乎使得越是讯息自由的地区，越容易受到假新闻的侵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因特网被严密监控的地区（中国、朝鲜）在政府的屏蔽与控管下，虽不像自由民主国家那样，受到来自境内或境外（例如俄罗斯、马其顿 Veles 小镇）的假新闻攻击 (Subramanian, 2017, February 15)，但控制讯息流通的政府往往本身就在系统性的制造假新闻。

其实所谓「新出现」的现象，未必真的那么新。当我们稍微回顾过去，会发现「假新闻」并非起自今朝，而是有其渊远流长历史（罗世宏，2018，页 53-54）。国家或当权者集中化、系统性制造假讯息来控制人民、稳固统治的历史阶段并未完全过去；在全球化的网络链结基础上，着眼于国际对抗或个体牟利动机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虚假讯息的产制与传播又方兴未艾。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大众传播媒体做为传递信息与形塑公众认知的重要机制，为近世人类历史上显著现象。政治史家班乃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即指出，十九世纪以降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密切 (Anderson, 1983)。看似每天内容翻新的新闻媒体，其实扮演不断重复提醒其读者对国族界线、社会群我关系、自我认同归属的参考框架，甚至在社会因冲突纷扰而出现整合认同危机时，发挥修补裂痕、再整合的功能。

传播理论家凯瑞 (James Carey) 则跳脱上述的涂尔干式 (Durkheimian) 功能论观点，虽然同样强调媒介的仪式性，但却是从掌握权力者即掌握媒体话语权的批判性角度来审视媒介的仪式性 (Carey, 2009, pp. 15-17)。从凯瑞的观点出发，掌握权力者所具有的话语权，包括对所要散布传递之讯息的筛选、诠释，甚至制造。当权力高度集中，讯息传递的方向就会从权力集中的

一端流向另一端，1978 年年底到 1979 年間發生在台灣的「南海血書事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貳、「南海血書」的出現及其背景

一、「血書」的出現與社會回響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將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隨即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宣布台美外交關係中斷，並立刻停止當時正熱烈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競選活動。¹三天後的 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副刊刊出一篇文長三千多，名為〈南海血書〉的文字，這篇署名「阮天仇絕筆（朱桂譯）」的「血書」，描述一群南越難民漂流荒島、食飲難友血肉後飢渴而死，最後一人死前以鮮血在襯衫上書寫，留下恨極共產黨統治，並痛斥南越陷共前其境內反政府運動，及執政者仰賴美國卻終遭「偉大盟邦」背棄的這封「血書」。

此「血書」後來被證實是一文學性虛構文字，但在當時台灣社會，大多數人卻以其為真實，並掀起席卷全島的風潮。除《中央日報》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開始發行單行本，隨即不斷再版重印。當時台灣的各級學校均「自動自發」要求學生閱讀該「血書」，並以撰寫心得（朱復良，1979 年 1 月 9 日；〈各校紛以「南海血書」作為愛國教材教育廳認意義重大〉，1979 年 1 月 12 日），改編成舞台劇演出（嵇若昕，1981 年 4 月 27 日；〈復興高中禮堂今明公演話劇〉，1979 年 10 月 28 日）等種種方式來推廣。透過學校體系大力操作推動，大多數於 1960 年代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的人，對這封「血書」都印象深刻。直到 20 多年後，當 2001 年 9 月 3 日【民視異言堂】節目

¹ 當時的中央民代選舉並非改選立法院全部的委員成為另一屆次，而是基於維護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地區的「法統」，仍繼續 1948 年的屆次，稱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增補選，保留中國大陸其他各省立委席次（去世者由候補者遞補至無人可遞補為止），只「增補選」台灣地區立委名額。該次選舉為第三次增補選，因台美斷交以及隔年的美麗島事件，而一直延後到將近兩年後的 1980 年 12 月 6 日才舉行。

播出「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時，²許多小時候曾經撰寫閱讀心得的台灣觀眾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封「血書」竟然是虛構的，「血書」的作者「阮天仇」，其實根本不存在。

雖然早在 1979 年 6 月，當時擔任台北縣蘆洲國中教師，後來成為民進黨重要理論家的林濁水，就已經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創刊號上，對「血書」的真實性提出犀利質疑（林濁水，1979），但或因黨外雜誌流通受限，在當時並未影響「血書」在台灣社會中如火如荼的散布。

林濁水在這篇〈拙劣的南海寓言——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中，判斷「血書」為虛構的幾個證據包括：在飢渴中苦撐四十二天的臨終之人，竟能以螺絲尖這種不吸水物體沾血在不易書寫的襯衫上完成三千字長篇？越文為拼音文字，所需書寫面積比中文更多，寫成此篇內容恐需十件襯衫面積，要用鮮血在髒污的襯衫上如此書寫，會用掉多少血，一個瀕死者會有如此多的己身鮮血可用于書寫嗎？「血書」中對 1959-1963 年間越南總理吳廷琰當政時期南越社會物質條件的描寫與事實不符，倒像是对當時台灣社會歷史經驗的描述，顯然是要以反對吳廷琰獨裁的南越「民主鬥士」等「野心份子」，來影射台灣當時正在興起的黨外反對運動，明顯「指桑罵槐」（頁 46）。除了「血書」附記中所提到的「血衫」這個重要證物，在舉國閱讀「血書」的風潮中，始終未曾出現；林濁水還發現，「血書」中竟然出現跟許信良在「中壢事件」（詳見後文）後所說的：「我們真像他們說的『永遠只有十三歲』」一模一樣的句子。種種巧合，都證明這封神秘「血書」事實上是「要寫給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看的！」（林濁水，1979，頁 47）。

該文對於「阮天仇」所形容，让其痛恨到能「活着咬他一口，死也甘心。」的「偉大盟邦」的描述，也做了如下詮釋：

因為國民黨散布謠言說美國人用美鈔資助黨外人士競選，所以阮天仇就說：「不要讓「盟邦」以大使館為司令台和庇護所，運用大把鈔票，收買野心份子。到處製造事端。」…甚至於以激動的情緒說：「我

² 【民視異言堂】從 1998 年 8 月推出以來，一直是民視最重要新聞性節目之一。本文所引述的兩個單元，是由民視記者高人傑、李惠仁所製作。

们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点颞顽，官吏难免贪污，人民不像传说中的美国那么自由，但绝大多数的越南人民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渐进步。只是野心份子极少升官发财机会。」（林浊水，1979，页 48）

林浊水认为，综观「南海血书」通篇，控诉越共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论罪矛头是指向「民主斗士」与「伟大盟邦」。「血书」的寓意是：既然南越殷鉴不远，台湾自救之路就很明白了。只要打倒「民主斗士」（其实就是党外人士），打倒「盟邦」（美国），就一切都解决了（林浊水，1979，页 49）。林浊水认为，〈南海血书〉最大的目标，是丑化党外人士。

二、作者朱桂的证言

如果说林浊水 1979 年 6 月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对〈南海血书〉真实性的质疑，那 2001 年 9 月 3 日【民视异言堂】播出的「南海血书」、「南海神话」两个单元，就是对〈南海血书〉历史之谜的真相还原。这两个单元的内容后来被剪辑成纪录片【1979 南海神话】，并获得 2001 年台湾的「90 年度文建会纪录像带奖」佳作奖。

2001 年距离台湾解除戒严（1987 年）已经十四年，台湾已经历第一次政党轮替，但当年这篇深植人心的〈南海血书〉事件依然真相未明。其实说「真相未明」，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血书」刊出的一年后，《中央副刊》曾经刊出署名「仲父」的短文，以编者身分表示：

「南海血书」像一枚投掷在油海里的燃烧弹，与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相起伏，构成一个悲愤壮烈的伟大场面；去年这几天，要求转载翻印的电话不知凡几，而张贴的墙报还不算。身为编者，为了应付这种感情的浪潮，不能不知道得多些，以便回答四面八方的询问，于是写信给朱桂先生，把他由基隆请来。朱桂先生说，「南海血书」是一部小说的书名，已写好久了，在中副发表的这篇「南海血书」乃那部小说的最后一章。所根据的资料都是真实的，写出来的故事、人物、情

节，却是由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再创造出来的典型，所以它的真实性，侧重在文艺方面，因为它是文艺创作；不在新闻方面，因为它不是新闻报导…（仲父，1979年12月19日）。

依据这篇短文，《中央副刊》其实已经公开承认〈南海血书〉是「文艺创作」。不过很吊诡的是，中副的说词前后反复，或者说已经造就的「社会真实」太难违逆，直到五年多之后，《南海血书》单行本仍继续贩卖，在该刊登出的「好书介绍」中，依旧说「血书」是由朱桂翻译，阮天仇用自己的血写在衬衫上的绝笔信而成（嘉彬，1984年10月27日），却完全不提「仲父」在1979年的编者告白。³

根据制作这个专题的民视记者李惠仁回忆，⁴当时他与民视同事高人杰一起调查此事，但只有「朱桂」这个名字是唯一的线索。他们于是把当时台北市的电话号码簿中，所有登记为「朱桂」的电话号码一一拨打，发现住在虎林街的朱桂，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在电话中提出造访的请求被拒，但两位积极的记者并不死心，他们跑到朱桂家附近，在市场买了一篮水果，背着摄影器材就直接按铃求见。

受访时已经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朱桂，在影片中直接了当的回答记者提问，承认〈南海血书〉是他写的。说他写「血书」是「根据当时的情势」，「那是越南难民所遭遇的，把几个故事连在一起。」记者问他为何会想到用「阮天仇」这个笔名，朱桂回答：「天怒人怨啊！越南人姓阮的多啊！」（高人杰、李惠仁，2001，08:55 - 09:33）当事人现身说法，历史谜团终于解开。

³ 「中央副刊」在「血書」問世一年後刊登這篇短文，顯示當時對「血書」真偽確實存在爭議。但此「告白」動作顯然並未發酵，根據作者以「南海血書」關鍵字檢索《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資料庫發現，直到李惠仁、高人傑的影片問世之前，提到血書為「文藝創作」的，仍然僅有「仲父」此篇。

⁴ 李惠仁後來離開主流電視媒體成為一名獨立記者，2011年以揭發農政單位隱匿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I】(2011)獲得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其他重要的作品包括【睜開左眼】(2009)、【不能戳的秘密II：國家機器】(2013)、【蘋果的滋味】(2015)、【并：控制】(2018)等。2018年獲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頒發「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是一位優秀的調查記者。此處所引述內容，為李惠仁本人親自口述。

1979 年 7 月，也就是「南海血书」问世后 8 个月，朱桂出版了他的文集《历史圈外》，在这本写实与虚构并置的文集最后，饶有寓意的，以附录的方式收录了这篇〈南海血书〉。对照刊登于「中央副刊」的版本，这篇附录文字虽在文末仍保留「阮天仇绝笔」字样，但并未如在中副刊登时标明为「朱桂译」。两者间的不同还在于，中副版本最后的「译者附记」，并未出现在文集版本中。「译者附记」是这样写的：

内弟有一天到南海打鱼，在一个荒岛上发现十三具尸骨，和一堆大海螺壳，这份血书就装在该海螺壳里。字迹模糊，我只将其大意揣摩着翻译出来。际此美国对我背信毁约，与共匪伪政权搞「关系正常化」，越南人民的血泪未止，卡特政府今后势必更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了。

如果这段「附记」并不是朱桂所写（证据是前述附录文字并未收入），应可合理假设为中副编辑所加。

仅仅一百多字，这个「附记」却成功的把一篇文学作品伪装为纪实文献，将朱桂由作者变成译者，将「血书」由虚构变成真人真事。虽然朱桂在个人文集收录〈南海血书〉时，将「译者附记」拿掉，等于间接否认此「附记」是他的作品，而将「血书」还原为文学写作。但在此之前的 1979 年 5 月间，他仍一度对外表示，自己保留有据以完成「血书」的难民遗物，并批评以「血书」为题材的电影拍得太烂（〈大好题材被人粗乱拍 南海血书作者表惋惜〉，1979 年 5 月 15 日）。不论他当时是依照计划，或者配合局势发展演出，可以确定的是，虽然「血书」的真实性已被质疑，但在 1979 年底「仲父」的文章出现之前，主事者的规划显然是要将「血书」操作为一个真实文件。

「阮天仇」是虚构的，但朱桂则真实生存于近代的中国及台湾。根据国史馆档案所保存的一份，包含由朱桂本人所填写之自述的〈总统府人事调查表〉记载（〈朱桂〉，国史馆藏），朱桂于 1921 年（民国 10 年）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县，1941 年 8 月加入国民党，1943 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该年 9 月进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地方自治科就读。

原为国民党党校的中央干部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于 1946 年合并改制为国立政治大学。根据政大官网上的校史资料，中央干部学校系创立于 1944 年，较朱桂在数据表中所填写的 1943 年还要晚一年。但政大官网亦记载：「中央干部学校的创立，缘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在此之前，三民主义青年团曾设立青年干部训练班于武昌珞珈山，是为中央干校的前身。」因此，朱桂应是在训练班时期进入该校。朱桂就读中央干部学校期间，蒋经国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校长则是蒋中正（茅家琦，2003，页 111）。1946 年 7 月毕业后「复于庐山参加夏令营，并一度从军」。⁵从其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庐山夏令营的学、经历可以看出，朱桂的背景可说是血统纯正的蒋氏父子子弟兵。

因此，虽然无法确定朱桂登在「中央副刊」的这篇「血书」，究竟是自发性投稿，还是受邀而作，可以确定的是，朱桂当时的身分虽然是一名教师，不是军人也不是政府官员，但他过去曾跟随蒋经国办事，在总统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的人事档案中，存有他的个人资料。由这些线索看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所培养的朱桂，后来会成为「血书」的「地下作者」，似乎并非偶然。而「血书」的出现，只是整个国府政战系统，在面对当时台湾剧烈变动的内外政治社会情势，为稳固政权所采取的全面文宣策略的一环。

⁵ 從現藏國史館的該筆資料看來，朱桂從 1947 年 8 月開始在上海擔任中學教師（私立正誼中學），並在 1949 年 1 月到台灣的員林中學教書，因此他所說的「一度從軍」，應該只有 1946 年到 1947 年間。根據【1979 南海神話】影片中旁白敘述（09:40 處），以及李惠仁的轉述，朱桂受訪時曾對記者談到，自己年輕時曾經追隨當時擔任贛南行署專員的蔣經國，在江西「打老虎」，不過此說應該存疑。因為如果此一說法屬實，只可能是他在重慶中央幹校就讀時，就曾經前往江西協助過當時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的蔣經國（當時蔣經國經常往返於贛南與重慶間），因為蔣經國在 1945 年二月間，朱桂從中央幹校畢業之前，就已經奉蔣介石之命，離開即將淪陷於日軍之手的贛南，轉往重慶了（茅家琦，2003，頁 108-109）。但他與蔣經國的淵源還有另一個線索，根據朱桂在追悼摯友朱延勳的〈我與延勳〉（朱桂，1979，頁 65-206）一文中指出，1948 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上海經濟管制行列」（朱桂，1979，頁 194）。當時在上海主持這場與孔宋集團正面衝突之經濟管制的，正是蔣經國（蔣經國，1988，頁 45-165）。

三、「内外交迫」下的政治作战总动员

国府中央迁台后，台湾的在野政治力自 1960《自由中国》雷震案后，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邱家宜，2011），直到 1970 年代后期，台湾的政治反对运动才又开始浮上台面。1977 年 11 月 19 日，因桃园县长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作票，引发支持许信良的大批群众包围中坜警分局，并造成一名大学生遭军警射击死亡，是为「中坜事件」。「中坜事件」是之前分散各地，尚未组织起来的「党外」力量集结的开始，党外力量集结所形成的「类似政党」，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造成很大压力（詹嘉雯，2007，页 113-115）。

1978 年的台湾，除了内部政治反对力量逐渐成形，国府还要面对的是美国与中国建交的迫在眉睫。「南海血书」会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的三天后出现报端，并非偶然，可解读为国府在面对内外情势下，整体文宣战的一部分。具体的证据包括：就在中美建交与台美断交前后，也就是〈南海血书〉问世的前后，台湾当时仍在政治力控制下的三家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正在联播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监制，「中国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越高沦亡实录】纪录片，该纪录片是搜集世界各国新闻记者越南、高棉沦陷前后实地拍摄的影片剪辑制作而成。三台联合首播时间，在「血书」问世前的 12 月 4 日晚间九点到十点（〈越高沦亡实录 电视明天播出〉，1978 年 12 月 3 日），并于「血书」刊出的隔日（12 月 17 日），又分三种语言（台视闽南语、中视国语、华视客语），在比之前更黄金的时段（晚间八点到九点）回放（〈电视台明回放 越高沦亡实录〉，1978 年 12 月 16 日）。台北市新闻处之后也将该纪录片在新公园（现已改称「二二八纪念公园」）音乐台，以及台北市各小区中，免费放映给民众观赏（〈四部爱国电影 今晚开始轮映〉，1979 年 1 月 20 日）。

12 月 5 日，也就是三台联合首播《越高沦亡实录》的第二天，《联合报》第七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尼洛」的〈「越高沦亡实录」的播映〉，文中指出：

共产党在它统战的地区中，绝口不提它要宣传的共产主义，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地区的「内部矛盾」，这矛盾不外几种，如贫富间的矛盾，

地域上的矛盾，长官对部属间的矛盾，政府对民众中的矛盾等等，把这个地区弄成由内部不和而到内部斗争，一方面分散了对付共产党的注意，另一方面对消了一大部份的有望力量，说得不好听的，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手法，这个地区「亲痛仇快」的事情发生得越多，就是它的统战越显出了功效（尼洛，1978年12月5日）。

「尼洛」本名李明，政战学校一期毕业，是王升的学生（尼洛，1995，页19-23）。这篇评论的重点放在社会内部矛盾冲突，将会导致共产党势力扩张，与「血书」中「阮天仇」对南越陷共前，其社会中「民主斗士」与「野心份子」种种作为的控诉异曲同工。而这时，〈南海血书〉尚未问世。

判断「血书」是整体文宣战之一部分的另一个证据，是正当「血书」风潮卷起后不久，隶属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的《青年战士报》也开始刊登〈南海血泪〉系列报导。总共二十六篇报导，从1979年1月21日至2月22日，在该报5版逐日刊登了一个多月，并于连载结束五天之后的2月27日，就立刻发行了单行本（李元平，1979）。作者李元平中校当时是该报副总编辑，受国防部邀请，参加由新闻媒体记者与艺文界人士组成的参访团，前往设在澎湖白沙乡讲美村的越南难民营参访。⁶1979年1月18日，《青年战士报》3版刊出李元平从澎湖发出的〈越南难民浩劫余生，逃亡过程充满血泪〉，是最早刊登相关报导的新闻媒体（李元平，1979年1月18日）。文中指称「清风号」幸存难民在1月17日首度透露，受困荒岛时曾吃难友尸肉求活，并预告该报即将连载相关报导。如果说登在副刊的文章可以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登在报纸新闻版面的报导，就必须要根据事实。因此「阮天仇」的「血书」所尚未完全满足的纪实性，便由〈南海血泪〉的报导来接力完成。

比对当时与李元平一起前往采访的其他报社记者的报导，⁷可以发现，李

⁶ 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的越南難民營在1977年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成立。1977年6月16日有兩批越南難民漂流至屏東小琉球海域，為了安置難民，救總先是利用澎湖西嶼鄉繼光營區設立「越南難民臨時接待所」，後來進入台灣海域的難民人數越來越多，政府遂委託救總，於1978年12月1日在白沙鄉講美村舊軍營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劉吉雄，2013）

⁷ 依據李元平在2015年接受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訪問時的描述：「本來是國防部軍事發

元平的报导不但整体篇幅长达七万字，且对难民食人肉的过程与细节有更多具体描写。除了吃人肉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元平在好几篇报导中，都记载濒死的难民在临终前，针对南越陷共所发表的长篇大论。例如，他的报导中叙述第一个在死前主动同意让难友食其尸身的裴文政，在临死前对难友说：

我快死了，你们就要吃我所贡献的肉了，因此请相信我：国际上出卖与被出卖的阴谋诡计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懂得：那种怨天尤人最多的人，同时也必然是靠天靠人最多，而靠自己最少、责己最少的人。...我便临死绝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国家注定可以出卖别的国家，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别的国家的命运。除非那被出卖的国家、那命运被人左右的国家，他本身内部分崩离析、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凡事奴颜卑膝仰人鼻息，一切为别人之命是从的，这就另当别论（李元平，1979，页 98-99）。

在李元平笔下，另一位愿意捐献身体延长难友性命的伍维城在死前说：

就是因为自己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彼此争得你死我活，无视于大敌当前，才把我们的国家搞丢在共产党手中，男女老少，冒死逃难，为什么我们还不觉悟（李元平，1979，页 104）？

言人請了幾個文藝界作家還有新聞界人士，像是司馬中原、朱西甯、蕭颯、中國時報大記者傅崑成幾位，一票人從台北出發就到難民營。」（劉吉雄，2016）。同行的《中國時報》記者傅崑成在 1979 年 1 月 20 到 1 月 23 日也寫了系列報導，在總標題〈當為鬥士，毋為難民：越南難民訪問錄〉下的第四篇報導〈哭泣的珊瑚礁〉的近尾聲中，傅崑成以十分簡要的筆法，描述了難民為求生而食屍肉的情節（傅崑成，1979 年 1 月 23 日）。不過，後來傅崑成在受訪時，對當時情景的說法是：「我沒有訪問到哪一個人說他吃人肉，我不記得。」（高人傑、李惠仁，2001，19:40 處）。另一位也同團採訪的《聯合報》記者翁台生，則只在 1 月 19 日的《聯合報》3 版寫了一篇報導，文中對「吃人肉」情節的表達更為含蓄：「他們祭拜已故難友，而特別懷念其中的十位。因為在他們掙扎於珊瑚礁求生存時，這十位難友在不支去世前，答應用自己身上的肉延續生存者的生命。」（翁台生，1979 年 1 月 19 日）

已死之人的遗言应是由生者转达，荒岛既无纸笔，生还者的记忆是否真能将这长篇字句一一复原不无疑问。而「出卖别的国家」、「国家内部分崩离析」等种种论述，呼应「血书」中所控诉的「伟大盟邦」与「民主斗士」。

而就在该系列文章开始连载的当时，高雄县党外老县长余登发父子因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案被捕，引发了党外政治人物齐聚抗议的「桥头事件」。⁸桥头事件发生隔日，《联合报》的「黑白集」刊登不具名评论指出：「最近发生一位南部闻人涉嫌参与叛乱组织案件，这位闻人以『民主斗士』自居。令人联想「南海血书」和这篇血泪交织的血书所痛谴的越南『民主斗士』。」（〈「民主斗士」〉，1979年1月23日）这显然是把「血书」视为真实来引述。

在「仿真」的「血书」问世后，凭借对「清风号」生还者的采访，李元平曾也试图在他的报导中尉「血书」的真实性辩护，他说：

「南海血泪」连载完毕后，有许多读者想在文后附录的「清风号」一百四十六位难民名单里面，寻找「南海血书」的作者阮天仇，可是没有结果...在这里可以奉告关心的读者们：「血泪」是「血泪」，「血书」是「血书」，然而，是「血泪」也罢，是「血书」也罢，都各有其人，也各有其事。发生在南海上的难民漂流悲剧，情节有轻有重，有幸有不幸。并非「血泪」或「血书」便足以道尽（李元平，1979，页127）。

不过他在2015年接受纪录片导演刘吉雄访问时改口说：「我的报导就跟〈南海血书〉有所区隔。像林浊水有政治意见，他针对的是〈南海血书〉，不是我的〈南海血泪〉。」（刘吉雄，2016）

⁸ 「血淚」開始在《青年戰士報》開始連載的同一天（1979.01.21）凌晨，高雄縣的黨外老縣長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因涉及「吳泰安匪諜案」在八卦寮自宅被便衣上鈔帶走，1月22日，包括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林義雄、黃順興、邱連輝、黃信介、陳菊、陳婉真、胡萬振、何春木、曾心儀等黨外人士，都前往余登發故鄉高雄縣橋頭鄉進行示威抗議聲援余登發父子，是為「橋頭事件」，是繼「中壢事件」後，台灣黨外力量的又一次集結。

四、党报、军报、老三台与王升的角色

往前追索当时新闻媒体的报导，可以发现，「清风号」难民船相关消息最早出现在《中央日报》上的时间点，是 1978 年 12 月 13 日，也就是「血书」问世的六天前。当天该报三版使用「合众国际社」外电，编译成〈越南难民获救前在荒岛上 境况惨绝人寰 没有一家能完全活下来〉，报导中描述一批已经抵达澎湖的越南难民，在获救前曾受困珊瑚礁 42 天，也提到有生还者透露曾「吃人肉」（〈越南难民获救前在荒岛上 境况惨绝人寰 没有一家能完全活下来〉，1978 年 12 月 13 日），这些情节，后来都出现在朱桂笔下虚构的人物「阮天仇」所描述的自身遭遇中。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朱桂在看了这则外电报导后，发挥文学的想象，写就了「血书」；李元平则是在「血书」创造的热潮中，回头去报导「清风号」难民的遭遇，报导中不时借用已死之人的「死前告白」，呼应「血书」中对「伟大盟邦」与「民主斗士」的控诉，让本是虚构的「血书」，仿佛真有了事实的基础。还原此事经过可以看出，当年透过党报（《中央日报》）与军报（《青年战士报》）的联手合作，在台湾当时因为台美断交，许多人担心台湾前途岌岌可危而充满焦虑不安的社会氛围中，成就了此一跨越 1978 年到 1979 年的「南海神话」。

当年这场政治作战总动员的范围，还包括三台联播的连续剧《西贡风云》。根据当时媒体报导，国民党党营的中影公司原本打算将〈南海血书〉故事拍成电影，但后来决定改拍电视剧（〈电视剧「西贡风云」下月三日三台联播〉，1979 年 6 月 30 日）。⁹这部由三家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十集连续剧，从 1979 年 7 月 3 日开始在三台周二到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的黄金时段播出，¹⁰与〈南海血书〉问市相距已半年多。该剧是将〈南海血书〉与〈南海血泪〉

⁹ 〈南海血書〉後來還是被拍成了電影，出品人為伍玉麟，由柯俊雄、王寶玉主演，片名改為【南海島血書】。〈南海血淚〉也拍了電影，由蔡揚名導演，王冠雄主演。兩部電影的票房都很差（林濁水，1979，頁 46）。

¹⁰ 1970 年代，台灣曾出現在晚間黃金時段，三台常態性「聯播」節目的現象。根據當時擔任台視節目部經理的何怡謀指出，1976 年元月開始，國防部總政戰部開始長期徵用三台晚間九點到九點半時段進行聯播，最早播出的節目是總政戰部監製，

的內容加以擴大延伸，加上「清風號」難民在南越陷共前之生活的題材，以及對南越陷共過程的描寫。《聯合報》在【西貢風雲】第一集播出當天刊出的社論中，對該劇內容就提前做了「劇透式」的描述：

其最後五集固然和〈南海血書〉相似，映出的是一艘「清風號」如何在船上難民給越共檢查站人員沒收了所有隨身財物之後，駛離西貢，發生故障，飄流了多天擱淺在一個珊瑚島上，經台灣漁船「財富號」救起的劫難故事。但整個主題，則置於八年越戰導致南越淪亡的經過（第一集至第十一集），以及越共侵踞了南越後奴役迫害老百姓的暴行（第十二集至第廿五集）。其前的如阮文紹之被逼解職，陳文香的繼任掙扎，楊文明之終於投降，固然都是真人真事，我們記憶猶新。其後的越共之如何洗劫西貢，勞改下放，迫得人民甘於冒死逃亡，較之報章片段的新聞報導，尤見真切而一貫。」（〈又一頁血的历史教訓——鄭重推薦三台聯映的「西貢風雲」〉，1979年7月3日）

顯然《聯合報》的社論撰寫者，在該劇公開播出前，就已經對該劇全部內容有了掌握。由於社論代表報社立場，這篇社論與前文舉出的尼洛與「黑白集」不具名專欄文章，顯示該報也以某種方式被納入由黨報、軍報領頭，三家電視台後續接力的整體政治作戰文宣計劃中。¹¹當時《中國時報》、《聯合報》的發行量遠高於《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但兩大報是民營體質，因此總政戰部在體系上無法直接指揮，但仍透過與個別作者的連結進行操作。不過相較於黨報、軍報，兩報的表現十分節制。就報紙版面而言，《中國時報》對「血書」的著墨比《聯合報》更少。

中國製片廠製作的【寒流】；接下來還有【證言】、【風雨生信心】、【河山春曉】、【煉獄兒女】、【這一家】、【艷陽天】等等。1979年播【西貢風雲】的時段比起之前，又是更黃金的時段，竟把三台廣告最多、利潤最高的八點檔連續劇時間給徵用了（何怡謀，2002，頁226-227）。

¹¹ 比較有趣的是，如果根據本文註10，當時《聯合報》記者翁台生也參加了李元平等前往講美村難民營的訪問團，但他只寫了單篇報導，不但比李元平少，也比同團的《中國時報》記者傅崑成少，似乎顯示記者個人對此議題有一些自己的判斷。從兩報記者對講美村參訪後撰寫報導的節制表現看來，應已掌握相關內部資訊。

1978 年到 1979 年间，越南难民船大量涌向南海，成为显著的国际人道救援问题（〈越南难民大逃亡 三百艘船只结队 驶向泰马东海岸〉，1978 年 12 月 7 日）。1979 年 1 月 11 日，也就是〈南海血书〉问世不久，在台湾正卷起风潮的时候，当时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会中宣读了一份声明，声明中提到：「历史告诉我们，相信共产党谎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惨的下场。波罗的海三国的被苏俄并吞，大陆的沦陷，越南的沦亡，都是我们记忆犹新惨痛的教训。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今天不做自由奋斗战士 明日将为漂流海上难民〉，1979 年 1 月 12 日）孙运璿的谈话掷地有声，当时全台各大新闻媒体几乎全部头条披露。在〈南海血书〉领头带动风潮，国府的政治作战部门非常有组织、有效率的运用此一局势，在台湾岛内制造出「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的全民精神总动员状态。而当时总统此政治作战文宣大任的，是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

早在台美断交、中美建交之前，当时由邓小平当权的中国，已经开始对台进行「和平统一」策略。提出「三通」要求，希望尽快「通航、通邮、通商」。蒋经国则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反制（许雪姬，2004），并指示王升成立「反统战小组」。「反统战小组」又称「固国小组」，1980 年初改名为「王复国办公室」，即是知名的「刘少康办公室」前身（魏萼，2014），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外交部、警备总部、行政院新闻局、国民党文工会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以抗衡中共「对台办公室」的对台统战（尼洛，1995，页 356-357），依据王升的说法，该团队：「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特殊幕僚群...不办业务、不对外发公文、也不用印信。」（尼洛，1995，页 367）这个「不留痕迹」的隐形小组，就是「血书」一系列文宣布局的幕后推手。

前文曾提及（参见注 5）「血书」作者朱桂在 1948 年曾参与蒋经国主持的「上海经济管制」，当时王升是执行经济管制的主将（蒋经国，1988，页 113-137），因此可以确定具有政战血统的朱桂，除在中央干部学校曾经是蒋经国的学生，与蒋经国的爱将王升也曾经一起工作。而「血书」后续之「血

泪」的产出过程中，王升的爱将朱西宁曾与作者李元平一起前往澎湖讲美村难民营参访，¹²朱西宁在〈后事之师——观「西贡风云」杂感〉一文中描述了这段参访过程，同样也把虚构的「血书」当成事实来描述，他在提到「清风号」难民自述吃人肉时说：「放眼无涯的天水相接却干渴得急吮刚刚咽气者的血管——人到得那种地步而毙，连血液也都稀淡得不成其为血液了，想不到那血小板的匮乏，唯一的用途竟是利于血书……」（朱西宁，1979年7月4日）。这样的描写，已经把「血书」与「血泪」情节交织为一，将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¹³

朱西宁后来在1980年初发表的〈将军令〉一文，也为王升是「血书」这一连串文宣主轴之幕后设计者提供了证据：

¹² 朱西甯（1927-1998）是知名軍中作家，1972年以陸軍上校官階退伍後專事寫作，他曾在〈將軍令〉一文談及與王昇的淵源，對王昇極盡吹捧：「從顧客們指指點點裡，高山仰止的見著四大金剛之一的將軍那正在緩緩昇高著的背影——也就只是那一瞥，將軍一身打縐的卡嘰中山裝，非常平常的清簡澹然，中等身裁，一點也不覺搶眼，或只合公司裡一名清潔工友罷，然而我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卻又似無端的肅然。這是我與將軍結緣的老早的一個起頭，現世裡活真活現的神話，可說是仙緣罷，但也似乎足足預示我與將軍至今三十餘年不易不渝的親與疏...將軍有一種極富煽動性的魅力，...那些看來平凡無奇的課程，到得將軍開講，一樣的也竟是擊楫而誓的慷慨悲歌。那已不止是我單純的有效受教，從而還破除了我學院派的迂闊，讓我發見並信服即使學術傳授，火熱、激情、雄辯、氣勢，都會是那樣的必要而更奏效。將軍確是大開了我輩視界、眼光、和見識；...不想七八年後奉調參謀本部，竟又倖為將軍屬下。怎生是好呢？這只好說是命該我有此福分造化了。...而像我這才不出眾，貌不驚人的平庸之質，蒲柳之姿，若想將軍青睞，那才不知天高地厚呢。好在我也自甘澹泊，單只念及同儕中唯我得識將軍最早，又是神話裡來去的唯我得知將軍最深，則誰還能比得我與將軍如此的至親而又至疏！」（朱西甯，1980年1月23日）。

¹³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朱西甯該文在「聯合副刊」登出的同一天（1979年7月4日），《聯合報》在二版刊出〈「向國建會建言」系列座談之三：文化建設勿急功近利 宣傳工作宜真確可信〉一文，綜合整理包括李亦園、葉啟政、楊國樞等人對政府文宣政策的建言，其中提到：「有效果的宣傳，應當是具有『可信性』的宣傳，當接受宣傳者對宣傳內容發生懷疑，這種宣傳是發生不了效果的。這是在討論『宣傳』時，首須注意的一個角度。...宣傳應以基本的事實材料為內涵，並在常識所能接受的範圍內予以運用。最近，有關『南海血書』的問題，引起許多討論，甚至對該項血書的真實性發生懷疑。果真如此，則宣傳者所欲收穫的功效不但未必能達成，且民眾對發動此項宣傳者的本身或已產生了「反宣傳」的印象。」（陳祖華、黃年、高惠宇、翁台生，1979）似乎顯示當時該報中隱然存在有對「血書」議題不同的操作方向。也顯示台灣知識界當時對「血書」現象很想說點什麼，但其委婉的提醒呼籲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在當時相較於老三台等主流媒體的排山倒海宣傳，顯得相當微弱。

将军最有资格来说越南的，将军曾应吴廷琰邀请，前后赴越十次，协助越南政府建立美国最为反对的政治作战组织。...将军指出越南沦亡起因于共党的分化所受谋害最重。共党说你是北越人，他是越南人；说你是本土人，他是华侨；你是越南人，他是美国人；你是学生他是警察；你是民主斗士他是政府特务；你是佛教徒他是天主教徒；...将军大为慨叹，说出他的名言：「世人只晓得和尚不会做共产党，不晓得共产党会做和尚。」这可不令人自然的联想到今日此间的分裂分子所作所为，说你是本省人他是外省人，你是党外他是党内，你是乡土作家他是御用文人。而几个挟教会以自重的甚么牧师甚么议长，又何尝不令人错觉「基督徒不会做共产党」？（朱西宁，1980年1月24日）

前文中所提，王升对越南陷共原因的分析，很明显与「血书」是同一基调。

继「血书」、「血泪」之后的【西贡风云】电视剧，由于需征用三台电视八点文件黄金时段，自然需要有管电视台的新闻局派驻人员的「固国小组」协助协调。对于所写的〈南海血泪〉内容被改编成电视剧，但自己却完全没有被征询，李元平回忆：「那时候有一个小组，开了很多次会，我的阶级太低，没有资格去参加，那时候做决策的是梅长龄，还有王先生，就是王升。」（高人杰、李惠仁，2001，25:01-25:41）梅长龄原为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影公司总经理，1979年间转任中视总经理，正是【西贡风云】拍摄与播放期间。而李元平口中的「小组」，指的就是王升所领导的「固国小组」。

如前述朱西宁文中所言，王升与越南渊源极深。1960年初越南总统吴廷琰访问中华民国后，王升被蒋经国派往访问，停留三个月期间，以对共产党政治作战专家的身分，与吴廷琰、阮庆、阮文绍、阮高祺、陈善谦等越南政治高层建立良好关系（尼洛，1995，页309-319），甚至在1960年底再度组团访越，并在吴廷琰遇刺后协助越南建立了政战制度（国史馆档案，020-011003-0023）。这使得1979年国府政战文宣体系，之所以会选择以越南难民的遭遇，做为「内批民主斗士、外打伟大盟邦」叙事架构的题材，试图对治岛内政治反对运动，并控诉美国在外交上的背弃，更有脉络可循。

透过对越南难民悲惨遭遇或纯属虚构、或参杂真实内容的编写与呈现，党报、军报连篇刊载，加上三台戏剧每晚播出，再配合全国各级学校的阅读心得写作比赛、话剧演出等等，让「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会沦为飘流海上的难民」的政治宣示，经由报纸头版标题，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中，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议题设定（agenda setting）功能，成功形塑了某种「社会真实」。当「社会真实」的大厦成功被建造，「血书」中那件染血的衬衫究竟存不存在已不重要，中学教员林浊水合理的质疑也立即淹没在依循主流叙事框架，汗牛充栋的讯息中。如同【1979 南海神话】所指出：

尽管林浊水在《八十年代》上以比〈南海血书〉更长的文字驳斥血书内容只是国民党的统治神话，但《八十年代》只发行七期就被全面查禁，而〈南海血书〉则印刷了数百万本，全台各级学校师生人手一册，阮天仇的国仇家恨，岂是林浊水一篇文章就可以泯灭。（高人杰、李惠仁，2001，8:08 - 8:28）

参、从文学的虚构成为社会的真实

一、「南海血书现象」的群众心理基础

虽然在现实使用上充满歧义，但如果从生产者意图的角度，「假新闻」（fake news）大致可分为故意或非故意的被产制出来两大类。前者是误导性的造谣（disinformation），后者则是人云亦云的道听涂说（misinformation）（Weedon, Nuland, & Stamos, 2017, April 27; Caplan, Hanson, & Donovan, 2018）。如果根据这个定义，「中央副刊」将〈南海血书〉改装为真实文件的译文，是制造了一则蓄意误导读者的讯息（disinformation）。接下来一连串将该文件视为真实存在的新闻报导、影像呈现，则可能是蓄意误导的延伸，也可能是道听涂说（misinformation）的扩散，都可包涵在「假新闻」的范围。

但如同当代的各种「假新闻」泛滥现象，不能只简单的以有人蓄意造假、

恶意抹黑、骗术诈财等个体道德违失来解释，而必须考虑具垄断性占有率的社群媒体，以其运算法透过偏好设定放大极端言论，对使用者所造成的影响等等。如果只简单以「党国文宣机器的愚民政策」去看待这个近世台湾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南海血书现象」，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这样一个情节相当不合理的故事，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何以竟能如此触动人心、掀起风潮，并在当时国府政权内外交迫的情势下，相当程度的强化了台湾民众对既有政权的认同与向心。历史学者李永炽从当时台湾民众心理状态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诠释：

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台湾也一批移民潮出来了，大家就往美国跑。接着第二波，所谓的「中美断交」也就是台美断交的时候，又有一批，等于说是逃亡潮，也是往美国或是其他地方去跑，所以在这种危机的心理状况之下，大家就把自己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和当时像〈南海血书〉之类这些东西互相结合在一起，所以里面的荒诞，里面这些不合情理的东西，大家都会抛开（高人杰、李惠仁，2001，15:54-16:40）。

如果不是有这种集体的心理状态支撑，很难解释朱桂的儿子朱大明儿时的亲身经历。因为在朱桂投稿「中央副刊」前曾经先看过原稿，所以从一开始就知道〈南海血书〉只是父亲伏案几小时后所产出的一篇虚构文章的朱桂的儿子朱大明，在当时所看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甚至怵目惊心的种种现象：

那时候郊游烤肉嘛！从台北火车站坐车去十分寮瀑布，你到车站就看到人家发这个东西：「不要再玩了，台湾要灭亡了！」而且是老兵，是真的老兵，而且他是自费刻钢板油印的，整个抄出来这样油印，你的感觉会很可怕，中华路天桥上面到处在发这个东西，就是南海血书嘛！不会写就写阮天仇（高人杰、李惠仁，2001，15:16-15:45）。

这是朱大明儿时亲眼所见。一篇从时事发挥想象，纯属虚构的文学作品，却引发一连串实实在在的社会效应，「血书」虽然是假的，但在当时所引发的「血书效应」却是不折不扣的一种「社会建构的真实」（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二、社会建构的真实

社会学家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1929-2017) 指出, 在人类社会中被视为「真实」的, 有些是已被明确建制化的客观真实 (objective reality), 例如语言、宗教 (Berger, 1966, pp. 34-46); 有些则是个体透过社会化过程的内化而成就的「主观真实」(subjective reality), 主观真实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形成, 除了儿童成长过程中需经历将个体安置于社会的「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 个体还需透过各种「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 以应对其社会生活 (Berger, 1966, pp. 129-147)。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 都是透过与他人互动来确认自己的身分、形塑对己身与社会的认知, 而不论是在哪个层次的社会化过程中, 除了「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例如父母、配偶、家人等对个体具有关键影响力, 其他「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 例如通勤交通工具上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或人们每天在电车上阅读的报纸, 也发挥着形塑或维系主观真实的一定作用 (Berger, 1966, pp. 149-152)。

不像社会的「客观真实」往往具有强大的固着性, 社会的「主观真实」相对具有可变动性,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透过例行性、甚至仪式性的互动来进行维系才能持续 (Berger, 1966, pp. 147-163)。在这类「主观真实」的相关讨论中, 大众传播媒体的角色经常被着墨。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指出, 每日出刊的大众传播媒体 (当时主要是指纸本印刷的报纸、杂志) 在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这种「想象共同体」(一种「主观真实」) 时, 所发挥的国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性作用 (Anderson, 1983)。凯瑞 (James Carey) 在其媒体相关研究中, 也强调传播媒体的「仪式性」功能更胜于信息传播功能 (Couldry, 2003, p. 19)。

凯瑞对「真实」所提出的洞见, 使得他的讨论特别合适用在分析「南海血书现象」。他是如此描述「真实」与权力的关系:

「真实」是稀有资源，如同所有稀有资源被各方争夺...权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如何界定、配置、展现这资源...在现代，「真实」因为近用能力而稀少：仅少数人得以号令决定结果。有人可以说，有人只能听，有人可以写，有人只能读，有人拍电影，有人看电影（Carey, 2009, pp. 66-67）。

从权力者掌握讯息内容、掌握世界与社会诠释权的角度，凯瑞强调传播的仪式性功能：一种为了达成假想中之和谐世界的功能。在他看来，传播的仪式性在于：着墨于典范建构与维系更胜于创新实验，维护前提更胜于提出主张，重视架构更胜于内容（Couldry, 2003, p. 65）。凯瑞从古老的字源中找到传播（communication）这个字的仪式性意义源头，他指出，传播从一开始就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协作（association）、伙伴关系（fellowship）等意义有关。他认为，传播的仪式性观点是从维系社会整合，而非克服地理空间阻隔来理解传播的社会功能，从此一观点出发，传播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重现共同信仰，而非传递讯息（Couldry, 2003, p. 15）。

读报如同望弥撒，每天出刊的报纸内容并无新意，重要的是对读报者某一世界观的重复形塑与确认。撰写或阅读报纸都是仪式性、戏剧性的行动，呈现读者眼前的并非纯粹的讯息，而是各方势力的争鸣与抗衡。例如：一则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导，其实是对抗传统敌国德国与日本的爱国表现；一则关于女性政治会议的报导，则牵涉支持或反对妇女解放双方的抗衡（Couldry, 2003, pp. 16-17）。

依据伯格与凯瑞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做为阅听者每天认识世界与社会的重要媒介，新闻媒体所呈现的「真实」，是一种经由新闻内容生产者与阅读者互动后所产生的「社会建构的真实」。而具有较大权力的一方，往往主导或决定了真实该如何被建构，也就是决定了新闻媒体会呈现那些内容，以及如何呈现；呈现在新闻媒体上的讯息内容，是各种力量抗衡下的结果，讯息的产制与接受过程所要发挥的最重要功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消息传递，而是要确保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所欲巩固的世界观、或对事情的理解框架，可以传达给接受讯息的一方，并获得确认。

如果依据这样的观点来解读「南海血书现象」,会发现在 1970 年代末期,党国体制依旧掌控各个权力面向的台湾社会中,出现这样一件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案例,其实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血书」事件应该只是党国势力掌控的媒体机构,所曾经产出的诸多有利统治的「社会真实」中,较为显著的案例。

三、一则「假新闻」如何建构「社会真实」

在〈南海血书〉的案例中,当时依然高度掌握媒体话语优势的党国体制,显然已经认识到政治反对势力的挑战越来越强,但台湾当时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对「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等对后来台湾政情影响深远的政治抗争事件却几乎没有报导。亦即统治集团已认识到的现实,却由于媒体向维护执政者方向极度倾斜,相关事件的消息都被刻意掩盖,所以尚未成为大众普遍了解的「社会真实」。相反的,透过具有实质权柄的组织性力量(例如「固国小组」),够透过对党报、军报的直接控制,与对其他具有「侍从性格」之民营报纸的间接影响,¹⁴配合当年越南难民潮涌现的外在局势,成功地在台湾社会中,引导、制造出从 1978 年底一直延续到 1979 年下半年的「南海血书现象」。

相较于台湾岛内政治反对运动开始崛起,让执政者面临政权稳固性遭撼动的危机感,当时台湾民间普遍存在的危机感,主要来自台美断交。台湾人民担心美国与中国建交后,可能会放弃自 1954 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签订以来,以武力保卫台湾于中国统治之外的承诺,担心台湾很快会被中国并入。这就是前文提到,李永炽所描述的,当时台湾民间很普遍的心理焦虑。〈南海血书〉以及之后随之而生的一系列论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种危机感中,被循序渐进、有计划地端上台面,并如幕后推动者所意料,甚至程度可能超乎其意料的,获得了社会回响。

¹⁴ 學者林麗雲借用政治學上「保護主與侍從」關係的概念,來解釋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與當時民營報業的關係(林麗雲,2000)。

透过对难民海上逃亡惨状的披露，将社会注意力引导向「今天不做为自由而战斗士，明天就沦为漂流海上难民」的一整套叙事架构。一方面批判此一叙事中最后放弃南越，未来也可能放弃台湾的「伟大盟邦」美国；一方面以叙事中被指为直接导致南越陷共，反对吴廷炎、阮文绍政权的南越「民主斗士」们，影射台湾内部政治异议人士，将会让台湾的下场如同南越，台湾人民的下场一如越南难民，达到妖魔化党外政治运动的效果。其对后者的着墨，往往甚至更甚于前者。

《中央日报》对〈南海血书〉的真伪态度隐晦，直到一年后才承认其为「文学创作」。而在此之前，经过〈南海血泪〉采访「清风号」难民相关报导的加工加料，以及全台各级学校的心得写作比赛，透过学校、老师做为学童社会化过程中「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强调与示范，以及假日站在中华路天桥上发〈南海血书〉手抄油印本的老兵等这类「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的不断提醒，南越「亡国」的血泪教训，透过对〈南海血书〉的诠释，转译为当时台湾民众对现况的感受与理解。

整整一年间，「血书」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变形与分身出现在新闻媒体、学校教材、电影、电视八点文件联播，以及难以计数的学生阅读心得写作、周记感想与作文比赛的内容中，高密度的讯息重复，发挥「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效果，¹⁵让一篇原本虚构的文字，毫无疑问的建构出了影响广泛，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真实」。正如凯瑞所说，「真实」是稀有资源，通常是由权力者决定其内容；也正如「中央副刊」曾经针对「血书」热潮是被制造出来的指控，理直气壮的反驳表示：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成千成万的人争着阅读，是「制造」出来的，几十万本「南海血书」相继售罄是「制造」出来的；无论阅读，无论购买，无论抄写、翻印、张贴，都伴随着一个行动，也都是「制造」出来的...一篇轰动的作品，必与时代潮流、民族情感相表里，

¹⁵ 伯格在談到維護「主觀真實」的日常社會互動時曾指出，雖然重要他者的意見通常對個人影較大，但：「當十個一般的熟人連續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其影響力就會開始超過持相反意見的摯友。」(Berger, 1966, p. 152)

要得天时，得地利，得人和才哄得起来，动得起来（仲父，1979年12月19日）。

当「三人成虎」的「社会真实」论述，以其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掩盖了〈南海血书〉其实是一文学性虚构的种种迹象，也掩盖了当时就已经出现的零星质疑，分享共同情感与焦虑的「愿意相信」，会凌驾了真伪辩证的「可以相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肆、结语：媒体话语权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假新闻」的前世今生

本文回顾 1979 年年末开始，在台湾社会中延续至少一整年的「南海血书现象」。在台美断交、党外政治力量隐隐骚动的时局中，专科教师朱桂一篇以越南难民死前绝笔信形式呈现的文学作品，被《中央日报》副刊以添加「译者附记」的方式，戏剧性的被假扮成一篇译自发现于大海螺中的衬衫上，以越南文写就的「血书」。从「血书」刊登之前不久，由总政战部监制的【越高沦亡实录】已经在三台黄金时段联播过两次看来，当时担任总政战部主任，也就是实际领导「固国小组」的王升及其团队，已经确立以越南陷共、难民潮涌入南海周边国家，做为面对台湾内外变局的文宣叙事题材。并将叙事主轴定调为——不能依赖「伟大盟邦」（决定与台湾断交的美国）、不能相信「民主斗士」（正在集结、影响力迅速扩散的党外政治势力），否则下场会跟南越一样。在台美断交后，害怕成为海上难民的集体心理下，「血书」在台湾社会一度掀起了很大的浪潮。

《中央日报》副刊「加工变造」了朱桂的文章，把这篇三千多字的虚构文字化妆为真实文献的译本，成了「投掷在油海里的燃烧弹」，透过学校系统的全面动员，让学校以及学校里的老师——对学生来讲的「重要他者」，成为传递相关讯息的重要管道，在〈南海血泪〉、【西贡风云】的后续强化下，平面、电视主流媒体与教育体系的联手，在台湾社会中成功塑造了「不应仰赖美国、不要信任党外」这个隐然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观真实」。虽然事后

证明「血书」是虚构，但此一透过主流媒体与学校系统不断推动的「次级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主观真实」，在当时台湾社会中，却一度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真实」，其影响力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恐惧是统治者控制人民最好的方式，「南海血书现象」印证了这点。

用凯瑞的观点，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一方，便掌握说话的权力。当年「南海血书现象」出现的时空环境中，那种透过党国控制的新闻媒体与教育体系牢牢掌控话语权的情形，在网络普及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由于只要连上因特网，几乎人人都可以上网传播讯息，过去黎民百姓、芸芸众生「只能听、不能说」的状况，已被网络「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的讯息传播模式取代。但从近年的发展观察，这种看似「去中心化」的发展，却可能是一假像。因为观诸今日种种现象，任何讯息要在茫茫网络世界中发挥倍数加乘效果的影响，与其是否能迎合、运用具市场垄断性的网络平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社群媒体脸书—算法 (algorithm) 密切相关。

像脸书这样的社群媒体平台，虽不产制内容，却透过「使用者产生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成为最大的讯息制造场，在垄断性的占有率下，网络世界中的行动者若欲发挥影响，选择与其协作容易，选择违逆其逻辑万难，而平台只要能掌握大量使用者个资，便可能进行讯息操弄，有效影响其社会结果，不论讯息内容是真是假。于是我们又回到凯瑞的古典命题——**权力与话语权的相伴相生**，不论此一权力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基础（虽然两者无法截然区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血书现象」的殷鉴便显得历久弥新。

参考书目

- 〈又一页血的历史教训——郑重推荐三台联映的「西贡风云」〉(1979年7月3日)，《联合报》，第2版。
- 〈大好题材被人粗乱拍 南海血书作者表惋惜〉(1979年5月15日)，《中国时报》，第7版。
- 〈中央干部学校之创立与规模(民国33年至35年)〉(无日期)。取自政治大学网页 <http://archive.nccu.edu.tw/history5.htm>。

- 〈今天不做自由奋斗战斗士 明日将为飘流海上难民〉(1979年1月12日),《联合报》,第1版。
- 〈四部爱国电影 今晚开始轮映〉(1979年1月20日),《联合报》,第6版。
- 〈朱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129000112652A。
- 〈各校纷以「南海血书」作为爱国教材教育厅认意义重大〉(1979年1月12日),《中央日报》,第4版。
- 〈「民主斗士」〉(1979年1月23日),《联合报》,第3版「黑白集」。
- 〈电视台明回放 越高沦亡实录〉(1978年12月16日),《联合报》,第7版。
- 〈电视剧「西贡风云」下月三日三台联播〉(1979年6月30日),《联合报》,第7版。
- 〈越南政府请我派员协办军中福利及政战研究班教学〉,国史馆藏,数字典藏号:020-011003-0023。
- 〈越高沦亡实录 电视明天播出〉(1978年12月3日),《联合报》,第7版。
- 〈越南难民获救前在荒岛上 境况惨绝人寰 没有一家能完全活下来〉(1978年12月13日),《中央日报》,第3版。
- 〈越南难民大逃亡 三百艘船只结队 驶向泰马东海岸〉(1978年12月7日),《中央日报》,第2版。
- 〈复兴高中礼堂 今明公演话剧〉(1979年10月28日),《联合报》,第7版。
- 尼洛(1995)。《王升——险夷原不滞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
- 尼洛(1978年12月5日)。〈「越高沦亡实录」的播映〉,《联合报》,第7版。
- 朱西宁(1979年7月4日)。〈后事之师——观「西贡风云」杂感〉,《联合报》,第12版。
- 朱西宁(1980年1月23日)。〈将军令〉(上),《联合报》,第10版(联合副刊)。
- 朱西宁(1980年1月24日)。〈将军令〉(下),《联合报》,第10版(联合副刊)。
- 朱桂(1979)。《历史圈外》。台北:东大图书。
- 朱复良(1979年1月9日)。〈「南海血书」的激荡〉,《中央日报》,第6版。
- 仲父(1979年12月19日)。〈南海血书〉,《中央日报》,第10版(中央副刊)。
- 何怡谋(2002)。《台湾电视风云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李元平(1979)。《南海血泪》。台北:青年战士报。
- 李元平(1979年1月18日)。〈越南难民浩劫余生,逃亡过程充满血泪〉,《青年战士报》,第3版。
- 阮天仇(1978年12月19日)。〈南海血书〉,《中央日报》,第10版。
- 林浊水(1979)。〈拙劣的南海寓言——剖析「南海血书」的真相〉,《八十年代》,创刊号,页45-49。

- 林丽云 (2000)。〈台湾权威政体下『侍从报业』的矛盾与转型：1949-1999〉，《台湾产业研究》，3: 89-48。
- 邱家宜 (2011)。《战后初期 (1945-1960) 台湾报人类型比较研究—吴浊流、李万居、雷震、曾虚白》。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 茅家琦 (2003)。《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高人杰、李惠仁 (2001)。【1979 南海神话】。台北：民间全民电视台。
- 翁台生 (1979 年 1 月 19 日)。〈珊瑚礁上人吃人 惊魂甫定吊亡魂——越南难民逃奔自由.同舟一命.百劫余生.四十二天.非人生活.九十七人.绝地丧身〉，《联合报》，第 3 版。
- 许雪姬 (2004)。《台湾历史辞典》，页 64-65。台北：远流。
- 陈祖华、黄年、高惠宇、翁台生 (纪录) (1979)。〈「向国建会建言」系列座谈之三：文化建设勿急功近利 宣传工作宜真确可信〉 (1979 年 7 月 4 日)，《联合报》，第 2 版。
- 詹嘉雯 (2007)。《中坜事件与台湾政治转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嵇若昕 (1981 年 4 月 27 日)。〈南海血书感人故事忠孝国中搬上舞台〉，《中央日报》，第 9 版。
- 傅昆成 (1979 年 1 月 23 日)。〈当为斗士，毋为难民：越南难民访问录〉 (四) 「哭泣的珊瑚礁」，《中国时报》，第 3 版。
- 嘉彬 (1984 年 10 月 27 日)。〈好书介绍——南海血书〉，《中央日报》，第 10 版 (中央副刊)。
- 蒋经国 (1988)。〈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页 45-165。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刘吉雄 (2013)。〈例外之地·陌生人〉，《文化研究》，17:217-224。
- 刘吉雄 (2016)。〈【难民船上的人】我们的人类啊，最后生死之间的那种抉择〉，《独立评论》。上网日期：2018 年 3 月 31 日，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45/article/5061>
- 魏萼 (2014)。〈析论「刘少康办公室」的历史意义〉，《海峡评论》，227 期。上网日期：2018 年 7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615.html>
- 罗世宏 (2018)。〈关于「假新闻」的批判思考：老问题、新挑战与可能的多重解方〉，《信息社会研究》，第 35 期，页 51-86。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Berger, Peter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 Caplan, R, Hanson, L, & Donovan, J. (2018). *Dead reckoning: Navigating*

- content moderation after "Fake News". Retrieved July 5, 2018. From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Web site:
<https://datasociety.net/output/dead-reckoning/>
- Carey, Benedict (2018, Jan. 2). Fake News': Wide Reach but Little Impact, Study Suggest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Dec. 5, 2018,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02/health/fake-news-conservative-liberal.html>
- Carey, J. (2009).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pp. 11-28. Routledge.
- Carey, J. (2009). Reconceiving Mass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pp. 53-67.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ubramanian, S. (2017, February 15). Inside the macedonian fake-news complex. *Wired*. Retrieved July 5, 2018, from
<https://www.wired.com/2017/02/veles-macedonia-fake-news/>
- Weedon, J., Nuland, W., & A. Stamos (2017, April 27).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Facebook. Retrieved Dec. 5, 2018 from:
<https://fbnewsroomus.files.wordpress.com/2017/04/facebook-and-information-operations-v1.pdf>

A Fake News of Taiwan's Martial Law Period : Nanhai Blood Letter

Eve Chiu*

ABSTRACT

On Dec. 19th 1978, supplement page of Central Daily News published an article called “Nanhai blood letter”. The article was signed by the named “Ruan, Tian-Chou” as his last words when dying on a coral reef in South China Sea by its description. The letter has been proven fake and found out was invented by a college teacher named Jhu, Guei of Northern Taiwan. At that time, Taiwan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as rising and “Nanhai blood letter” was promoted on a large scale by media, schools, various institutions for confronting the trend. The popular slogan was “Being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today, or becoming a refugee at sea tomorrow. Taiwan governors connected Vietnam's falling into communist ruling and Vietnam people’s opposition of Ruan Wen-shao regime successfully by “Nanhai blood letter” and related propaganda. The strategy alluded that rapi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ould lead Taiwan to the same fate of Vietnam. Through the manipulation, KMT governors weaken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hich was still in its budding stage and striv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regime by people’s fears of communist party.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notorious “fake news” and discuss from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erspective. The discussions include how the powerful KMT propaganda machines used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o create a wave throughout Taiwan; how a fictional story became a social reality by being believed to be true.

Keywords: fake news, Guei Jhu, Nanhai blood letter, social reality, Sheng Wang

* Eve Chiu is 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eve59chiu@gmail.com

中国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形成与内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内容分析为例

刘忠博、陈娟、邵成圆*

本文引用格式

刘忠博、陈娟、邵成圆（2019）。〈中国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形成与内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内容分析为例〉。《传播、文化与政治》，9:31-61。

投稿日期：2019 年 3 月 10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 作者刘忠博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email:liupublius@gmail.com
陈娟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email: foxisfox@126.com
邵成圆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媒体与新闻学院博士候选人，
email:liupublius@gmail.com。

《摘要》

中国大陆的「官方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之间，二者存在既互补又分离的矛盾，前者需要后者展现爱党爱国，然而后者却时而超过官方的控制范围，甚至对于官方产生批评之声。近年来社交媒体横空出世，中共视这类新兴媒体（微信）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在其尚未能完全掌控之前，为了引导网络上对外的舆论，需要民间写手的助力，而受到官方支持、并由网络红人所建构的「爱国网红民族主义」，即是在此脉络下形成。本文试图探讨爱国网红民族主义之内涵，以亲官方的网络红人一周小平一发表的文章为例，透过内容分析法检视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态度 / 立场。研究结果显示，在分析的 506 篇文章之中，周小平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谈及前者时多集中于赞扬，其中政治类话题的赞扬比例最高（且无任何批评）；对于后者而言则多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平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评价（不管是赞扬或批判），多集中于社会文化类的话题，而对于政治类的话题，则表现出中立，这也显示出，在周小平看来，人民应该要无涉于政治。周小平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维护既有政权的民族主义」，对内是护党爱国，对外是反美批日，而对比于早期的网络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已不存在批评国内事务的观点。

关键词：中国大陆、官方民族主义、网红政治、网络民族主义

壹、研究背景及问题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每每宣称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并积极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之中；2017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上，习指出中国实乃世界贸易的新拥护者，甚至强调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张铭坤译，2017年11月10日）。然而，另一方面，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又因为政治议题时而抵制境外商品。例如同年2月，韩国乐天公司因将其用地转让美韩共建萨德飞弹防御系统（THAAD），便遭致中方抵制，不仅中方在其官媒宣传抵制境内乐天百货，还敦促国民勿往韩国旅游，而韩国为了反制，也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中方「在旅游及销售方面限制韩国」（〈韩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抵制韩货〉，2017年3月20日）。2018年1月与2月之际，前有全球连锁的万豪酒店在其问卷调查中把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列为国家，后有中国奔驰在其 Instagram 发布的宣传广告上，引用达赖喇嘛的名言「放宽心胸看万物，视野更辽阔（Look at situations from all angles, 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这两者都遭致中国网络舆论的抵制，人民网甚至批评奔驰如此行为是「与中国人民为敌」（〈中国奔驰广告引达赖名句 人民网：「与中国人民为敌」〉，2018年2月7日）。

这种因为政治事件而发生的抵制，在中国不乏前例。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奇与达赖喇嘛会面，或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台岛进行国有化的作为，在中国国内都引发不小的骚动，如前者引发群众集结抗议法籍企业（家乐福），而后者则导致日本厂牌汽车遭致焚毁。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时而因个别的政治事件，继之引发与经济发展抵触之矛盾，中国政府又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

杨山（2017年3月2日）认为，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煽动人民情绪，威吓外交上的对手，另一方面又为了避免群众行为失控，进而造成反社会秩序，于是发展出「官办激进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根植于党内文宣系统的新媒体平台，它既可以扮演舆论先锋的激进角色，也可以在关键时刻急踩煞车，避免引发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抵制限缩在个人的消费行为，「身为中国公民，你只需要以个人身份，避开韩国品牌，不去旅游，不搞代购，换个『替代品』就可以了」；在杨山看来，这

种民族主义可收可放，官方可用之因应不同需要。

这种根植于新媒体平台的民族主义有其治理的根据。依 Anderson (1991 / 吴叡人译, 1999) 之见, 民族主义的建构离不开传播技术, 就此而言, 印刷术是让群体成员得以超越面对面、特定地理时空的限制, 进而让跨地域的想象共同体得以形成。时至今日, 数字技术与因特网的发展, 让民族主义有了不同的样貌; 与前述「官办民族主义」相对的说法, 便是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 这种论点强调民族主义自民间发起、由下而上、利用网络技术的特性。在印刷技术主导的时代, 中国官方还可透过官媒(如《人民日报》、《环球日报》)建构其可收可放的民族主义, 但是当一般民众掌握传播工具, 并能透过网络来建构民族主义之时, 官方就必须想方设法来加以控制与利用。

在新媒体时代, 即使官媒可以建构 – 如杨山所言的 – 「官办民族主义」, 这些官媒还是得面临与其他个人媒体的竞争(如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 阅听人不一定都会选择官媒的信息来阅读, 无怪乎其领导人习近平曾说「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张明杰, 2017 年 5 月 12 日), 不难想见中国官方极为担忧失去网络这样的舆论阵地。然而, 如此忧虑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郑素侠(2017)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 发现民众在接触政治类新闻时, 非官媒(微博、微信、网络小区)的接触频次要高于官媒(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 并且「愈是不经常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获取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 而是选择通过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非官方媒体的网民, 愈可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郑素侠, 2017, 页 149)。由此可见, 在新媒体时代, 官方欲建构官办的民族主义并非易事, 而民族主义也比较容易从网络(而非官媒)上形成。

然而, 这种自下而上的网络民族主义, 并非每次都是顺行官方的意志, 偶尔也会擦枪走火, 反伤官方自身。Cairns 与 Carlson (2016) 研究 2012 年的钓鱼台事件时发现, 微博上的部落客将其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日本, 更直指中国政府的无效率与贪腐。也因此, 官方发现了民间在批判西方的同时, 也可能批判国内(政府), 或者批判西方与国内并不冲突, 因此对于这种由草

根民众所发起、建构的对外意识形态，并不乐见其成长茁壮。

在中国日益主动卷入全球事务、又不时面临国际纷争的情况下，官方如何在官媒之外，找出既可强化官方立场，又可稀释民间批判的力量，这项议题就成为我们关心的焦点所在。针对这项议题的研究，不仅能理解中国官方如何化解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也能够替官方民族主义的讨论，增添一些知识积累：杨山的「官办民族主义」令人想起 Anderson (1991 / 吴叡人译, 1999) 的观点，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内部出现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即是欧洲各王室对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虽然这两种民族主义有其不同时空条件的差异，无法直接模拟，但我们或可借助 Anderson 的启发，探讨掌权者（政府）如何响应或抑制来自网络（民间版本）的民族主义。

就此而言，那些与官方亲近的个人媒体，便成为我们观察的焦点。本研究选取周小平的网络文章（包括部落格、微博、微信公众号），作为分析焦点，探讨这类来自民间的个人媒体如何在与官方契合的主旋律之下，阐释中国对外的意识形态。而选取周小平的原因，首先他本来是一名经营个人部落格的写手，2006-2007 年之间，曾获选为中国十大部落客。目前经营的微信公众号之粉丝数超过 77 万（截至 2017 年 4 月时，粉丝数达 77 万 3054 人）；周小平与共党或官方虽无正式的雇佣关系，但他曾在 2013 年 8 月应中国中央电视台之邀，畅谈「微博『大 V』的社会责任」，尔后还参加多个省分 / 省委所主办的「网络时代的信息与舆论」论坛。更重要的是，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中除了多名文艺工作者之外，还有两名以「网络作家」的身分与会，其中一名便是周小平（另一名是花千芳）。根据媒体报导，习近平谈及网络文学时，特别问及「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 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来并向总书记举手示意」，并且在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习近平寄语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希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2014 年 10 月 16 日）。

尔后周小平（与花千芳）一炮而红，而周小平甚至还得到官媒的发声支持。例如，周小平在 2014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梦碎美利坚〉，内容细数美国

的种种缺失，并推崇更为先进平等的「中国梦」，部落客方舟子见闻后于 10 月 20 日展开反驳，撰文批评周文列举的事实存在诸多错误，实有误导读者之嫌。不料方文引来官媒的集体挞伐，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网》、《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联合声援周小平，¹这种现象并不常见。杰伊（2016 年 6 月 1 日）指出，周小平代表的是「主动与批评政府观点对峙」，这项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官方何以费力扶持这类来自民间的网络写手，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研究周小平的文章内容，探讨官方容许的对外意识形态为何。虽然外界曾因周小平于 2018 年 3 月时辞去「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一职，解读为周已失宠于官方（中央社，2018 年 3 月 24 日），但无论真相为何，至少从 2014 至 2018 年这段将近四年的时间，共党政府需要这类来自民间的角色，而我们亦可藉此了解这种亲官方的网红作家，如何建构其网络民族主义。

貳、文献探讨：官办 vs 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

在中国，媒体对于民族主义的建构其来有自。根据黄煜、李金铨（2003）的观点，天安门事件后，官方惊觉其合法性基础已遭摧毁，在意识形态真空之际，转而寻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组概念，来填补其论述上的空缺，官媒也将这组概念进行系统性的宣传，官方话语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而 19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系列书籍的出版，更反映出官方的说法逐渐在民间发酵；1999 年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 年中美军机在南中国海相撞等事件，更是让民间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达到沸点（黄煜、李金铨，2003）。

这种民族主义的精神话语渗透至民间之后，参与的群众多运用因特网来表达民族主义的要求，因此兴起了所谓「网络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的讨论。2003 年时，中国的齐齐哈尔发生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毒气感染事件，造成多名中国本地人员受害，²事后「爱国者同盟」等 7 网站发起「对日

¹ 參見 <http://xysblogs.org/fangzhouzi/archives/10978>

² 根據媒體報導，2003 年 8 月 3 日，一家開發公司在齊齊哈爾市的「北疆花園」社

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并将 4000 多页的签名书交由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借助网络之力展现民意，希冀影响中国政府对日的外交政策。当时的媒体鉴于网络上的舆论动能，在报导时便以「网络民族主义」为题进行讨论，³有论者便就此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就此应运而生（闵大洪，2009）。

事实上，也有研究者将网络民族主义追溯至 90 年代末期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而后续发生的奥运圣火传递事件、抵制法籍企业家乐福、抗议日本将钓鱼台进行国有化、以及 2016 年初的「帝吧出征 facebook」等等，都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分析焦点（参考王喆，2016；Cairns & Carlson 2016；Hassid, 2012；Hyuna & Kimb, 2015；Jiang, 2012）；许多论者也认为，一种混杂了草根性质、富有新生样貌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杨国斌，2016；郭小安、杨绍婷，2016；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王喆，2016；周逵、苗伟山，2016；刘海龙，2017；Qiu, 2015）。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将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划分出三个阶段，分别是 1998 年至 2003 年、2008 年至 2010 年、以及 2010 年之后至今，这三个阶段的行动主体，分别是 70 后（泛指 1970 年代以后出生者）的知识青年、80 后（泛指 1980 年代以后出生者）的军迷与以男性为主体的「知情民族主义者」、以及 90 后（泛指 1990 年代以后出生者）的网络亚文化粉丝群体：70 后的大学生网民为第一阶段的行动主体，他们受到 1990 年代末的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之启发，深具民族意识，对官方处理国际上的重大事件表现不满，同时带有强烈的社会介入性；80 后除了继承了上一代的批判性格，他们还知晓英文，兼通西方网络，并且具有商业文化的消费者特征；90 后则是以网络商业文化与全球化跨界流动的方式来表达民族主义。90 后所建构的网络民族主义，是当下流行的样貌，底下以 2016 年 1 月发生的「帝吧出征 facebook」为例，说明这种民族主义的特色。

區施工時，從地下挖出 5 桶金屬罐，而罐內油狀溶劑外溢，造成 44 人毒氣感染，其中一人死亡。參見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Jul/926259.htm>

³ 根據王洪喆、李思閩、吳靖（2016）的看法，《國際先驅導報》於 2003 年 9 月由李慕瑾所撰寫的〈網路民族主義掀開中國民族主義新篇章〉一文，是第一次提出「網路民族主義」的概念。

该事件起因于艺人周子瑜在韩国综艺节目挥舞中华民国国旗，此举遭到黄安检举周子瑜即是台独艺人，经三立新闻报导并引用 PTT 网友声称「强国人玻璃心又碎了」之后，旋即引发中国大陆网友不满，尔后「翻墙」至台湾各大媒体脸书粉丝团，发起集体「进攻」。⁴根据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对此事件的观察，90 后除了是表达民族主义的主体，他（她）们也是各种网络次文化的迷群，对于全球商业文化符号的嗅觉敏锐，兼具技术能力，能制作各种「表情包」来表达民族主义。郭小安、杨绍婷（2016）与 Qiu（2015）亦有类似的观察，直指这是一种图像 / 表情包式的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也观察到，这批年轻的粉丝群体，由于其生活方式全然是由网络所塑造（如学习、社交、新闻获取、消费等），他们是从追星的过程中体认到民族身份的问题，而对于政治问题，也就会透过他们在追星过程中所养成的方法（如制作表情包）来表达。

闵大洪（2009）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二：其一，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其二，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网络传播行为。前述的「帝吧事件」之研究，似乎不脱这两点的讨论，然而仔细探究，这种晚近产生的网络民族主义要求，其形式渐渐地仅限于网络上的文字与图像，而缺乏闵大洪所谓的「现实行动」。例如前述 2003 年发生的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网民将在线讨论的动能转为线下行动，在搜集 4000 多页的联署书后交至日本使馆，但这种现实行动在后续的事件里，为何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事实上，官办民族主义将网络民族主义进行推波助燃的同时，也可能给予抑制。2008 年西藏发生藏人抗议事件，一些中国留学生与海外人士认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的 CNN）对此事件的报导失之偏颇，故于该年 3 月时成立「反 CNN 网站」（anti-CNN.com），号召网友搜集相关证据反驳西方，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也说，这种行动「完全是中国各界群众对这种不负责任、违反职业道德的缺德报导予以自发的谴责和批判」⁵，官

⁴ 參見 <https://goo.gl/4IKcTF>

⁵ 參見 <http://hk.crntt.com/doc/1006/0/6/3/10060635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06359>

方等于直接承认 anti-CNN.com 的正当性。官媒中央电视台也制作【正告 CNN：网民为什么愤怒？】专题，报导相关行动，在旁敲锣打鼓，助长声势。

同年 4 月，CNN 新闻评论员 Jack Cafferty 在其政论节目「战情室」(The Situation Room) 之中，批评中国产品的破烂不堪，中国人民犹如暴徒，此番言论激起「反 CNN 网站」的大力挾伐，并号召网民前去 CNN 北京总部张贴抗议信。由于同一时间点也有网民号召群众抵制法国货，⁶民间仇外气氛浓厚，中央电视台随后呼吁民众理性，而「反 CNN 网站」也收敛先期激愤的态度，转而传达「理性爱国主义」的要求，并指出焚烧国旗、抵制法国货、集结大使馆前的抗议行动都是非理性的，应受克制 (Jiang, 2012)。包括前述齐齐哈尔的毒气事件在内，这些事件让官方认识到网络民族主义应加以控制，否则稍有不慎，即会失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Liu (2006) 认为网络民族主义可以催生中国人的公共参与空间；然而这种增加公共参与的看法，特别是在现实环境中的集体行动，很可能仅限于 - 依王洪喆等人 (2016) 所界定 - 1998 至 2003 年之间，也就是网络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尔后官方就有意识地将这种参与，限缩在因特网。

进一步而言，若不希望民间引发集体行动，又希望民间能对国际事件存在一种政治正确的看法，那么官方会希望民间如何讨论呢？官方允许民间的民族主义之内涵会是什么？尽管目前有许多探讨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但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分析的案例，多为突发事件（如「钓鱼台事件」、「帝吧出征」），它们在事件过后随即消逝，我们无法系统性地整理出中国网民对于西方国家的见解（或说意识形态）为何。为解决此问题，本文转而探讨那些与官方亲近、且每日持续生产文章的个人媒体 - 周小平在新媒体所撰写的文章 - 试图探讨在官方允许下的民间民族主义之内涵为何。主要问题详列如下：

⁶ 這是由於當年（2008）適逢奧運年，由北京主辦，許多支持西藏及人權團體在奧運聖火繞行巴黎的時候，試圖阻擾火炬的接力，藉以表達訴求；中國網民不滿法國警方執法不力，揚言抵制法國貨。參見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30000/newsid_7335700/7335755.stm ;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lefu-04172008105607.html>

- (一) 周小平撰写的文章涉及哪些国家或地区？主要探讨哪些话题？
- (二) 周小平谈及各个国家或地区时持有怎样的态度 / 立场为何？展现何种民族主义特征？
- (三) 周小平探讨的各类话题、谈及的国家或地区，以及所持态度 / 立场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小平的文章显示出怎样的变化？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的分析对象为周小平在部落格、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表的自己署名的所有文章。而由现有搜集的数据显示，周自 2006 年起就已在部落格上撰文，尔后陆续在微博、微信等不同的网络平台上发表文章，目前部落格与微博都已停止更新，微信公众号 - 「今日平说」 - 仍每天持续经营。基于此，我们搜集文章的时间范围，系从 2006 年 2 月 21 日搜寻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之间，所有周小平自己署名的文章；而时间点的选取理由，是由于我们目前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取得者，最早就是 2006 年 2 月 21 日；而本研究搜寻日期的截止日为 2017 年上半年（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即以此作为截止日。

由于研究对象是周在 12 年间发表的所有文章，本文的分析对象实际上是总体 (population)，而非通过抽样方法获取的样本 (sample)。两位传播科系硕士研究生经训练熟悉文章筛选条件后，在周的部落格、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今日平说」中浏览并挑选出署名「周小平」的全部文章。最终搜集 506 篇文章纳入内容分析，其中部落格的文章计有 124 篇 (24.5%)、微博 12 篇 (2.4%)、微信公众号 370 篇 (73.1%)。

二、内容分析说明

本研究内容分析类目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周小平文章的基本数据，第二部分为周小平文章探讨的国家或地区、探讨的话题，第三部分则是周小

平文章中显示出的民族主义特征。

第一部分文章的基本数据包括发表日期、字数、来源（部落格、微博、或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评论量（适用于部落格和微博文章）、点赞量和打赏量（适用于微信公众号文章）。此部分也记录文章标题的呈现方式，包括标题的字数、是否使用感叹号和使用感叹号的数量。

第二部分周小平文章探讨的国家和地区类目列表主要来自研究人员阅读周文章过程中的观察，包括中国大陆、美国、中国香港、台湾、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北韩）和其它。编码中，一篇文章可以谈及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当所谈及的国家或地区不在列表之中，该项目被标记为「其它」。当一篇文章主要谈论非中国大陆的国家或地区但同时提及中国大陆，则只标记它所谈论的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

为了分析周小平文章涵盖的具体内容，本文对文章探讨的主要话题进行了编码。话题项目的编码类目主要来自于研究人员和编码员在信度测试阶段对样本文章的阅览总结和归类分析，经过几轮仔细调整，最终确定的话题类目包括以下几类：国家政策、社会事件、恐怖主义、政治、军事、历史、环境、经济分析、社会文化现象、自然灾害、个人故事、辟谣、针对特定人物和其它。每个类目的编码操作定义参考表一。编码中，当一篇文章谈及的话题无法归类到已有类目，该项目被标记为「其它」；当一篇文章谈及多个话题，则标记为「混合」。

表一：周小平文章话题编码定义

主要话题	定义
国家政策	讨论政府颁布的新的法律和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大陆
社会事件	讨论公共事件和案件，例如反腐案件、辱母案等。

恐怖主义	评论国际范围内恐怖组织的活动和各国的应对
政治	政治议题, 例如国际关系、领导人会晤、半岛局势等
军事	军事议题, 例如航母、军事演习、武器买买、局部军事冲突等
历史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历史文献
环境	自然议题, 例如雾霾、沙尘暴、全球暖化等
经济	经济议题, 例如股市、房价、贸易等
社会文化现象	文化议题, 例如瓷器, 影视、音乐、体育等
个人故事	讲述周小平的个人经历和感触
辟谣	澄清或反驳正在流传的(周小平认为的)假消息
人物	聚焦某个公众人物, 对其行为和思想的评判
其它	文章探讨的话题不包含在以上任何类目中
混合	文章话题内容涵盖以上多个类目

第三部分为周小平文章中显示出的民族主义特征。主要分析文章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的国家或地区所持态度 / 立场, 意在对比周的文章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的不同态度, 从而展示周文章的民族主义倾向。通过信度测试阶段对样本文章的初步分析, 我们发现周小平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显示出区分对待执政党和普通民众的特点。以此为依据, 我们对以下三个项目进项编码: 对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共产党和中国大陆主要政府机构)的态度, 对中国大陆民众(知识分子、媒体、政府和社会机构普通从业人员)的态度, 以及对非中国大陆的国家或地区的态度。此三个项目的编码类目均为赞扬、批判、中立。

三、编码与信度

本研究由两名传播科系的硕士研究生担任编码员。在编码进行之前, 研究人员准备了相近的编码表和编码指南, 并对两位编码员进项了训练, 确保编码员对于编码类目的内涵具有准确的认知和共识。

在信度测试阶段, 我们从研究对象总体(506 篇文章)中随机抽取了 97 篇文章(约占总数的 19%)作为测试样本。Wimmer 与 Dominick (2003) 认

为，从总数抽取 10% 至 25% 的份额进行信度检测是适当的。根据初步信度测试的结果，我们对信度较低的类目进行的相应的调整和修正。经过再次测试，核心编码类目的编码员相互信度 (Krippendorff's alpha) 在 .82 至 1.00 之间，达到较高的编码互相信度 (引自 Riffe, Lacy, & Fico, 2014: 121)。核心类目的编码员互相信度参见表二：

表二：编码类目的编码员互相信度

编码类目	编码员互相信度	
	Agreement %	Krippendorff's Alpha
话题	96.91	0.96
国家和地区		
中国大陆	96.91	0.93
美国	97.94	0.96
中国香港	100	--
台湾	100	1.00
俄罗斯	100	--
英国	100	--
法国	100	--
德国	100	--
日本	100	1
韩国	100	1
朝鲜	100	1
民族主义		
对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	93.81	0.82
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	94.85	0.86
对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	97.94	0.95

肆、研究发现

首先，从发表平台来看，周小平的 506 篇网络文章绝大部分发表在微信公众号 (73.1%)，其次是部落格 (24.5%)，只有少量发表在微博 (12%)。这些文章的发表年份主要集中在 2012 至 2017 年之间，其中，部落格为 2006

年至 2010 年主要的发布平台，微信公众号为 2014 年之后主要的发布平台。发表年份与发表平台数据参见表三。文章字数和阅读量方面，大多数文章字数处在少于 3000 字或 3000 到 7000 字的区间 (88.8%)，极少数文章的字数多于 11000 字 (2.2%)。从文章阅读量来看，近一半的文章阅读量大于 10 万次 (58.1%)。

表三：周小平文章的发表年份与发表平台

发表年份	发表平台			总数
	部落格	微博	微信公众号	
2006	45	0	0	45
2007	1	0	0	1
2008	1	0	0	1
2009	1	0	0	1
2010	1	0	0	1
2012	41	0	0	41
2013	22	0	0	22
2014	5	6	12	23
2015	3	5	29	37
2016	4	1	175	180
2017	0	0	155	155
总数	124 (24.5%)	12 (2.4%)	371 (73.1%)	507

对比部落格和微信公众号两个主要发表平台发现，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M=4.46$, $SD=1.09$) 大于部落格文章阅读量($M=2.29$, $SD=1.17$)，这两个平台文章的阅读量之间存在数据显著性差异 $t(493)=18.79$, $p<.01$ 。同时，两个平台文章的字数也存在数据显著性差异 $t(493)=3.21$, $p<.01$ ，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字数($M=1.77$, $SD=.65$)大于部落格文章的字数($M=1.52$, $SD=.81$)。另外，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字数($M=5.95$, $SD=1.21$)与部落格文章标题字数也显著多于部落格文章标题字数($M=3.50$, $SD=1.21$)， $t(493)=19.59$, $p<.01$ ；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感叹号数量($M=1.74$, $SD=.81$)也显著多于部落格文章标题感叹号数量($M=1.07$, $SD=.26$)， $t(493)=13.75$, $p<.01$ 。t 检验法分析结果参见表四。

表四：t检验法对比部落格与微信公众号的主要描述统计

	部落格	微信公众号
--	-----	-------

	<i>M</i>	<i>SD</i>	<i>M</i>	<i>SD</i>	<i>t-test</i>	<i>p</i>
字数	1.52	.81	1.77	.65	3.21	.002
阅读量	2.29	1.17	4.46	1.09	18.79	.000
标题字数	3.50	1.21	5.95	1.21	19.59	.000
标题感叹号数量	1.07	.26	1.74	.81	13.75	.000

除阅读量之外，评论量、点赞量和打赏量也是衡量周小平文章在读者当中的接受程度的重要标准。但由于平台功能的限制，发表在部落格和微博的文章只能统计评论量，而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只能统计点赞量和打赏人数。内容分析结果显示，部落格和微博文章中有近一半的评论量少于 50 条（47.8%），大约四分之一的文章的评论量在 51 至 200 条之间，只有少部分文章的评论量大于 500 条（19.9%）。微信公众号文章中，点赞量处在小于 7000 次的文章占 72.1%，仅有 4.3% 的文章的点赞量大于 11000 次；打赏人数小于 2000 的文章占 96.90%，仅有 2.7% 的文章测打赏人数大于 3500 人。另外，Tau 分析发现，所有文章的阅读量、微信公众号文章的点赞量和打赏人数，都与发表年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Tau 分析的详细数据参见表九。

研究问题一旨在探讨周小平文章中谈及的国家或地区和主要话题的范畴，编码结果显示周小平文章最常谈论的是中国大陆（58%），其次是美国（25.8%），其它国家或地区所占的比重相比中国大陆和美国而言非常小。例如，谈论台湾的文章占有所有文章的 3.2%，紧随其后的韩国占 1.8%，日本占 1.4%。谈论中国香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和朝鲜的文章数量均小于 1%。另外，存在小部分文章（5.5%）谈及了多个国家，极少量的文章谈及了非已有列表里的国家或地区（1.6%）。国家和地区详细数据参见表五。

文章谈及的主要话题方面，政治（29%）、社会文化现象（17.2%）、社会事件（15.6%）是最常见的话题，此外也有较多文章谈及经济（9.1%）、个人故事（7.9%）、人物（7.1）以及军事（5.3%）话题。恐怖主义（0.6%）是被谈及最少的话题。极少量的文章（0.8%）涵盖了多个话题类目。总体而言，周小平文章谈及的话题比较分散，不存在像国家或地区分类中一个或两个类目占据很大比例的情况。话题类目详细数据参见表六。

表五：周小平文章谈及国家或地区

国家或地区	则数	百分比
-------	----	-----

	(N)	(%)
中国大陆	294	58.0
美国	131	25.8
中国香港	3	.6
台湾	16	3.2
俄罗斯	4	.8
英国	1	.2
法国	2	.4
德国	1	.2
日本	7	1.4
韩国	9	1.8
朝鲜	3	.6
其它	8	1.6
混合	28	5.5
总数	507	100.0

表六：周小平文章谈及主要话题

主要话题	则数 (N)	百分比 (%)
国家政策	9	1.8
社会事件	79	15.6
恐怖主义	3	.6
军事	27	5.3
历史	6	1.2
环境	9	1.8
经济	46	9.1
社会文化现象	87	17.2
个人故事	40	7.9
辟谣	6	1.2
人物	39	7.7
其它	5	1.0
政治	147	29.0
混合	4	.8
总数	507	100.0

研究问题二探讨周小平在其文章中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所持的态度和立场，编码结果显示周小平文章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其中，在中国大陆方面，周小平文章谈及执政党和政府时与谈及普通民众时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具体而言，对待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即中国共产党和主要政府机构，所有的文章都持赞扬(72.8%)或中立(27.2%)的态度，不存在任何一篇文章表现出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

包括知识分子、媒体，以及政府和社会机构普通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文章持中立（80.3%）的态度，持批判态度的文章数量（13.2%）略多于持赞扬态度的文章数量（6.5%）。对待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周小平文章则显示出其对待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截然相反的态度：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吃批判（68.0%）或者中立（31.6%）的态度，只有极少数文章对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持有赞扬的态度（0.4%）。周小平文章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所持态度编码结果参见表七。

研究问题三探讨周小平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所持的态度与其文章中谈及的具体国家或地区以及谈论的话题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旨在进一步展示周小平文章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为了回答这个研究问题，我们首先对谈及国家和地区的文章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的态度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在对待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态度方面，除了谈及俄罗斯（4篇）、朝鲜（3篇）和英国（1篇）的8篇文章之外，所有的文章对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都是赞扬多于中立，无任何批判态度【 $\chi^2 = 49.05, df = 12, p < .001$ 】；在对待中国大陆民众方面，无论谈及任何国家和地区，态度都已中立为主【 $\chi^2 = 45.74, df = 24, p < .05$ 】；在对待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方面，除了谈及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文章中各自有一篇对非中国大陆国家和地区持赞扬态度，周小平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主要持批判态度【 $\chi^2 = 179.27, df = 24, p < .001$ 】。周小平文章谈及的国家和地区与其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的态度之交叉分析详细数据参见表七。

表七：周小平文章談及國家和地區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態度的交叉分析

國家或地區	中國大陸 (N=294)	美國 (N=131)	香港 (N=3)	台灣 (N=16)	俄羅斯 (N=4)	英國 (N=1)	法國 (N=2)	德國 (N=1)	日本 (N=7)	韓國 (N=9)	朝鮮 (N=3)	其它 (N=8)	混合 (N=28)	總計 (N=507)	χ^2 值
對中國大陸執政黨 和政府態度	讚揚	63.3%	92.4%	100%	81.3%	75.0%	100%	100%	57.1%	100%	66.7%	62.5%	71.4%	72.8%	49.05***
	中立	36.7%	7.6%	0%	18.8%	25.0%	0%	0%	42.9%	0%	33.3%	37.5%	28.6%	27.2%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的民眾 態度	讚揚	9.5%	1.5%	0%	6.3%	25.0%	0%	0%	0%	0%	33.3%	0%	0%	6.5%	45.74*
	中立	71.4%	93.1%	100%	93.8%	75.0%	100%	100%	100%	100%	66.7%	87.5%	89.3%	80.3%	
	批判	19.0%	5.3%	0%	0%	0%	0%	0%	0%	0%	0%	12.5%	10.7%	13.2%	
對非中國大陸國家 或地區態度	讚揚	0.3%	0.0%	0%	0%	25%	0%	0%	0%	0%	0%	0%	0%	0.4%	179.27***
	中立	49.3%	2.3%	0%	0%	25%	100%	0%	0%	0%	33.3%	37.5%	21.4%	31.6%	
	批判	50.3%	97.7%	100%	100%	50%	0%	100%	100%	100%	66.7%	62.5%	78.6%	68.0%	

* $p < .05$, ** $p < .01$, *** $p < .000$

我们同时对周小平文章谈论的话题和文章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的态度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在对待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态度方面，经济类、个人故事类话题文章以中立态度为主，其它话题均以赞扬态度为主，其中政治类话题文章中持赞扬态度的文章所占比例最高【 $\chi^2 = 84.64, df = 13, p < .001$ 】；在对待中国大陆民众方面，赞扬和批判的态度多见于社会文化现象话题的文章中，中立态度多见于政治类话题文章中【 $\chi^2 = 48.42, df = 26, p < .05$ 】；在对待非中国大陆国家或地区方面，批判态度主要集中在政治类话题文章中，赞扬态度多出现与社会文化现在和人物话题文章中，中立态度则分散于其它各类话题之中【 $\chi^2 = 100.99, df = 26, p < .001$ 】。周小平文章谈论话题与其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的态度之交叉分析详细数据参见表八。

表八：周小平文章談論話題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態度的交叉分析

話題	社會文 個人											總計	χ ² 值		
	國家 政策 (N=9)	社會 事件 (N=7 9)	恐怖 主義 (N=3)	軍事 (N=27)	歷史 (N=6)	環境 (N=9)	經濟 (N=46)	社會文 化現象 (N=87)	個人 故事 (N=40)	關話 (N=6)	人物 (N=39)			其它 (N=5)	政治 (N=147)
對中國大陸執政 黨和政府態度	讚揚	77.8%	81.0%	100%	70.4%	66.7%	66.7%	82.8%	40.0%	50.0%	69.2%	40.0%	87.1%	50.0%	72.8%
	中立	22.2%	19.0%	0%	29.6%	33.3%	65.2%	17.2%	60.0%	50.0%	30.8%	60.0%	12.9%	50.0%	27.2%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的民 眾態度	讚揚	22.2%	7.6%	0%	0%	0%	0%	10.3%	12.5%	0%	12.8%	20.0%	2.7%	25.0%	6.5%
	中立	66.7%	70.9%	100%	100%	100%	95.7%	69.0%	80.0%	83.3%	71.8%	60.0%	86.4%	75.0%	80.3%
	批判	11.1%	21.5%	0%	0%	0%	4.3%	20.7%	7.5%	16.7%	15.4%	20.0%	10.9%	0%	13.2%
對非中國大陸國 家或地區態度	讚揚	0%	0%	0%	0%	0%	1.1%	0%	0%	0%	2.6%	0%	0%	0%	0.4%
	中立	44.4%	24.1%	0%	25.9%	50.0%	54.3%	32.2%	72.5%	66.7%	41.0%	100%	11.6%	50.0%	31.6%
	批判	55.6%	75.9%	100%	74.1%	50.0%	45.7%	66.7%	27.5%	33.3%	56.4%	0%	88.4%	50.0%	68.0%

* $p < .05$, ** $p < .01$, *** $p < .000$

研究问题四探讨周小平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的变化，我们通过用 Kendall's Tau 分析发表年份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回答这个问题。分析结果显示，文章发表年份与文章字数【Tau=.213, p<.01】、阅读量【Tau=.59, p<.01】、打赏人数【Tau=.254, p<.01】、标题字数【Tau=.66, p<.01】、标题中感叹号数量【Tau=.46, p<.01】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Tau 相关性分析的详细数据参见表九。

表九：发表年份与主要描述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1.发表年份	--					
2.文章字数	.213**	--				
3.阅读量	.592**	.159**	--			
4.点赞量	.586**	.065	.537**	--		
5.打赏人数	.254**	.154**	.349**	.607**	--	
6.标题字数	.658**	.199**	.417**	.448**	.225**	--
7.标题感叹号	.459**	0.06	.334**	.357**	.218**	.474**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我们同时将周小平文章发表年份与其对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国家和地区的态度、谈及的国家和谈论的话题进行交叉分析，来观察这些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对非中国大陆国家持批判态度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长，对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持赞扬态度的文章在2016年以后减少，对中国大陆民众持赞扬态度的文章在2016年以后也出现减少的趋势。在谈及的国家方面，在2006至2010年之间，周小平的文章只谈论中国大陆。在2012至2014年之间，主要谈论的非中国大陆国家只有美国、日本和朝鲜。2015年以后周小平才逐渐开始谈论西欧国家（英、法、德）、俄罗斯、韩国和中国香港。在话题方面，在2006至2010年之间，周小平的文章主要集中谈论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和个人故事，而2012年至2017年之间，其文章的话题以政治、社会事件和社会文化现象为主。发表年份与核心变量的交叉分析参见表十。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

發表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χ^2 值
	(N=45)	(N=1)	(N=1)	(N=1)	(N=1)	(N=41)	(N=22)	(N=23)	(N=37)	(N=180)	(N=155)	(N=507)	
讚揚	1	0	1	0	0	31	15	23	31	158	109	369	
中立	44	1	0	1	1	10	7	0	6	22	46	138	153.66***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執政 黨和政府態度													
讚揚	0	0	0	0	0	0	0	7	4	17	5	33	
中立	44	1	0	1	1	23	13	13	31	141	139	407	102.30***
批判	1	0	1	0	0	18	9	3	2	22	11	67	
對中國大陸的民 眾態度													
讚揚	0	0	0	0	0	0	1	0	0	1	0	2	
中立	44	1	1	1	1	13	14	3	13	24	45	160	154.19***
批判	1	0	0	0	0	28	7	20	24	155	110	345	
對非中國大陸國 家或地區態度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續一）

發表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χ^2 值
	(N=45)	(N=1)	(N=1)	(N=1)	(N=1)	(N=41)	(N=22)	(N=23)	(N=37)	(N=180)	(N=155)	(N=507)	
國家政策	0	0	0	0	0	0	1	1	1	5	1	9	
社會事件	0	0	1	0	0	2	1	4	6	52	13	79	
恐怖主義	0	0	0	0	0	0	0	0	2	0	1	3	
軍事	0	0	0	0	0	0	0	0	2	4	21	27	
歷史	0	0	0	0	0	0	1	0	0	1	4	6	
環境	0	0	0	0	0	0	0	0	2	3	4	9	
經濟	17	0	0	0	0	1	0	2	1	10	15	46	432.82***
社會文化現象	7	0	0	0	0	2	7	10	13	31	17	87	
個人故事	16	0	0	1	0	2	1	3	2	10	5	40	
關謠	0	0	0	0	0	0	0	0	0	2	4	6	
人物	3	0	0	0	1	10	3	0	2	13	7	39	
其它	1	1	0	0	0	0	1	0	0	0	2	5	
政治	0	0	0	0	0	24	7	2	6	47	61	147	
混合	1	0	0	0	0	0	0	1	0	2	0	4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續二）

發表年份	2006 (N=45)	2007 (N=1)	2008 (N=1)	2009 (N=1)	2010 (N=1)	2012 (N=41)	2013 (N=22)	2014 (N=23)	2015 (N=37)	2016 (N=180)	2017 (N=155)	總計 (N=507)	χ^2 值
中國大陸	45	1	1	1	1	25	21	18	31	94	56	294	
美國	0	0	0	0	0	11	0	5	4	62	49	131	
香港	0	0	0	0	0	0	0	0	0	0	3	3	
台灣	0	0	0	0	0	0	0	0	0	12	4	16	
俄羅斯	0	0	0	0	0	0	0	0	0	3	1	4	
英國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法國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109.13***
德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日本	0	0	0	0	0	1	0	0	0	2	4	7	
韓國	0	0	0	0	0	0	0	0	0	2	7	9	
朝鮮	0	0	0	0	0	0	1	0	0	1	1	3	
其它	0	0	0	0	0	1	0	0	0	2	5	8	
混合	0	0	0	0	0	3	0	0	0	1	24	28	

* $p < .05$, ** $p < .01$, *** $p < .000$

伍、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日益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如何对其人民解释国际政治的矛盾，成了官方关心的要务。尤以近年来因特网的发展，一方面让官方可以藉此工具传递其官方民族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民众亦可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甚至建构民间版的网络民族主义，然而在官方的限制之下，网络民族主义愈来愈局限于文字与图像的表达，致使论者担心，「聚焦在图像 / 表情包的层次，恐将意义流于表面，甚至「这种具有强大视觉冲击的集体符号展示与视觉冲击，正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参与者在理性沟通、深度交流方面的欠缺」（郭小安、杨绍婷，2016，页 70）。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整个网络民族主义的动能退缩至此？或者，反过来问，中国官方在民间社会施以何种作用，让网络民族主义的讨论能量逐渐导向官方所欲的方向？这即是本研究所解答的问题。

根据 Hughes (2000) 的观察，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发生后，来自中国民间发动的民族主义有其激进的批判性格，特别是在网络上的言论，除了针对中国政府处理涉外事务的无能，还会批判政府行政的低效率。这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这种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必须严加控制，否则反伤自身，故而在让人民获得有限的言论表达空间之外，又要不至于威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如何拿捏这中间的尺度，成为共党政府关心的要务。本文认为，一方面，官方会运用其媒体大力宣传对外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会运用民间亲官方的力量，稀释来自草根的网络民族主义之社会动能。

本研究关注后者，亦即探讨这种亲官方的民间力量如何展现官方允许的网络民族主义，并试图解析其内涵。首先，根据前文分析，周小平仅对于中国大陆（与极少数国家）表现正面的态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皆呈现负面的批判。例如，周小平讨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大陆与美国，这两者占比将近八成四，从他多半对于中国官方施以赞美、而对其他国家施以批判的立场来看，这也反映了中国在实现伟大的「复兴之路」时，周小平认为美国就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例如周小平在〈我们依旧喜欢你，像风再走两万五千里去看你〉之中写到：

……当美国人掌握着如此庞大的资源和全球霸权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要么恭顺地走进那片黑暗，要么发起一轮新长征，去拼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和多年前一样，我们相信什么，就终会得到什么。因此周小平时常都会问身边的所有人：「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终会取得胜利吗？你相信我们能战胜美国吗？你相信未来维持世界秩序的是我们中国人吗？」

此外，在民族主义的交叉分析之中，相比于其他话题，周小平对于中国大陆共产党 / 政府的赞扬，多集中于政治类话题；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赞扬（与批判），多集中于社会文化现象，而对于中国大陆民众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多集中于政治类话题。这意味着，在周小平看来，中国大陆民众可以参与社会文化现象的讨论，且无论好坏，周小平都会给予一定的评价。然而针对政治议题而言，周小平认为人民像是一种中性的存在，或说于政治而言是无涉的。进一步而言，周小平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即是汪宏伦（2014）所谓的「维护既有政体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对于国家主权的强调高于人民主权的概念。周小平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人民反抗国外势力（主要是美国）的目的最终是要维护共党政权，而除却此目的之外，人民在政治议题中就可以缺位。换句话说，周小平试图在对外意识形态与对内维护政权之间建构连结的关系，而前述网络民族主义所开展出来的人民对外事务的讨论与政治参与空间（如批评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失当与递交请愿书的集体行动），全然消失在周文之中。

其次，根据新闻报导，共党政府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国家网信办）于 2011 年 5 月成立，主要职责是「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光明日报，2011 年 12 月 22 日）；三年后（2014），由其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同时筹建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由国家网信办承担职责（观察者网，2014 年 8 月 28 日）。这两个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表示「习近平亲抓亲管网络...新组建的网信办大权在握，直接代表中央处理

一切与互联网信息管理相关的工作，并负责协调党、政、军、警、人大等各相关部门，对网络监管采取统一行动」（〈设 20 局级单位 到处招兵买马 网信办大扩张 新总部将落成〉，2015 年 1 月 12 日）。

另一方面，2012 年中国大陆微博用户数量 3.09 亿，2013 年年中时却降至 2.76 亿（简立欣，2014 年 7 月 25 日）；相对而言，微信的用户从 2012 年 9 月时的 2 亿，到 2013 年 1 月时已突破 3 亿（〈微信用户不到两年突破 3 亿〉，2013 年 1 月 18 日）。换言之，这两大在线社交平台的用户数，在 2013 年时已呈现「黄金交叉」，尔后微信用户数更是势如破竹，该平台所属公司的主席马化腾表示，在 2018 年春节时公布的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 10 亿（〈马化腾：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十亿〉，2018 年 3 月 5 日）。在中共官方看来，微信显然是「舆论重地」，极待治理，而在治理机制尚未成熟以前，便需要亲官方的民间写手加以协助，而这也是周小平之所以受到注目的兴起背景

从周小平文章发表的字数与数量来看，微信公众号都已超越部落格与微博：在 2014 年时，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数量（12 篇），首度超越部落格与微博的总和（11 篇），自此之后差距更不断扩大。若将周小平（与花千芳）在 2014 年 10 月时受领导人召见，视之为官方为了因应新媒体的发展需要，而吸纳民间写手的起始，那么我们也可从周小平从部落格、微博、继而将经营重心转移至微信的过程中，发现他被吸纳后的立场变化。

表十一：部落格与微信平台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

	部落格	微信
赞扬	47%	81%
中立	53%	19%

从表十一中可看出，2006 年 1 月，周小平开始在部落客发表的文章，其对于政府的态度是持中立看法的比例超过五成，亦即从文章中判断不出周小平是否护党爱国。然而，就在 2014 年 2 月周小平逐渐将经营重心转往微信之后，他对于政府的赞扬提高至八成，这表示周小平已确立其「维护既存政

体的民族主义」之立场。这或许是一种「爱国网红」的特性，亦即能配合政府的需要来弹性调整自己的立场，即使先前对于政府的看法并非都是赞美与正面。

最后，本文试图在官方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之间，建构「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讨论，然而综观全文，这种讨论包含着许多限制。特别是，对于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内涵，我们主要实行周小平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立场 / 态度进行分析，如此不免过于简化。其次，官媒的对外报导或评论，与爱国网红之间的差异是什么？这点是透析官方民族主义与爱国网红的民族主义之间的重要关联，限于篇幅，本文也未能有所交代。再者，2014 年周小平将其经营的重心往微信发展，其原因究竟是配合政府治理的需要，还是他看到微信上营利的的前景？这点也有待后继研究。

参考书目

- 〈习近平寄语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希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2014 年 10 月 16 日）。《澎湃新闻》。上网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1399
- 〈马化腾：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十亿〉（2018 年 3 月 5 日）。《新华网》。上网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5/c_1122488991.htm
- 〈微信用户不到两年突破 3 亿〉（2013 年 1 月 18 日）。《人民邮电报》。上网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c114.com.cn/news/52/a741599.html>
- 〈新浪微博发布活跃用户数，网友：和微信之间差多少个支付宝？〉（2017 年 2 月 27 日）。《每日头条》。上网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s://kknews.cc/tech/p8q3gep.html>
- 〈一度被力捧 周小平丢四川作协主席头衔〉（2018 年 3 月 24 日）。《中央社》。上网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3240123-1.aspx>
- 〈设 20 局级单位 到处招兵买马 网信办大扩张 新总部将落成〉（2015 年 1 月 12 日）。《星岛日报》。上网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s://goo.gl/iWCzqY>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设立〉（2011 年 12 月 22 日），《光明日报》。上网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12/22/nw.D110000gmrb_20111222_7-04.htm?

div=-1

- 〈国家网信办重组 国务院授权其负责互联网内容管理执法〉，《观察者网》。上网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8_28_261572.shtml
- 〈韩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抵制韩货〉（2017年3月20日），《BBC 中文网》。上网日期 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9324756>
- 〈中国奔驰广告引达赖名句 人民网：「与中国人民为敌」〉（2018年2月7日），《上报》。取自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901
-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分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36: 33-53。
- 王喆（2016）。〈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36: 75-90。
- 吴叡人译（1999）。《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原书：Anderson, B.[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Verso)
- 汪宏伦（2014）。〈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制度、情感结构与认识框架〉，《文化研究》，19:189-250。
- 李金铨（2002）。〈中国媒介的全球性与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74-200209135.pdf>
- 周逵、苗伟山（2016）。〈竞争性的图像行动主义：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种视觉传播视角〉，《国际新闻界》，36: 129-143。
- 张明杰（2017年5月12日）。〈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工作主动权——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环球视野》。上网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globalview.cn/html/zhongguo/info_17898.html
- 张铭坤译（2017年11月10日）。〈APEC 习近平：全球化是不可逆转潮流〉，《中央社》。上网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1100231-1.aspx>。
- 郭小安、杨绍婷（2016）。〈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国际新闻界》，36: 54-74。
- 杰伊（2016年6月1日）。〈把果冻钉在墙上？他们真的这样管住了互联网〉，《端传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1-mainland-fiftycents/>
- 闵大洪（2009）。〈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以中日、中韩关系为对象〉。取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03.html>
- 简立欣（2014年7月25日）。〈微博没落 腾讯不再推新功能〉，《旺报》。上网日期：2017年12月15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25001988-260309>
- 黄煜、李金铨（2003）。〈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媒体建构〉，《台湾社会研

- 究季刊》，50: 49-79。
- 杨国斌 (2016)。〈英雄的民族主义粉丝〉，《国际新闻界》，36:25-32。
- 郑素侠 (2017)。〈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因素：一个媒介使用的视角〉，《国际新闻界》，19(12): 138-153
- 刘海龙 (2017)。〈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4: 27-36。
- Bislev, A., & Li, X.(2014). Conceptualizing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e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an era of China’s global ri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1(1-2), 21-33
- Cairns, C., & Carlson, A. (2016). Real-world islands in a social media sea: Nationalism and censorship on Weibo during the 2012 Diaoyu/Senkaku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 225,23-49
- Liu, S.D.(2006).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1), 144-155.
- Hyuna, K. D., & Kimb, J-h.(2015).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sustaining the status quo: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nationalism, and system support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7), 766-781.
- Hassid, J. (2012).Safety valve or pressure cooker? Blogs in Chinese political lif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212-230
- Hughes, C.R.(2000).Nationalism in Chinese cyberspac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3(2),195-209.
- Jiang(2012), Y.(2012). *Cyber-Nationalism in China: Challenging western media portrayals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South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 Qiu, L.C.(2015).Go Baobao! Image-Driven nationalism, generation post-1980s, and mainland students in Hong Kong. *Positions*, 23(1), 145-165.
- Riffe, D., Lacy, S., & Fico, F. (2014).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3r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ullivan, J. (2014). China’s Weibo: Is faster different? *New Media & Society*, 16, 24-37.
-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Zhou Xiaoping’s papers.**

Zhongbo Liu, Juan Chen, & Chengyuan Shao*

ABSTRAC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cyber nationalism” in mainland China. The former requires the latter to show the loyalty and patriotism to the party-state, but the latter sometimes exceeds the official control, even producing criticism to for the official. In recent years, social media has emerged. The CCP regards such emerging media (WeChat) as an important sensor for the public opinion. Before it can be fully controlled, in order to guide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CCP needs the help of folk writers. The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official and constructed by online celebrity, is formed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The research object is based on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pro-official celebrity, Zhou Xiaoping, and examines his attitude/position towards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y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among the 506 articles analyzed, Zhou Xiaoping has the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of attitude between China and non-China countries or region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ormer, he is more focused on praise, and the political topic has the highest praise rate (and There is no criticism); for the latter, it is mostly criticism.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Zhou Xiaoping’s evaluation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whether praise or criticism) is mostly focused on social and cultural topics, while on political topics, it is neutral, which also shows that in Zhou Xiaoping’s view people who live in China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Zhou Xiaoping’s nationalism is a kind of “nationalism that maintains the existing political power”, which is patriot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y. In contrast to the early Internet nationalism, this nationalism has no criticism of domestic affairs.

Keywords: cyber nationalism; Mainland China; official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online celebrity

* Zhongbo Liu, Acco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Juan Che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foxisfox@126.com. Chengyuan Shao,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chool of Media and Journalism, e-mail: shaocy@live.unc.edu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数字时代的国族认同建构研究： 以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为例

杨镓民*

本文引用格式

杨镓民 (2019)。〈数字时代的国族认同建构研究：以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为例〉。《传播、文化与政治》，9:63-86。

投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 作者杨镓民为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创新经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e-mail: s98105050@ncnu.edu.tw。

《摘要》

本研究透過分析《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ies*)跟《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兩本國族主義專刊近二十年出版的研究論文內容，以瞭解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趨勢、特徵及理論發展。本研究目的有三：在兩本專刊中，有多少研究關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關係與研究發展？聚焦於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文獻，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面向呈現何種趨勢？以及試圖從這些二手文獻中歸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特徵。研究發現，相關研究多數集中於經驗研究與質化研究，缺少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關係之探討。而文獻多聚焦於數位媒體與離散國族主義的研究，並從中發展出一些新概念，如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sation)、虛擬社群／國家 (virtual communities/nations)、網路的文化親密性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文化的空間化 (cultural spatialised)，以及數位資本主義 (digital capitalism)，提供後續研究進一步討論。

关键词：国族与国族主义、国族认同、数字时代、数字媒体

壹、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2016年1月15日，台湾总统暨立法委员选举前夕，南韩艺人经纪公司JYP娱乐在虑及可能造成中国市场的损失下，要求旗下台籍艺人周子瑜为「在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与介绍自己来自台湾」的行为像中国粉丝公开道歉。透过 YouTube，周子瑜承认错误，并表明立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JYP Entertainment, 2016年1月15日）。值得关注的是，该影片在当晚8时刊登，播出短短24小时便累积三百多万观看次数、十余万则留言。透过社群网站，民众发起串联，用选票宣示「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进而在当时形成一股「回乡投票」的热潮（辛启松，2016年1月16日；张鈺闵，2016年1月17日）。该事件更被主流媒体形容为压垮一向被认为亲中政党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本土政党民进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张文馨，2016年2月3日）。

透过网络与社群媒体的扩散，从事件发生、造成热议、群众动员，到后续影响，在短短两日内让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情绪达到高点。事件发生过程，若没有 YouTube 等及时播放社群媒体，甚至没有凭借数字技术诞生的因特网，事件发生的过程又会以何种扩散速度、动员模式、影响范围等一系列国族认同建构的过程与样貌出现？换作是印刷媒体（报纸、杂志、书籍）或模拟媒体（电视、广播）是否同样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促成大规模性的动员与社会影响力？

有关媒体与国族认同建构的相关研究，19世纪末叶已有研究者开始讨论，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 1898 / 何道宽译，2005）研究报纸特性如何促成国族主义思想的盛行。而广为人知的是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于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将凝聚国族认同的想象归咎于印刷媒体的发展与扩散，并提供后续学者研究国族主义起源的新视野与理论基础（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2010）。

然而《想象的共同体》一书问世逾三十年，传播科技与环境瞬息万变，早已从印刷媒体、模拟媒体过度到「数字媒体」，进而出现「数字汇流」的

现象。数字科技与因特网的蓬勃发展，因运而生的新兴数字媒体，包括计算机、数字相机与各种行动装置，透过位传递讯息，流通到世界各地。这类新兴数字媒体和印刷媒体、模拟媒体在内容载具与使用形式产生极大差异。依此脉络，数字媒体与过去媒体在形塑国族认同的过程，在学术研究上应有进一步的比较与讨论。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整理过往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并重新检视媒介特性与国族主义的关系。再者，透过分析两本国族主义研究专刊——《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ies*)跟《国族与国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观察数字媒体与国族认同相关研究的理论发展与研究趋势。在文章结构安排，在(一)前言以后，首先讨论(二)媒体传播与国族研究的关系与文献回顾；(三)说明研究方法与期刊文献搜集过程；(四)资料分析结果；(五)讨论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趋势；(六)最后则是总结前面的分析结果，提出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之一些建议。

贰、国族研究与传播媒体

一、国族认同起源的社会建构视角

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 1983 / 李金梅、黄俊龙译, 2001)认为国族主义是一项政治原则，因为它主张政治与国族的组成单位必须等同一致，而国家政体是构成国族主义存在的重要因素。盖尔纳将国族概念区分为「文化」与「主观认定」两种定义，前者是指当两个人分享同一个文化时，这两个人才属于同一国族；后者则是只有在两个人「承认」彼此属于同一国族时，这两个人才属于同一国族(页8)。

国族的主观认定涉及了信念、忠诚、团体归属(Gellner, 1983 / 李金梅、黄俊龙译, 2001)，这彰显出国族主义的呈现即在于个人的国族认同抉择的操作化过程。因此如盖尔纳、安德森在研究国族主义的定义时，皆聚焦于「国族认同形成的过程」，而非围绕在国族主义的本质追根究柢(Gellner, 1983 / 李金梅、黄俊龙译, 页9；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 2010)。本研究即关

注哪些元素（特别是媒体）促成国族认同的形成，而「社会建构」概念不仅提供了分析国族认同形成过程具有洞见的视野，有别于探究文化上的种族特征与血缘，透过社会建构形成国族认同的论据在当前社会更具说服力。

例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83 / 顾杭、庞冠群译，2004）强调国族主义的出现是「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国族意识的形塑仰赖于特定被建构出来的「传统」以实践。因此过去被看作传统的仪式与习惯，实则为近代被发明的产物，用以凸显国族的单一与纯粹性。霍布斯邦研究 1870 年至 1914 年欧洲官方国族主义建构的过程，官方藉由公共仪式、纪念碑、雕像、建筑、国旗、格言及歌曲等发明以创造传统，并搭配教育机构的灌输来强化国族意识。霍布斯邦说明法国在第三共和时期，为了捍卫政权免受社会主义、右翼的攻击，「传统的发明」就在维护共和国与共和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将巴士底狱日订为国庆节（距离 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大革命到当时 1880 年订立国庆节，已经过了 90 年），大规模兴建投合共和国形象，以及富有爱国主义象征的地方民间人物的纪念碑等，以强化新政权的稳固性，凝聚法国国族主义。

Nora (1984-1992 / 戴丽娟译，2012) 则透过「记忆所系之处」(Les Lieux De Memoire) 的概念说明国族认同建构的过程。Nora 强调记忆所系之处是一种「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它通时拥有物质、象征与功能三种特性。例如一间档案馆，只有在人们的想象力赋予它象征光环时，它才会变成记忆所系之处。又如纯具功能性的教科书、遗嘱等，也只有在它们同时也是某种仪式的对象时，才能被视为记忆所系之处。因此，并非任何物质性的历史数据、遗迹、事物都能成为记忆所系之处；它必须具有某种象征性，使人们把集体记忆寄托在它身上，而这样的象征性会随着「人们对于过去的操作」产生变化。

从社会建构视角讨论国族认同的形成，彰显了人类在操作集体记忆与认同的主动性，而文化、种族与血缘则作为建构认同的工具。然而在形塑认同的过程，又是什么中介了记忆、人群与认同？Gellner (1983 / 李金梅、黄俊龙译，2001，页 174) 曾提及：「媒体本身抽象、统一管理、标准化，从一点扩散各方的沟通模式，所具有的强大威力与关键地位构成了国族主义的核心

理念。」透过传播媒体统一而大规模的传播，是形塑群体国族认同的重要关键。

二、传播媒体与认同建构关系

Thompson (1995) 说明传播是一种社会活动，涉及符号的生产、传输与接收；所有符号交换的过程，皆涉及某些形式的技术媒介，例如石刻、草纸、书本、报纸、广播、录音机、电视、电影等，这些媒介包含三个特征—「固着性」、「再生产性」与「时空分延」(space-time distanciation)。首先，技术媒介赋予符号固着功能，令意义的传达具有耐久性。第二，技术媒介使特定符号能够生产出多个副本，使符号的再生产更具规模性与实时性。第三，技术媒介使意义的传达打破时空限制，尤其是电信技术的问世，导致空间与时间的拆伙，意义在空间的延伸不必再依靠时间的延伸（例如书信往返需耗费一段交通时间），Thompson 将此现象视为「去空间化的同时性」，意指在不同的地区，却能够同时经验特定事件的发生。

媒介的固着性、再生产性、同时性在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早在 19 世纪末期 Tarde 对报纸形塑国族认同的特性就有独到的洞见。Tarde 指出报纸的「方言性」与「同步性」的特征，造就国族的出现：「民族之间的地理边界往往和主要的语言边界混杂……报纸真正有效的影响，止步在报纸使用的语言的边界在线（页 237）。」、「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很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并且将其命名为舆论」（Tarde, 1898 / 何道宽译，2005，页 246）。虽然 Tarde 注重讨论舆论形成的过程，然而他对报纸媒介功能的分析也适用于国族认同的形成。

针对印刷媒体的特性如何建构国族认同，Anderson 提出理论性的见解。Anderson 说明近代传播科技的革新，配合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小说、报纸等印刷媒体得以大量发行，为重现国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以小说而论，它被设计于「同质、空洞的时间」内展现同时性的特征。首先，虽然故事的角色们可能未曾碰面，但都被预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脉络」中，

具有坚实稳定存在的社会实体。第二，作者将读者设定为故事的全知者。假设故事中有 A、B、C、D 四个角色，各自展开生活，只有读者知道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做了什么事，并使读者心中唤起想象的世界。这两种性质促进了国族的建构，因为国族也被设想在历史之中，稳定发展的坚实的共同体（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 2010, 页 62-63）。

以《社会之癌》(*Noli Me Tangere*) 为例，该书为菲律宾国族英雄荷赛·黎刹 (José Rizal) 于 1887 年撰写，内容叙述西班牙殖民菲律宾期间的残暴与社会贫穷。Anderson 说明该书内容铺陈激发了菲律宾人的共鸣：「数以百计未被指名、互不相识的人，在马尼拉的不同地区，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分，正在讨论一场晚宴……在『我们会用现在还认得出来的方式来描述』『在安络格街的一栋房子』这段句子里暗示的『认得出房子的人』，就是我们一菲律宾人一读者」（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 2010, 页 64）。该书的巧妙设计唤起菲律宾人想象的共同体，且在以西班牙文撰写的内容穿插塔加洛语（菲律宾当地语言），将读者锁定在菲律宾人，也只有菲律宾人才看得懂内容的弦外之音。因此，认为许多富有国族主义色彩的小说，便是利用小说的性质，描绘特定的社会情境、人物、语言、事件（与现实读者所处的社会产生构连），得以召唤想象的共同体。

报纸也具有「同时性」的想象元素。Anderson 指出，首先在筛选报导事件与排列版面的行为，本身就显示事件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报纸版面最上方的日期，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连结，即时间的同构型。不过最重要的是，报纸的「非耐久财」特性，创造出一个群众仪式，即对于报纸的同时消费（想象）：「人们知道特定的早报和晚报绝大多数将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只在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 2010, 页 70-71）。当读者看见一模一样的报纸在超商、车站、早餐店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当中，并创造出一个匿名的共同体。再加上报纸由方言印制的特征，使得这个共同体具有清楚的「疆界」。

至于模拟媒体，Scannell (1996) 强调广播与电视的「日常性」(dailiness) 与「公共性」(publicness)，在日常生活结构，广播节目透过时间序列的展开，

将民众汇集于一个新的公众生活圈——围绕着公众人物与事件，具有条理、秩序、熟悉而可认知的公众生活世界。藉此，Cormack (2000) 认为广播的「日常性」促成人们对自身世界的想象，与报纸具有同样的功能，且透过国族语言与广播的结合凝聚特定的国族主义。

不过广播与电视跟印刷媒体在塑造想象的结构仍有差异，前者提供民众实时接触公共事务的机会；而全日持续播放的节目内容则融入民众的生活作息。因此广播与电视有别于一次性的印刷刊物，两者触及了不同的听众群 (Cormack, 2000, p. 392; Scannell, 1996)。再者，Phillips (2012) 认为电视比印刷刊物更适合作为观察日常国族主义建构的工具，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的传播不像报纸会受到某些地区识字率的限制，例如在阿拉伯世界识字率偏低的情况下，电视传播比报纸更有效果。Phillips 的意见也点出了以图像、声音为主的广播与电视媒体，与印刷刊物在媒介特性的差异。

另一方面，电子媒体的出现被认为抵制而非促进国族认同的发展。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 / 郑明萱, 2006) 在 1960 年代即预示电子媒体时代来临，将使得社会型态从文字媒体时期的个人 / 国族主义转变为「地球村」，电视、电影、广播的跨地传播促成同质化的社会，即「电子媒体的出现，使整个世界从『外爆』转向『内爆』，电科技全面延伸了我们的中央神经系统，全球也缩成了小村落，并深度地整合及去中心化」(施伯焯, 2007, 页 196)。

不过另一说，则认为电子媒体在凝聚离散国族的向心力上更具影响力。Anderson (2005) 虽然承认电报的发明、邮政系统的扩大、网络网络的铺设，使世界的连结更为紧密，因而出现早期的全球化过程。但同时他也发现诸如古巴、菲律宾的海外知识菁英，透过电子媒体持续追踪母国讯息，并影响了母国的反殖民地斗争与发展。

如上述，许多研究皆殊途同归的强调媒介的「同时性」作用在建构想像的世界的重要性，不过印刷媒体与模拟媒体在传播形式，以及由传播形式所造成建构国族认同特征亦有差异，明显不同的是，广播与电视透过「日常性」、「公众性」与实时的信息播放建构想像的共同体，而电子媒体的出现也带出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争论。

再来观察近三十年兴起的数字媒体，就传播形式上也与前两者传播技术

产生极大不同。网络是由各种技术组成，包括聊天室、电子信箱、部落格、网站、论坛等。网络的特性异于其他媒体，如网站，可以随时更新、容易架设、便宜，并且可能是最多数的人联系于网络中的一个平台模式。聊天室，在虚拟却紧密的空间，用户透过独一无二的用户名与账号参与其中。透过聊天室的互动沟通，具有同时性与口头对话的自然性。网络新闻平台，则涵盖话题广泛，任何人都能够浏览新闻而没有门坎。电子信箱，提供集体发送功能，人人都可以透过邮件联系彼此。部落格，则是介于新闻、社评、日记之间的综合平台，也提供部落客与读者的互动 (Eriksen, 2007)。所有这些沟通平台，除了如印刷媒体、模拟媒体能够被动的提供国族想象的空间，还能够被追求国族主义特定目标的组织、利益团体及个人主动地使用以建构国族认同。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询问：兴新数字媒体的出现为国族主义的研究带来何种变化与趋势？数字媒体与过往媒体形式在建构国族主义的特征有何异同？

参、研究方法与文献搜集

本研究透过梳理《国族认同》与《国族与国族主义》两本以英语出版的国族主义研究专刊，以了解数字媒体（如计算机、因特网、手机、卫星电视、CD等）与国族主义的研究趋势与特征。两本专刊来自英国，分别于1999年、1995年出版至今，是国族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本研究目的有三：

- (一) 在两本专刊中，有多少研究关注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关系与研究发展？
- (二) 聚焦于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研究文献，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面向呈现何种趋势？
- (三) 试图从这些二手文献中归纳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的特征。

本研究从两本专刊之中选择标准的研究论文分析（论文结构包含主题、

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参考书目)，排除非正规的研究论文，例如编辑室报告、书评、悼念文、学术对谈。在搜集时间范围，考虑数字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发明虽然早至1960年代，然而它被作为商业目的使用则是1980年代晚期，接着因特网的普及要到1990年代之后（Internet, n.d.），因此本研究将搜集文献范围局限与2000年至2017年出版的文章。

以一篇研究论文为单位，在筛选有关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文献的步骤：（一）根据研究论文的主题、摘要、研究方法判断；（二）其次，设定一组关键词（media, satellite, digital, internet, online, web, phone, mobile）搜寻文章内容，避免遗漏相关文献。（三）透过前两个步骤，将多数非相关研究文献剔除后，本研究对可能相关的研究进行全文阅读辨识。若该篇论文主要讨论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相关理论与现象，或者数据源以数字媒体为主，则本研究辨识为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文献。再者，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被纳为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文献的论文，本研究则更进一步的辨识该论文的研究类别（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两者皆有）、研究方法（质化研究、量化研究、混和型研究）。

排除掉非正规的学术研究论文后，总共有924篇论文（《国族认同》为372篇；《国族与国族主义》为552篇），透过筛选后符合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的文献有53篇。

除了透过上述研究方法取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趋势的轮廓，本研究针对53篇论文进行文献梳理，试图更完整地回答研究目的，以及探索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研究发展与特征。

肆、分析结果

本研究透过关键词组与质化阅读2000年至2017年两本专刊出版的文献后，筛选出53篇论文，这些论文在研究主题或研究数据聚焦于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其中有23篇（43.40%）出自《国族认同》、30篇（56.60%）出自《国族与国族主义》。比较两本专刊在这期间的出版总量（《国族认同》为372篇，占总出版量的40.26%；《国族与国族主义》为552篇，占总出版

量的 59.74%)，出版相关研究论文量与出版总量具有一致性，并没有特别集中于其中一本专刊，因此两本专刊皆具有分析与比较的价值。

在研究类别，23 篇《国族认同》专刊论文中，有 21 篇 (91.30%) 属经验研究，1 篇 (4.35%) 属理论研究，1 篇 (4.35%) 透过经验研究兼论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发展。在 30 篇《国族与国族主义》专刊论文中，有 27 篇 (90.00%) 属经验研究、1 篇 (3.33%) 属理论研究、2 篇 (6.67%) 则两者皆有。总体来说，两本专刊 53 篇论文中，有 48 篇 (90.57%) 属经验研究、3 篇 (3.77%) 属理论研究、3 篇 (5.66%) 属两者皆有。该结果显示有关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对于理论探讨与发展则占相当少数。

接着在研究方法，《国族认同》专刊中有 19 篇 (82.60%) 属质化研究、2 篇 (8.70%) 属量化研究、2 篇 (8.70%) 属混和型研究；而《国族与国族主义》专刊则 28 篇 (93.33%) 属质化研究，一篇 (3.33%) 属量化研究，一篇 (3.33%) 属质化研究。总体而言，两本专刊中有 47 篇 (88.68%) 属质化研究、3 篇 (5.66%) 属量化研究、3 篇 (5.66%) 属混和型研究。这结果指出大多数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采质化研究法，而采量化研究与混和型研究的文献则占明显少数。以上结果，请见表一。

表一：研究类别与研究方法分析结果

刊别		国族认同	国族与 国族主义	总数
研究类别	经验研究	21 (91.30%)	27 (90.00%)	48 (90.57%)
	理论研究	1 (4.35%)	1 (3.33%)	2 (3.77%)
	两者皆有	1 (4.35%)	2 (6.67%)	3 (5.66%)
	总数	23 (100%)	30 (100%)	53 (100%)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	19 (82.60%)	28 (93.33%)	47 (88.68%)
	量化研究	2 (8.70%)	1 (3.33%)	3 (5.66%)
	混和型研究	2 (8.70%)	1 (3.33%)	3 (5.66%)
	总数	23(100%)	30 (100%)	53 (100%)

注：百分比计算到小数点第二位四舍五入。

透过分析两本专刊在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文献的研究类别与研究方法，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发展集中于经验研究与质化研究，然而数字媒体作为新兴媒介技术与国族主义的理论关系，则少有文献进行讨论。

接着在一下节，本研究针对 53 篇论文进行深度阅读，试图更进一步讨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研究面向，尤其透过分析 6 篇涉及数字媒体与国族主

义理论发展的论文，了解该理论发展的进程与特征。

伍、研究趋势与理论发展

在对 53 篇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后，本研究从研究方向、数据源，以及理论探索与发展来讨论该领域整体的研究趋势与特征。

一、研究方向与数据源

在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文献中的研究子题，以「离散国族主义」研究最多，包括了印度、阿拉伯、希腊、墨西哥、泰米尔、厄立特里亚移民，以及被迫离散在外的少数民族库德族与巴勒斯坦人 (Dorman, 2005; Eriksen, 2007; Fuglerud, 2001; Field, 2014; Koukoutsaki-Monnier, 2012; Kurien, 2017; Pèrez, 2014; Saunders, 2008; Skop & Adams, 2009; Şenay, 2013)。数字媒体尤其是因特网的出现，对于离散民族凝聚认同感、相互帮助，以及推动国族主义运动具有关键的角色。

然而，在地政府与人民在面对移民所衍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尤其是资源的分配与文化的差异容易加剧当地居民与移民的冲突。因此伴随着离散民族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针对当地政府与居民如何应对移民问题进行观察与讨论 (Alessio, 2015; Caron, 2013; Kaftan, 2013; Piwoni, 2015; Olsen, 2017)。

次多的研究子题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议题与矛盾 (Capelos & Exadaktylos, 2016; Hecke, 2017; Kaiser, 2017; Lialiouti & Bithymitris, 2016; Michailidou, 2016; Molnár, 2016; Schünemann, 2017)。第三个子题则是讨论国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 (Catterall, 2011; Kaldor, 2004; Madisson & Ventsel, 2015; Renwick, 2001)。

接着，分析 53 篇论文的数据源，结果呈现多样特征，即数字媒体装置包括计算机、手机、卫星电视、CD 等皆是取得研究资料的工具 (例如 Field, 2014; Lödén, 2014; Phillips, 2012; Pèrez, 2014; Renwick, 2001; Roszko, 2015)。

除此之外，多数研究主要使用网络取得数据，网站形式包括新闻网站、网络调查、政府与非官方机构的官方网站、网络数据库，以及社群网站（脸书、推特、部落格、LinkedIn；例如 Alessio, 2015; Hecke, 2017; Ichijo, 2012; Jones, 2008; Kaiser, 2017; Madission & Ventsel, 2015; Skop & Adams, 2009）。

二、理论发展与探索

由数字科技所创造的一系列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流通更加便捷，文字、声音与影像，皆能透过网络流通于世界各地，在各种数字媒体装置中串流，包括计算机、智能型手机、平板计算机、数字相机及MP4等，形成数字汇流的奇观。数字媒体除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造成冲击，其有别于过往的媒介特性，势必对国族认同的建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整理两本专刊中针对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理论建构的著作，并归纳出数字媒体的几种特征：（一）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二）虚拟社区/国家（virtual communities/nations）；（三）网络的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 online）；（四）文化的空间化（cultural spatialised）。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种数字媒体特征皆得自于对网络、离散民族与认同关系之经验研究。除此之外，本研究还讨论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凝聚国族认同的作用，以及网络国族主义的复杂性。

首先，许多文献共同点出离散民族透过网络凝聚我群的认同感，而不会受到地域性的限制，将此现象称为认同建构的「去地域化」现象（Eriksen, 2007; Koukoutsaki-Monnie, 2012; Kania-Lundholm & Lindgren, 2015）。不过去地域化具有两种意义，就实践层面而言，第一种离散民族透过网络追求建国的路程；第二是离散民族透过网络维持传统文化与认同，建构跨国的大民族主义，而非通往建国之路的国族认同，这也彰显出民族认同的复杂性。

以第一种而言，Eriksen（2007）以散居欧洲、美国等地，持续追求独立建国的库德族为例。因为文化、语言、艺术的差异，以及库德族长期受到迫害的历史情绪，使他们逐渐酝酿独立建国的国族意识。主动或被迫离乡的库

德族人，在国外架设「库德族媒体」(KurdishMeida)网站，分享传统语言、艺术与文化，并将库德族推展至国际，以建立「库德斯坦共和国」(United Kurdistan)为目标。Eriksen 指出，由于许多库德族菁英离散各国，使得网络成巩固认同与传递信息的完美媒介。更重要的是，国族主义论述的建构也透过个人网站、部落格、新闻及聊天室等各种平台的协作具体化，各类互动平台同时创造使用者的熟悉感与亲密感，近似于真实生活的互动 (Eriksen, 2007)。

而 Koukoutsaki-Monnier (2012) 则透过研究美国的希腊移民组织网站，说明另一种非以建国为主的跨国民族认同。Koukoutsaki-Monnier 将希腊移民组织网站分为两类，即「族群属地性的」(ethnoregional) 与「在地化的」(localised) 网站，前者对祖国原乡具有强烈清楚的认同感，而后者则久居他乡是故乡，出现在地化的认同感。族群属地性强的网站，透过对过去移民历史的自传式叙事；符号化地操作母国、原乡及国族的图像；并刻意区别「他者」(美国人) 的存在，来强化认同的明确性。与彼相反，在地化的希腊移民网站，则主要使用英语传达讯息，网站内容很少提供移民历史数据，主要关注的是组织未来的任务，包括文化、教育及慈善事务等。另一方面，网站刊登移民组织在地(美国城市)的相关文章与内容，虽然这类网站仍会庆祝一年一度的希腊建国纪念日。

因此，Koukoutsaki-Monnie (2012) 认为在地化的希腊移民网站是超越既定时空，去地域化的希腊主义 (Hellenism)，与希腊移民对美国国家的认同不相扞格，如 Skop 与 Adams (2009) 研究印度移民网站内容中印度文化与美国 / 全球文化同时出现的「认同杂揉」(hybridised identities) 现象。网络的出现，不仅强化国族主义的凝聚，也彰显 (促进) 国族主义的复杂性。

除此，Eriksen (2007) 观察南非白人透过网站建构「虚拟国家」，以补偿在现实中失去的国家。随着 1990 年代南非原住民重新获得政权，南非白人在感叹已逝国土之余，透过网络联系情感，在网络空间建构出一个替代的虚拟国家。除了国族认同之外，网络也创造、强化跨国虚拟社区，例如 Saunders (2008) 分析 2006 年《日德兰邮报》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分散欧洲各地穆斯林菁英依靠网络而生的虚拟性 (internet-enabled virtuality)，建构伊斯兰共

同体、动员群众抗议、强化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双方敌对情势。

第三，网络的文化亲密性。文化亲密性是解释国族主义建构过程的一个观点，即群体形成的纽带建基于群体共同的特质、缺点，以及在共同的社会性与认同框架下的日常协商实践，尤其是在体认文化认同之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缺点时，反而提供了内部确立共同社会性的机缘（李安如，2009；Herzfeld, 1997；Kania-Lundholm & Lindgren, 2015）。

Kania-Lundholm 与 Lindgren (2015) 研究波兰在苏联解体后面对民主化、现代化与欧洲化的过程中，内部对于新旧爱国主义的纷歧。网络论坛作为「文化亲密性」的空间，提供波兰民众辩论爱国主义内涵（情绪性的、排他性、缅怀过去的旧国族主义 vs. 理性的、负责的、诉诸公民身分的新国族主义）的公共场域。在争论的过程中，除了使不同阵营的民众通过网络的文化亲密性强化各自的爱国认同，也让全体民众加入思考现代民主国家中作为公民的定义与责任。除此，网络的文化亲密性打破地理限制，将国内人民与为数居多在欧盟其他地区的移民绑在一块，共同思考波兰爱国主义的未来。

Kania-Lundholm 与 Lindgren (2015) 归纳网络的文化亲密性特征，包括社群媒体与网络空间提供单一国族内针对纷歧的沟通协商空间；强化社群的连结与亲密感，以及加速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象的再生产与中介的过程。

第四，文化的空间化，由 Skop 与 Adams (2009) 提出，他们研究迁移至美国的印度移民与移民二代，发现印度移民通过使用原乡国族导向的网站抵抗在地同化，维持印度传统价值与信仰以区别美国主流文化。这些印度移民利用新传播技术，将传统印度文化「空间化」于网络世界，选择性地上传具有怀乡象征的神话、传说、民族与历史。Skop 与 Adams 点出文化通过网络传播，网络空间不仅成为文化交流、保存与发扬的场域，更使得文化具体化于网络空间，进而形成文化的空间化，在传播媒介的本质附加了国族的象征。

再者，许多针对网络与离散民族的研究也共同指出民族 / 国族认同的复杂性与混杂性。除了前文 Koukoutsaki-Monnier (2012) 指出希腊移民网站出现「族群属地性的」与「在地化的认同」，以及 Skop 与 Adams (2009) 提及的移民文化与在地文化的「认同杂揉」现象，Eriksen (2007) 更细致的分

析四种网络国族主义：(一) 前独立的 (pre-independence) 的库德族透过网站鼓吹独立建国；(二) 多元主义的摩洛哥裔荷兰移民藉由网站协助移民在地化；(三) 南非白人在网站上建构虚拟国家以作为在现实失去国家的补偿；(四) 由智利政府推动的国族性网站召唤海外智利移民的原乡认同。

最后，有别于 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 2010) 提出欧洲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张配合宗教改革与方言传播促成欧洲国族主义的兴起, Huijsmans & Lan (2015) 提出「数字资本主义」。Huijsmans 与 Lan 关注数字资本主义、移动电话与用户的互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促成国族主义的出现。以寮国和越南边界之间的高地少数民族为例，两地在手机尚未普及以前，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两地青少年教育程度低，国家语言只限于课堂学习，日常生活仍以当地方言沟通为主，因此两地青少年的认同感也以地区为主，尚未有国家认同的想象。然而，当电信企业扩张至该地少数民族时，则逐渐在青少年使用者之间酝酿国族认同感。

由于手机价格低廉，因此普及于两地青少年群体。流通于两地的手机皆出自越南国有品牌 Viettel，使用接口为越南语。国族想象的发生，首先在于简讯的价格低廉，受到青少年青睐而作为手机沟通的主要方式，因此能够被读、写的国语在学校教育之外开始被大量使用；接着在使用统一的国家语言的过程中，青少年持续经历了想象的共同体。第二，透过 Viettel 的广告广告牌林立于偏远山区，广告牌内容的越南语及图像也成为建构国族认同的元素。第三，Viettel 促销移动电话的赠品，例如以官方统一时间为依据的日历，以及定期在国定纪念日所发送的简讯祝贺词，都成为高地少数民族凝聚想象共同体的元素——即在收到祝贺词的同时，设想其他（越南）人也正在观看屏幕。然而，寮国高地的少数民族青年则因为看不懂 Viettel 手机接口的越南文，频频跨界向越南人请教，或者干脆用猜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两者的关系（寮国人 / 越南人；Huijsmans & Lan, 2015）。

Huijsmans 与 Lan 从数字资本主义的流动观察国族主义建构过程，给予本研究重要启示，尤其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电信、3C 与其他相关产业在全球各地迅速扩张，是否进一步影响国族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值得进一步讨论。

陆、后续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透过分析《国族认同》跟《国族与国族主义》两本学术专刊，以观察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研究趋势与特征。首先，本研究透过量化内容分析，发现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相关文献多集中于经验研究与质化研究。然而数字媒体作为新兴媒介技术，与过往印刷媒体、模拟媒体在传输形式、速度、范围、内容皆产生极大的差异，在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理论关系上却少有文献进行讨论。合理推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字汇流下数据的流动性与规模过于快速与繁杂，使研究者难以梳理其中的规律，或许在研究方法上结合量化分析与大数据分析，以解决数据庞杂而难以看出端倪的困境；且在过往的媒体与国族主义理论，如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日常国族主义等等，也似乎同时适用于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的关系，使研究者理所当然的直接观察数字媒体的内容如何建构国族认同，而没有深究媒介义涵。

除此之外，更多研究则将媒介视为技术工具，转而重视特定脉络与环境条件下出现的国族主义。Anthony D. Smith (1996a, 1996b) 在国族建构论之外，强调「种族象征取径」(Ethno-symbolic approaches)，认为种族纽带与集体记忆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即共同体的构成，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共同的起源，这在解释具有古老意象的犹太国族认同则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Anderson 虽然聚焦于印刷科技的作用如何塑造想象的共同体，但他也提醒在实践的脉络不能忽略社会环境与生产形式的相互作用，促使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是一种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一种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Anderson, 2006 / 吴叡人译，2010，页 86)。

以台湾国族主义的研究为例，萧阿勤 (2012) 曾将相关研究取向划分为「想象的共同体」、「政治竞争」，以及他个人所强调的「文化民族主义」等三种分析取向。有别于政治竞争，文化民族主义认为国族国家的本质是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地理条件，而非仅只是政治操作所出现「法理的」国族国家与公民权利。文化民族主义研究更重视文化知识菁英（历史学家、艺术家、

作家等) 如何致力于保存、挖掘、甚至创造国族文化的特别之处。

然而不论研究者以何种视角研究国族主义, 由传播媒体所中介的国族符号皆是分析认同意识的必经之路,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研究进一步透过质化的深度阅读文献, 发现多数研究聚焦于数字媒体对离散国族主义的作用, 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对移民联系彼此、保存自身文化, 以及对离散民族追求建国的过程扮演了关键角色。除此, 部分研究则提出具有洞见的理论观点, 提供我们进一步探究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关系的线索。这些洞见包括去地域化、虚拟社区 / 国家、网络的文化亲密性、文化的空间, 以及数字资本主义对凝聚国族认同的功能。比较过去的国族主义理论, 对于离散民族而言数字媒体提供一种由外而内、由虚空间到现实世界推动国族运动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那些受到迫害流散于各地的民族透过数字媒体凝聚国族认同感。合理推测因特网之所以能提供离散民族凝聚国族认同,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使用成本相对低廉, 一般民众也可以透过网络传输饱含国族意涵的图文与影像

尤其是从虚拟到现实, 从「在线到线下」的国族动员模式, 提供我们理解数字媒体如何影响国族形塑的新理论视角, 这在近年台港社会运动中参杂认同因素可见一斑。而网络国族动员的内涵也愈加复杂, 特别在国家机器进入因特网以后, 例如《端传媒》先后在 2016 年、2017 年刊登两则长篇报导〈把果冻钉在墙上? 他们真的这样管住了互联网〉(杰伊, 2016 年 8 月 1 日)、〈抵制乐天, 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杨山, 2017 年 3 月 2 日), 报导 2013 年以后中国政府更积极的介入社群网站微博、微信, 「复兴路上工作室」、「共青团中央微博」、「侠客岛」、「学习小组」为代表的官方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账号开始展开大规模宣传活动。以 2017 年南韩部署萨德系统引发中国社会反韩风潮为例, 《新华社》、《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透过网络新闻与社群媒体呼吁民众抵制乐天集团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业产品与活动, 报导称该现象为「官办激进民族主义」, 意即国家直接透过网络社群媒体动员群众形成激进的国族运动, 笔者将在未来研究做进一步的观察与讨论。

前述例子也彰显数字媒体与特定环境背景(国家体制、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连结如何形塑国族主义样貌。总而言之, 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领域

是一块值得研究的学术蓝海，在被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没有如麦克鲁汉的预言国族主义被削弱、地球村的到来，反而国族主义依旧昌盛，更甚者如近几年的保守国族主义在英、美与欧洲部分国家，以及邻近台湾的中国之国族主义，皆有转趋强化的情形，而数字媒体尤其网络在这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这都彰显数字媒体与国族主义研究的重要性。

参考书目

- 李安如 (2009)。〈地铁作为「文化亲密」的空间：以台北市大众捷运系统为例〉，《考古人类学刊》，70: 79-108。
- 李金梅、黄俊龙译 (2001)。《国族与民族主义》。台北市：联经。(原书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何道宽译 (2005)。〈公众与群众〉，《传播与社会影响》，页 213-228。(原书 Tarde, Gabriel. [1901/1969]. *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Gabriel Tarde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T. N. Clark, Trans.), 277-29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吴叡人译 (2010)。《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市：时报。(原书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 辛启松 (2016 年 1 月 16 日)。《选票声援周子瑜 成大首投族搭专车返乡》，《苹果日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6/776232>
- 施伯焯 (2007)。〈媒体即用户，用户即讯息〉，《新闻学研究》，93: 193-202。
- 张文馨 (2016 年 2 月 3 日)。〈国民党 6 页败选检讨 周子瑜是最后一根稻草〉，《苹果日报》。取自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politics/realtime/20160203/789572/>
- 张鉉闵 (2016 年 1 月 17 日)。〈中国打压周子瑜 激怒年轻选民支持蔡英文〉，《苹果日报》。上网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7/777104/>
- 杰伊 (2016 年 8 月 1 日)。〈把果冻钉在墙上？他们真的这样管住了互联网〉，《端传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1-mainland-fiftycents/>

- 杨山 (2017 年 3 月 2 日)。〈抵制乐天, 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 《端传媒》, 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2-opinion-yangshang-korealotte/>
- 郑明萱译 (2006)。《认识媒体：人的延伸》。台北市：猫头鹰出版社。(原文出自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 萧阿勤 (2012)。《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市：联经。
- 戴丽娟译 (2012)。〈记忆与历史之间：如何书写法国史〉, 《记忆所系之处》(第一册), 页 15-36。台北市：行人文化实验室。(原书 Pierre Nora. (1984-1992).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In Pierre Nora (Eds.), *Les Lieux De Memoire*, vol 1 (pp.17-42). Paris: Gallimard.)
- 顾杭、庞冠群译 (2004)。〈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 年的欧洲〉, 《传统的发明》, 页 338-395。南京市：译林。(原书 Hobsbawm, Eric. (1983).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263-3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YP Entertainment (制作公司) (2016 年 1 月 15 日)。周子瑜公开致歉【影片】。YouTube。上网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7URqSp5Ew>
- Alessio, D. (2015). The dragon is not always red: the extreme right and ultra-nationalism in Wales. *National Identities*, 17(3), 289-309.
- Anderson, B. (2005). *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Capelos, T. & Exadaktylos, T. (2016). Feeling the pulse of the Greek debt crisis: Affect on the web of blam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1>
- Caron, J-F. (2013).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France's national identity: The meanings of being French. *National Identities*, 15(3), 223-237.
- Catterall, P. (2011). Democracy,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National Identities*, 13(4), 329-347.
- Cormack, M. (2000). Minority languages, nationalism and broadcasting: The British and Irish exampl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6(3), 383-398.
- Dorman, S. R. (2005). Narratives of nationalism in Eritrea: Research and revision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1(2), 203-222.
- Eriksen, T. H. (2007).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13(1), 1-17.
- Field, R. (2014). For kick and country: the 2010 VIVA World Cup and sport as a site for expressions of alternate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Identities*,

- 16(4), 377-393.
- Fuglerud, Ø. (2001). Time and space in the Sri Lanka-Tamil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7(2), 195-213.
- Hecke, M. Van. (2017). Imag(in)ing the eurocri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cartoon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199541>
- Herzfeld, M. (1997).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ijsmans, R.B.C & Trần, Thị Hà Lan. (2015). Enacting nationalism through youthful mobilities? Youth, mobile phones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n a Lao-Vietnamese borderl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2), 209-229.
- Ichijo, A. (2012). Entrenchment of unionist nationalism: Devolu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cotland. *National Identities*, 14(1), 23-37.
- Internet. (n.d.). In *Wikipedia*.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8, from <https://blog.apastyle.org/apastyle/2009/10/how-to-cite-wikipedia-in-apa-style.html>
- Jones, R. (2008). Searching for the greatest Bengali: The BBC and shifting identity categories in South Asia. *National Identities*, 10(2), 149-165.
- Kaftan, J. (2013).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periods of controversy: Celebrating Cinco de Mayo in Phoenix, Arizon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1), 167-186.
- Kaldor, M. (2004).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1/2), 161-177.
- Kaiser, W. (2017). One narrative or several? Politics, cultural elites, and citizens in 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for Europ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265491>
- Kania-Lundholm, M. & Lindgren, S. (2017). Beyond the nation-state Pol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 *National Identities*, 19(3), 293-309.
- Koukoutsaki-Monnier, A. (2012). Deterritorialising the nation? Interne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reek-American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4), 663-683.
- Kurien, P. (2017). Majority versus minority religious status and diasporic nationalism: Indian American advocacy organis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1), 109-128.
- Lialiouti, Z. & Bithymitris, G. (2016). A nation under attack: perceptions of enmity and victimh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ek crisis. *National*

-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0>
- Lödén, H. (2014). Peace, love, depoliticisation and the domestic alie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emorial messages collected after the terror attacks in Norway 22 July 2011. *National Identities*, 16(2), 157-176.
- Madisson, M-L., Ventsel, A. (2015).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self-descriptions of the Estonian extreme right groupuscule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4.995159>
- Michailidou, A. (2016). 'The Germans are back': Euroscepticism and anti-Germanism in crisis-stricken Greec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2>
- Molnár, V. (2016). Civil society, radicalism and the rediscovery of myth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1), 165-185.
- Olsen, T. V. (2017). Liberal intolerance in European education deb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4), 815-836.
- Pérez, M. V. (2014). Between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Palestinian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4), 801-802.
- Phillips, C. (2012). Team Arab: al-Jazeera and the flagging of everyday Arabism dur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3), 504-526.
- Piwoni, E. (2015). Claiming the nation for the people: The dynam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German public discourse about immigrant integr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1), 83-101.
- Renwick, N. (2001). Japan.com. *National Identities*, 3(2), 2001.
- Roszko, E. (2015). Maritime territorialisation as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2), 230-249.
- Saunders, R. A. (2008). The ummah as nation: a reappraisal in the wake of the 'Cartoons Affai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2), 303-321.
- Scannell, P. (1996). *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 Schünemann, W. J. (2017). Almost the same stories: narrative patterns in EU treaty referendum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255188>
- Şenay, B. (2013). Seeing for the state: Kemalist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in Austral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2), 376-394.
- Skop, E. & Adams, P. C. (2009). Creating and inhabiting virtual places: Indian immigrants in cyberspace. *National Identities*, 11(2), 127-147.

- Smith, A. D. (1996a). Anthony D. Smith's Opening Statement: Nation and Their Past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 358-365.
- Smith, A. D. (1996b). Memory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 372-388.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Nationalism in Digital Era:
In the Cases of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Jia-Min Yang*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two nationalism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etween 2000 and 2017,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ease ou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ends in field of nationalism and new media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study intends to understand: (1) How many research focus on digital nationalism in the two journals? (2) How do they do the research? (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nationalism and its studies? In the results, firstly, most of the articles ar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means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media and nationalism. Secondly, those articles mainly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media and diaspor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 several novel concepts include ‘deterritorialisation’, ‘virtual communities/ nations’,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 ‘cultural spatialised’ and ‘digital capitalism’.

Keywords: digital era, digital media,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Jia-Min Yang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Colleg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Email: michaeljmyang@gmail.com

邻居杀人：
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
——读杨·T·格罗斯的《邻人》及相关影片笔记

艾晓明*

本文引用格式

艾晓明（2019）。〈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读杨·T·格罗斯的《邻人》及相关影片笔记〉，《传播、文化与政治》，9:87-121。

投稿日期：2018 年 12 月 3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 艾晓明，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e-mail: tianguowawa@gmail.com。

壹、纪念碑上的空白

在波兰裔美国导演斯莱沃米尔·格伦伯格 (Slawomir Grunberg) 2005 年的纪录片《耶镇秘史》(“*The Legacy of Jedwabne*”——直译应该是《耶德瓦布内的遗产》) 的开头，一块巨大的石碑正在被拆除。这是在波兰东部的一个小镇——耶德瓦布内 (以下为表述方便，简称「耶镇」)。波兰电视台当日报导消息说：「这块石碑标志着此处为大屠杀遗址，1941 年 7 月 10 日，德国人在此将 1600 犹太人活活烧死。现在人们认识到，波兰人也参与了犯罪，但牺牲者数目不详。这座纪念碑已被移走，以便以新的方式在此遗址上纪念亡者。新的纪念碑将从四月开始建造。重建项目已经向犹太人社群咨询，旧的石碑将保存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的军事博物馆。」

新的石碑树立起来，这是在 2001 年，耶镇屠犹惨案的六十周年之际。相比起先被认为是谎言和误导的纪念碑文，新的铭文以波兰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三种文字铭刻：「纪念耶德瓦布内和周边的遇难犹太人：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这块土地的居民；1941 年 7 月 10 日他们在此地被谋杀和活活烧死。」

新的铭文上标志了受害人是犹太人，却略过了遇害的具体人数；在这里留下了空白。更令犹太人族群体愤怒的是，碑文上没有说明最核心的问题：谁是凶手？他们认为，尽管波兰在二战中深受纳粹蹂躏，但他们同样需要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耶镇的犹太人死于他们的邻人波兰人，而不是德国人；二战时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在一些小镇和小区，波兰人成为杀害犹太人的主凶。

耶镇拆除原有的纪念碑，并改写碑文和重新竖碑，与一本小书有关。2000 年，波兰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杨·托马斯·格罗斯 (Jan Tomasz Gross) 的波兰语著作《邻人》。次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¹ 这本书在 2017 年第一次有了中文简体字版 (Gross, 2011 / 张祝馨译, 2017)。

《邻人》中译本只有 232 页，算不上一本巨著。除去图片数据和文献索引，正文仅 142 页。但它却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它揭开了一桩历史悬案，即被波兰主流历史论述屏蔽了数十年的大屠杀的一种形式：邻居杀人。具体来说，二战爆发德国人入侵后，在波兰东部耶德瓦布内小镇，一天之内有 1600 名犹太人被驱入谷仓。是他们的波兰邻居将谷仓点燃。世代相熟的同胞把这些犹太家庭——从老人到婴儿、从拉比到工匠全部赶到谷仓。曾经的同学、同乡、同在一个集市、一个小区生活的波兰人残杀了另一族群的波兰人。当日，一个在此地生活了两百多年的族群被抹掉了，仅有七个人逃脱厄运。

这部著作在研究波兰－犹太人关系和大屠杀的历史上产生了突破性的影响，也引起巨大的争议。它也迫使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启动了对耶镇大屠杀的再度调查。二战后曾有过调查，但匆匆结束。同时，举世皆知的是，在耶镇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亲自前往谷仓遗址，向犹太人道歉并请求原谅。

而在距那次祭奠和道歉的十七年之后，在 2018 年 1 月 26 日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

禁止使用「波兰集中营」等词汇来形容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并在此设立的集中营，以防止人们以为波兰人也作为加害者参与了大屠杀。以色列《国土报》报导称，即使是外国人在波兰使用「波兰集中营」这样的词汇，也有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这项法案还需经过波兰参议院和总统的批准，但美联社报导称，这对波兰的右翼政府来说却是关键一步，因为波兰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波兰人是二战中的英雄，而不是与纳粹合作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薛雍乐，2018 年 1 月 28 日）。

¹ 電子書見

<http://gen.lib.rus.ec/book/index.php?md5=AD4A202A6FFA18F3950EDB0C8D1CD535>

显而易见，在波兰通过这条新法案的背景下，有关耶镇屠犹悲剧以及与大屠杀相关的民族身份、真相与记忆的争议还会持续下去，甚至更激烈。而耶镇纪念碑上这两个空白——谁杀死了犹太人、杀死了多少犹太人——依然等待着填补。

贰、挑战历史叙述：异议史学家格罗斯

格罗斯把《邻人》这本书作为他的一次挑战，挑战通行的二战历史叙述。在了解他的论述之前，我在网上查找了有关他的经历。波兰的亚当·密兹凯维奇研究所是以在全球推广波兰文化为主旨的机构，其专题网页上有关于格罗斯的详细介绍。²

格罗斯 1947 年 8 月 1 日出生在华沙，父亲齐格蒙特·格罗斯 (Zygmunt Gross) 是律师，出生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家庭。在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审判中，他也是支持波兰人民党的活动家。他曾为著名的反对党成员 Władysław Bartoszewski (九十年代出任过波兰的外交部长) 的和 Stanisław Mierzwa (律师、活动家、政治犯) 等重要人物进行过勇敢辩护，因此闻名波兰。后来他成为波兰科学院法律专业的副教授，他还是先锋音乐的作曲家。

格罗斯的母亲 Hanna née Szumańska 出生于波兰上层社会的绅士家庭，在二战中她参加了抵抗运动，是波兰家乡军中央总部信息和宣传局的联络人。她的前夫 Stanisław Wertheim 也是犹太人，是该局的报纸编辑。因为被人告发，他在监狱中被杀害。

格罗斯在纪录片里曾经谈到母亲和父亲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患难相遇。这间接表明他的研究并非是针对波兰人的偏见。战争期间，他的母亲虽然是波兰人，但她以非凡的勇气出入犹太人隔离区，拯救了许多犹太人免于灭顶之灾，其中也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格罗斯的父亲。战争结束后，她主要从事法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

² 參見 <https://culture.pl/en/artist/jan-tomasz-gross>

格罗斯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华沙的学生异议者群体，中学时代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校内的活动组织，它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异议团体，他们对当时波兰的政治制度提出了质疑。1965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先学物理一年，后转到社会学系。在大学期间，格罗斯参加了很多由异议教授在校外组织的讨论组和研讨会，从这里产生出了一批未来的学生抗议者和民主反对派活动家。格罗斯加入的小组叫「突击队员」，小组成员反对由单一的官方青年组织塑造管理学生的学术生活。1968年3月8日，华沙大学学生集会抗议，格罗斯是发起人之一。这次集会的原因是支持 Adam Michnik 和 Henryk Szlajfer，他们因政治原因被学校除名。格罗斯继而成为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位领导者。

1968年3月的抗议事件之后，他被监禁五个月。他的朋友后来在回忆中说，格罗斯在调查和审讯期间的表现无可挑剔；而不是如《邻人》后来在波兰遭受攻击时人们所指责的：格罗斯揭发举报了自己的战友。

1969年格罗斯和他的父母移居美国，以逃避波兰对犹太人的迫害。

格罗斯 1975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他曾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社会科学教授，1992年至2003年在纽约大学任政治学和欧洲研究教授。2003年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任教。³

格罗斯的研究范围是现代欧洲，集中在比较政治、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苏联和东欧政治以及大屠杀（Holocaust）。他对二战前后波兰的政治变化和大屠杀的历史有着长期的研究积累。

格罗斯的第一本着作是《德国占领下的波兰社会》（*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该书出版于1979年。其后的主要著作有《来自境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 1988），书中分析了在1939和1941年间，苏联如何将其政体强加给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

《邻人》之后，在2006年，格罗斯出版了《恐惧：奥斯维辛之后波兰的反犹主义》（*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其中探讨了波兰战后岁月的反犹事件，特别是1946年发生在凯尔采的杀戮犹太人幸存者群体的惨案。在那场屠杀中，有42位犹太人遇害，五十多人受伤。之前在

³ 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網頁上，還有關於他的學術研究簡介。詳見：
<https://history.princeton.edu/people/jan-tomasz-gross>

《邻人》一书就有一节提及此案。当时有多家工厂罢工，要求释放那些已被宣判的屠犹凶犯。⁴

格罗斯的前妻 Irena Grudzinska Gross 也是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格罗斯与她合作完成了《金色丰收》(*Golden Harvest: Event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Holocaust*) 一书。他在前言中谈到，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一张有关集中营的照片。2009 年 1 月 8 日，在波兰最大的日报上刊出一张照片，其中呈现的是二战后在特里布尔卡死亡集中营的遗址上，当地农民成群结伙在万人坑里淘宝。曾经有八十万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被送进焚化炉，却有这些老百姓在遇难者骨灰里筛选纳粹搜刮后遗漏下的珠宝或金牙。这部著作再度剖析了战后的各种反犹犯罪，从屠杀、抢劫、猎捕、敲诈、剥夺财产到在骨灰里淘金。作者继续探讨了二战大屠杀结束之后的反犹迫害，包括普通人的道德沦丧以及他们的犯罪原因。

在《邻人》的前言中，格罗斯对 20 世纪的欧洲历史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勾勒，他说，20 世纪欧洲历史经两个男人的手塑造成形，那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实施的。」他指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将仇恨制度化。「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和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

这种拉仇恨的结果导致社会各阶层、各种族、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对立；并且，秘密警察挑动人们彼此揭发，加之政府的社会动员，要求公众遵循国家的制度规范。如此，公众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压迫者的同谋。

而就二战中波兰的处境来看，共产极权和法西斯极权都蹂躏了这片土地。首先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结盟，波兰被这两个极权国家占领和瓜分，其后苏德开战，纳粹德国更让波兰惨遭浩劫。「近 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民族群。」战前，犹太人是波兰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大约有三百五十万人。到 1945 年波兰解放，大约近五百万波

⁴ 有關此案還可以查閱 2016 年一部 86 分鐘長度的紀錄片【伯格丹的旅程】(*Bogdan's Journey*)，片中反思了這一事件。參見 <https://go2films.com/films/bogdans-journey/>

兰人丧生，这其中有三百万犹太人和 1.9 万非犹太民族的波兰人。波兰无疑是纳粹入侵的受害国，波兰人也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在格罗斯书里，波兰展现了其民族形象的另一面，如他所说：「我将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

挑战在哪里？第一，格罗斯指出，传统的二战历史假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属于犹太人，另一种属于屈从于纳粹统治的某个欧洲国家的所有其他国民。但他以耶镇屠杀为例提出，这个观点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这个镇上的犹太人被波兰人杀害，说明这两个族群的历史绝非彼此脱离，而是密不可分。

格罗斯认为，在传统的分析中，有种刻板印象是，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关系受外部力量调节，具体来说先后占领波兰的苏联人和纳粹。确实，这两种力量是发号司令者，但不能因此否认在占领者强加的限制之下，也还有波兰人和犹太人关系中那种起自我主导作用的动态力量。这种自我主导的动机是需要揭示的。

一般分析还认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存在着互惠关系。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二战后波兰广大的社会阶层（以及其他东欧社会，就此而言）出现的反犹太主义，再一个是犹太人在东欧建立和巩固了斯大林主义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格罗斯认为，在这方面存在着最大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还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杀害犹太人的凶手，曾经被苏联安全部门收买为卧底，并且在斯大林时代得以脱罪，还成为新政权的基础骨干。

参、历史拼图：《邻人》的史料脉络

格罗斯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官方机构重启对耶镇屠犹案的调查，包括挖掘耶镇犹太坟场，以便进行尸检，可见该书的影响力。那么格罗斯采用了哪些史料来推翻德国人在耶镇屠犹这一定论，重现了波兰本地人屠犹的真相？

格罗斯在《邻人》的第三节〈数据源〉对此做了说明，从中可以归纳出这样几条脉络：

第一，查找德国文献，没有耶镇屠犹记录。格罗斯说，最好的史料莫过于德国文献（假如是德国人杀了犹太人），自德国军队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入原苏联占领的波兰这部分地区（包括耶镇）后，纳粹安全部门每日都有报告发布；但是，在相关档案中找不到耶镇的名字。又有亲历者提及，战时在德国的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过耶德瓦布内镇的标志，而这个片子里说的却是，波兰人如何在这样一些村镇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希望以此为自己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找借口，即波兰本地人也和他们同样地仇恨犹太人。不过，格罗斯也没有找到这个纪录片。德方史料中缺乏军队在耶镇战况的记载，这可以作为一个反证：纳粹没有在耶镇实施大屠杀。

第二，最早的一份证词来自耶镇屠杀幸存者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ztajn），格罗斯在《邻人》的前言的结尾写道：谨以此书纪念瓦瑟什塔因（这位幸存者在该书波兰版出版的当年去世）。1945 年 4 月 5 日，瓦瑟什塔因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的犹太人历史委员会作出证词，详尽陈述了 1941 年 7 月 10 日发生的耶镇居民屠犹案，格罗斯在该书第二节〈事件梗概〉中引证了他的陈述。二战后，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院迅即收集幸存者证词，瓦瑟什塔因这份证词归于「个人证词」，是这个卷宗里收录的七千多份档案之一。

第三，1949 年 5 月至 1953 年 11 月沃姆扎庭审记录（此项稍后还将详述），耶镇屠杀立案缘于波兰犹太历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举报耶镇居民参与谋杀犹太人。由此司法部门展开，对耶镇被告居民进行了开庭审理。

第四，1980 年，一部有关耶镇历史和犹太族群遇难的纪念册在以色列出版，项目由纽约和耶路撒冷的耶镇同乡会发起。⁵在这本书中有数字惨案目击者和幸存者的描述，还有部分遇难者的老照片。格罗斯有关战前耶镇生活的描述主要来自这本书中；他的书中附有的 27 张图片，有的也是来自这本纪念册。

第五，1998 年，波兰女导演阿格涅斯卡·阿诺德（Agnieszka Anold）就此案开始采访耶镇居民；格罗斯采用了其中一些采访稿。

⁵ 這本書有電子版，後來有了專題網頁，由耶鎮猶太人的親友與後代作為志願者進行網頁維護。

第六，格罗斯自己的采访。他访问了战前从耶镇移民到美国现居纽约的拉比雅各布·贝克（Rabbi Jacob Baker）——他也是耶镇纪念册一书的主要作者和编者、贝克的兄弟（他藏在耶镇周边直到战争结束）、当日在耶镇的犹太人幸存者；他也重返波兰访问了现在依然生活在耶镇的老人们。

除了以上格罗斯自己说明的数据脉络外，我们从书中还可以看到，格罗斯阅读了大量的旁证资料来讨论当时波兰乡村社会在苏德两方先后占领期间对战争的反应，其中包括未公开发表的一些记录，如前地区档案馆馆长的未命名打字稿等。在〈通告〉一节里，他引用了一个四卷本战时回忆文集里的征文。但选取的段落则是被波兰国家审查局删节的部分。他通过编辑的关系，读到了未删节版的参赛文章。对史料的这种敏感和寻根刨底，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专业素养。

在以上列举的线索中，格罗斯说道，他采用的主要文献不是来自受害人，而是来自施害人，即庭审材料。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人都已丧生，只有七位幸存者活下来，目击证人留下的文字也十分有限。战后受害人对施害人有举报和庭审，这是他书里引用的主要资料。

就庭审而言，当时的过程也很仓促，好在有前后的调查以及被告的申诉等文字留存。全案有 22 名嫌疑人被指控，开庭集中在 1949 年 5 月 16 日同一天，第二天即宣判。其中 8 人无罪释放，余下 13 人中，仅 1 人判死刑，其余罪犯的刑期在 8 到 15 年。还有一个被告是当时的副镇长，1953 年才受审，也被判无罪。相对于一千多人在一天内被屠杀的规模，只有这十来个人承担了刑责！

那么，庭审数据真的可靠吗？斯大林时代的警察机关因刑讯逼供而声名狼藉，而且被告也有人当庭翻供，说他们是被迫承认杀人。对这个疑问，格罗斯也做了说明，他的主要观点是：

这个案子在当时来说，并不属于政治案件，警察也没有进行刨根问底的调查。如前所述，庭审相当草率。这表明安全部门并不把它看作要案，只是因为有人起诉控告，它进入了司法程序，所以不能不过堂。由于调查时间仅在两周内，法庭在对案件的定性、伤害程度以及案发时间方面都发生了错误。例如，嫌疑人被认为仅仅是「参与了在耶镇对 1200 犹太族裔人群的抓捕」，

而这些犹太人「被德国人」在谷仓烧死，如此行为助长了德国利益。也就是说，这些罪犯的角色仅仅是协助者而不是主凶。而且，写错的作案时间也在几个月后才纠正。按照格罗斯的看法，既然此案只是被当作普通案件处理，作为当事人的陈述，当然就有了直接的重要性。

格罗斯认为，就嫌疑人证词来说，他们也只会缩小和弱化自己的作用，而不可能夸大。如果警方出于立功自利的目的或者政治目的办案，他们会不遗余力拿到自己想要的证据，嫌疑人也可能被迫作伪证。但就这个案子来看，嫌疑人除了抵赖和推卸责任，根本不可能否认惨案本身。镇里所有人都知道屠杀的真相，哪些人参与其中，这在当地不是秘密。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嫌疑人口供的比照，找出惨案发生的时间线，并且分析嫌疑人彼此如何描述自己和他人在案中扮演的角色。

格罗斯只是提到而没有展开，即为什么这个案件没有被重视。他提到的是，二战结束后，苏联掀起狂热的反犹运动。因此针对犹太人被波兰人屠杀的案件，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深入追究。

我们也可以说，耶镇屠犹案因此陷入了一个悖论。它没有被当作政治案件处理，但发生在纳粹屠犹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案件。而战后新入场的共产极权统治者出于本身的政治需要，竟迎合了当地犯罪者的共谋，最后就把德国人演绎成了耶镇屠犹的凶犯。

肆、偏见、暴力以及屠杀的群体性质

在一个镇上，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犹太人的拉比和天主教的神父可以并肩散步，孩子们一起上学，去舞会；邻里之间也有人情往来。虽然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语言不同（部分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大家也都彼此熟悉。为什么，在德国人接管前苏联占领区的仅两周之内，就发生了这样凶残的邻里屠戮？人们之间究竟是怎么了？

格罗斯用了三小节的论述说明有关这场屠杀的起因、与外部占领者的关系以及准备过程。

从起因来看，耶镇犹太人在波兰被苏德先后占领期间，处于多重困境。首先，当地人至今对犹太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他们亲苏，与占领者合作。第二，苏联占领期间镇压当地人，播下仇恨的种子——苏共政权把苏式政体强加给当地人，镇压反对派，强迫教徒还俗，剥夺居民财产，让本地居民在「苏维埃化」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当德军进入波兰时，他们成了解放者，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第三，作为对苏联占领者的报复，周边村镇开始新一轮检举——检举亲苏者，包括检举被认为是亲苏的犹太人。而德国人本来就是带着种族清洗计划跨境而来的，本地人的屠犹暴力和侵略者正相投合。

格罗斯通过分析表明，耶镇犹太人亲苏通敌——这是偏见而不是事实。在这方面，他采用了四种数据，一种是我前面提到的比亚韦斯托克档案专家的未公开文稿，里面提供了耶镇在苏联治下任职官员的名字；苏联当局派出了他们自己内部的官员，其中并没有犹太人。第二种数据出自纪录片导演阿诺德的两个采访；其中非犹太居民谈到犹太人亲苏，只是推论和印象，并没有具体的事实和证据。第三种资料是苏德开战后由苏联内波兰战俘重组的安德斯军团士兵传记，其中揭秘了发生在耶镇地区的一段疑案。这段时期在耶镇，有一个地下反苏组织被摧毁。而这位亲历者的描述说明，反苏组织被镇压和犹太人没关系。他们内部出了叛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因此，这两个暴力事件不能扯到一起。

但格罗斯提出一个新的也同样是挑战性的观点，来源是他的第四种资料：该地区苏联部队最高指挥官写给下级领导的备忘录，其中苏军指挥官提出，控制耶镇反苏叛军的一种方法是；先实施大赦，让反苏组织成员自首；然后从中招募线人，为苏军提供情报。这里就要谈到格罗斯说他所采用的主要数据——耶镇屠犹案庭审材料了，他在被告人要求释放的请愿书里找到了左证：不是犹太人、而是屠杀他们的波兰人，先前是自首后投向苏联占领方的线人。

在陈述耶镇屠杀案之前，格罗斯引用了耶镇周边拉兹沃夫屠杀案的长篇证词，它来自一位犹太人幸存者芬克什坦因，其中呈现了这场屠杀的另外两个特点：本地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得到德国占领者的准许，又加上以宗教为

名的政治鼓动——找害死耶稣基督的人复仇；杀戮因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有了天然合法性。不仅如此，而且，消灭了犹太人，他们的财产便成为天然的战利品和遗产任人瓜分；这就更刺激了底层民众的贪欲。

在侵略者更迭、政治冲突激烈，再加上宗教、私欲或还有个人过节等多重动机的触发下，社会的公序良俗全面崩盘。犹太人孤立无援，陷入灭顶之灾。在逃命途中，他们遭到驱赶、诅咒和威胁，也买不到食物。更有甚者，当地人把守道路，抓捕逃跑者，将他们赶尽杀绝。芬克什塔因在证言中说：「就这样，拉兹沃夫的犹太社群，在存在了五百年之后，被从地球上彻底抹除。和犹太人同时被毁灭的还有村里所有与犹太人相关的东西：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墓地。」（中译本，第 56 页，参见这一节的注释 6，中译本第 192 页）

如此，在耶镇大屠杀发生的几天之前，周边地区有 7 月 5 日翁索什屠杀惨案、7 月 7 日拉兹沃夫惨案，遇害犹太人数难以确切统计，但也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按照芬的证言，仅在他的家乡拉兹沃夫就是八百人之众）。这些屠杀都属于群体灭绝，无论老少，不留活口。再则，施暴者都是波兰人（苏德战争 6 月 22 日爆发，18 天时间里，德军还在东部战线推进，还没有来得及做地方权力交接）。而且，暴力的手段则极其残忍，包括羞辱、乱棍打死、活埋。

继而是 7 月 10 日耶镇大屠杀，描述这个事件，格罗斯首先从最有争议的方面开始梳理——耶镇屠杀与德国人的关系。

格罗斯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一个「学术问题」，这里有太多细节需要证实：他们来过没有？什么编号？哪天来的？来过多少？多年来官方已有定论是德国人屠犹，怎么可能证明不是德国人？

格罗斯从证词里发现，嫌疑人和证人说到盖世太保来过耶镇，细节并不清楚，到达时间是在当日还是之前或之后也不统一。而证人的证词在再次开庭后也有变化。如一个宪兵站厨娘的证言先是说，没看到德国人打犹太人，人都是波兰人杀的。但几个月后她说的完全不同：「有 60 名盖世太保来到耶镇」。这个证言是后来的庭审做出德国人屠犹这一结论的具体证据，但是该

案唯一的死刑犯卡罗尔·巴登却对之做出否定。他明确表达说：残杀犹太人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在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

格罗斯相信了巴登的证言，他也列出其他证言，通过比较对照，可以得到印证。能够肯定的是，新组成的镇政府与德国人在屠杀犹太人这件事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德国人的直接参与极其有限。

那么，厨娘的证词为什么会变化？我们可以想见，在当地那么多人参与的群体暴力事件，她如果指认自己的左邻右舍，势必会受到来自被告家庭和亲友的巨大压力。的确，其他被告以及家庭都写有上诉信和请愿书，其中都强调屠犹有德国人旨意，以此为自己开脱。

而巴登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诉中强调厨娘做了伪证呢？后来给波兰总统写信请求赦免，其中，他依然坚持没有看到德国人到场。我们也可以由中国俗语所谓「法不责众」的逻辑来理解，他要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众多凶犯之一，当然不应该承受死刑。如果他也赖到德国人头上，那么他的行为只能是通敌暴行，罪无可赦。

格罗斯从他所引用的证人证言里统计，参与了耶镇屠杀有名有姓的当地人有 92 个。耶镇当时的居民总共不过 2500 人，犹太人占三分之二，减去被灭绝的犹太人群体，减去波兰人口中的女性，再减去老人和孩子，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年男性都参与了屠杀！这里还不包括当事人无法指认的那些乡民，他们从邻近地区赶来参与其中。因此格罗斯说，这是双重意义的大屠杀：不仅是受害人数量巨大，而且凶手也不计其数。

伍、群体暴力的原始性与诱因逻辑

在〈谋杀〉这一节里，格罗斯通过多个证人的证词，还原了 1941 年 7 月 10 日耶镇血腥一日。清晨，邻镇的人们赶着马车源源驶入耶镇，所有的波兰成年男性已经被召集起来；犹太人被驱赶到小镇的市集广场上，据说是去做清洁。屠杀行动开始，在镇上的不同角落人们用石头砸，用棍子打，把犹太人溺死在水塘，奸杀女性，一位犹太老师的美丽女儿头被砍下来当球踢，母亲和婴儿一同被杀……成群结伙的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行凶。他们把一群

犹太人赶到墓地让他们挖坑，接着就将他们逐一打死，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刀、棍棒……

这股杀人狂潮仿佛有着自身的动力，从一个村镇向另一个村镇滚动，而且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可复制性。最后将所有人集中到谷仓里全部烧死，这也正是几天前拉兹沃夫屠杀的最后结局。从格罗斯展示的证言来看，没有德国人到达现场，也没有武装逼迫。在这个施暴过程中，暴徒们完全是自觉自愿，而且情绪高涨，花样翻新。从打碎列宁雕像，让拉比带头游街示众自我羞辱，到割去受害人舌头；最后点燃谷仓，直接将一千多人烧死……其野蛮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入侵的德国人。

这是我们不熟悉的大屠杀的模式，它也让我们回头去思考格罗斯在本书前言中提出的，每一场大屠杀有其自身的情境动力（*situational dynamics*）。纳粹固然有对犹太人的清洗计划，但让本地人介入并非在纳粹的计划中。它只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插曲，也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威胁了镇政府，要求他们必须在当日灭绝犹太人。相反，有证言表明，德国宪兵站里还藏了几个犹太人，使得他们躲过当日劫难。那么，当地人那么积极地投身于这场暴力狂欢，「这种爆炸性的潜能从何而来」？

这也就是格罗斯接下来思考的问题，在〈不合时宜〉这一节，他思考了耶镇屠杀的原始特征：它好像是一个时代错误、一个不合时宜的事件，偏离了我们所了解大屠杀的一般图景。他说，纳粹对几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当代的学术文献中，这被描述为植根于现代性的现象。因为大屠杀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一个是相对先进的杀人技术。但耶镇屠杀看起来和这两点都没关系。它仿佛是十七世纪波兰小说里农民战争中的人物从书页里走出来，带有流民暴力、土匪行动的性质。这些人并无严密的组织，使用的杀人工具也极其原始，他们没有枪没有炮，用的就是石块、木棍、铁棒、火……就地取材，即兴杀人。

格罗斯认为，这里面的影响因素有一方面是宗教宣传中的反犹迷信。例如，天主教徒相信，犹太人会用天主教孩子的血制作逾越节的薄饼。战后在克拉科夫和凯尔采这两个地方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中都有这个说法作为鼓动因素。但是他认为，更原始的动力是对物质的欲望。暴徒行凶是

为了彻底占有犹太邻人的财产，同时又意外地得到了这个机会（德国入侵）——而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传统的反犹观念。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种植根于贪欲的动力不同于战争激发的对立状态，它属于更普遍的人性之恶，也是更危险的黑暗能量。

可是，也正是这些借纳粹之力大开杀戒的刽子手们，能够被极权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在纳粹和共产波兰时期两头通吃的人物。这是格罗斯的又一发现。在〈私人传记〉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这两节分别涉及到这个问题。

首先他发现，这二十来个被告都是一群普通人。然而，这里有四个人其实是占领时期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当然，如果是为谋生计，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死刑犯巴登的自白里，他提到他还是那个地区属下耶镇的苏维埃代表。那么，问题来了，德军入境，他们为什么不躲着德国人，反而要冲出去杀犹太人呢？

格罗斯认为，他们这种政治身份的迅速转换，不是个性问题，而是适应着二十世纪极权政体那种「诱因的逻辑」(the logic of incentives)。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只是通过效忠占领者来图取利益：苏联占领时做党代表，德国人来了杀犹太人。当新政权建立起来，他们害怕自己因有过去干脏活的不良记录被敲诈，就会去做讨好现政权执政者的事情。极权政体也正好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并且通过这些有软肋的人来进行社会控制。

在杀人犯齐格蒙特的请愿书里，他写出了自己被苏联的内务委员会招纳为线人的过程。他先是按照组织上授意伪装做反苏分子，而德国人入境后；出于恐惧，他又让其弟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战后他又加入了波兰工人党。他强调自己应该得到公正对待，而他弟弟最后也得到了假释。

从这里，读者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参与屠杀的被告大多都逃脱了惩处。就这些人在战后的表现，格罗斯提出了更尖锐的推论：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是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本来就是暴力的工具，他们也很容易服务于新政权的暴力。由于这些人得到重用，他们所在的小区也没有能力抵抗苏维埃化。

陆、处理史料的新方法与民族身份反思

倘若耶镇屠杀的真相正如格罗斯在书中所述，它意味着什么？这一研究更深远的意义在哪里？

在〈处理史料的新方法〉这一节里，格罗斯写到：「1941 年夏对耶镇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启了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书写」。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焦点话题。如今，以 JEDWABNE 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大量的讨论文献。而当初在格罗斯揭示了耶镇惨案的全过程后，作者也对以往处理史料的方法、对被提纯和英雄化的波兰二战历史，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

从方法论来说，尽管他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被告的审讯文献，但他强调了重读犹太人证词的重要性。这是他审视被告证词的前提。他认为，必须首先接纳犹太人幸存者对杀人犯的指控，信以为真，直到找到确凿的反证；而不是先不取信，再去找反证。这是格罗斯提出的处理这一时期史料的新方法。他的意思是，如果对幸存者的证词像通常的做法那样首先质疑，再去取证（而活着的凶手会用各种方法脱罪）；那么，受害人的声音就淹没了。尤其是在大屠杀这样惨烈的事件中，「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少。我们必须有能力倾听从深渊传来的那些孤独的声音」。

他说，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他的研究经验。他自己也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搞清楚「把剩下的犹太人都烧死在谷仓」，这原来并不是比喻而是事实。一方面，在波兰二战史研究的历史叙述中，就没有关于波兰人参与或介入灭绝波兰犹太人的记录。另一方面，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所存在着超过七千份得到详实记录的证词。两相对照，可见研究是多么薄弱。但格罗斯指的还不仅是这一点，他要强调的是，从耶镇屠杀亲历者瓦瑟斯坦因和拉兹沃夫屠杀亲历者芬克斯坦因的证词来看，发生的暴行太残忍，超过了人们的理解力。对此格罗斯提出，研究者迫切地需要改变他们处理史料的方法。

改变什么呢？他说，所有已知的大屠杀的故事，可能是有偏差的，不能将之看作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实例。必须记住，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活下来的人讲述的，他们是幸运者，而那些在二战中惨遭灭绝的百分之九十的波兰战前

犹太人群，他们的故事已经无人能够讲述。因此对于目前仅有的证言，哪怕是只言词组，哪怕远非完整，也要确确实实加倍认真地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那些发生在黑暗中心的悲剧，远远超过了现有的文字记录。

如果说，上面的观点涉及到幸存者个人经验与犹太人受害群体的关系；那么在〈集体责任〉一节，格罗斯还指出了个人施害者的责任和民族责任的关联。他认为，就前者来说，对于那些并非出于命令、责任或者逼迫而自愿参与到屠杀里来的人，他们与执行命令的军人不同；他们也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清楚地记住，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能是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杀人犯，他们要承担罪责。」但是，格罗斯进一步指出：「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去调查，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民族（如在「德意志人」中）有能力实施这些行为。或者说，可以暂且不考虑这些残暴的行为干脆将之遗忘吗？可以从一个民族的遗产中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将之宣称为唯一的遗产而排斥其他一切吗？」

这里，格罗斯不仅是对耶镇居民屠杀犹太人叩问当代波兰人的良知，他也是在转型后的民主波兰提问。在他看来，那种单一的、固化和英雄化的民族身份建构是有问题的。若要想象民族这个共同体，不可能只是以其英雄伟业为代表，而剔除同属这个民族的暴徒恶行。应该认识到，民族身份疆界具有开放性，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赋权自己，去挑战那种僵化的、被美化的民族身份想象。如此，在历史书写中，当下的波兰人也必须面对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问题。如果在社会的集体传记里保有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在它之后书写的一切也必然丧失其真实性。人们也无法安然生活，因为他们时时要担心这种谎言被揭穿。

在结束全书的后记里，格罗斯寄望于波兰的新一代：「他们成长于拥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波兰，已准备好来直面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真实历史了。」

柒、《邻人》引起的争议、司法调查与作者响应

《邻人》在波兰引起巨大反响，超过格罗斯自己的预计。反对者举行抗议，高呼要把格罗斯丢到河里去。2001 年波兰总统到耶镇参加遇难者新墓碑揭幕典礼时，小镇的多数居民冷眼旁观，连镇议会成员也仅有两人出席。直至 2014 年，在莱沃米尔·格伦伯格的纪录片【耶镇遗产】（*The Legacy of Jedwabne*，下一节我会具体介绍）中，耶德瓦布内镇里的天主教神父依然坚持说：这一切都是趟浑水，模糊真相，搞得波兰人好像成了杀人犯。就在犹太人幸存者与后代亲友去往耶镇墓地的路上，他们看到小镇的树上贴着白纸，上面写着：「我们绝不道歉！」「德国人杀了耶镇犹太人，他们应该道歉！」……

有关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批评者认为格罗斯以偏概全。他们说，那些遇害的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从 13 世纪到 18 世纪，当犹太人在欧洲其他国家遭受迫害和屠杀而逃出时，波兰一直都是犹太人的庇护地。二战期间，在被德国纳粹占领的各个国家，有 26% 的获救犹太人是波兰人救的。1943 年 1 月开始，犹太人的战斗组织和波兰家乡军代表商讨了在华沙起义发生时的于犹太隔离区墙内外的联合行动，波兰家乡军的官员设法给他们送去了大量武器弹药。波兰也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对犹太人设有地下财政救援机构的国家。以色列以「国际义人」奖章授予世界各国帮助犹太人的英雄，在被嘉奖的 24356 人中，有 6439 位是波兰人。

有关耶镇屠杀的史学争论一直在继续，对格罗斯的批评包括而限于以下几点：他过于依赖幸存者的叙述而没有和其他数据源对照确认。他把小镇居民的态度当作全体波兰人民的态度，这是对英勇抵抗纳粹的波兰人民的玷污。他有关死亡人数的数字既不可靠，也不准确。有关耶镇凶犯也有三种观点：第一是坚持德国人杀了犹太人；第二是认为波兰人杀的，应当反省；第三是认为波兰人在德国人逼迫下杀的犹太人。

在《邻人》英文版出版后的 2002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组织了《邻人》专题研讨会，在会上，格罗斯对有关批评做出了响应。他强调，首先，他没有只用一边倒的证据，因为该书出版后，并没有新的史料出来，所有现存史料已被纳入。而如记者安娜·比康

特 (Anna Bikont) 继而发布的调查报告、阿诺德 (Agnieszka Arnold) 的 2001 年的同名纪录片⁶则更扩展和强化了《邻人》的发现。⁷

在《响应》(A response) 一文中，格罗斯引述了由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在 2001 年 12 月 1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调查说，确实，耶镇屠杀还「没有最终结论」；但是该所负责人同样申明：「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德国单位在 7 月 10 日到过耶德瓦布内。」

就死亡人数而言，有波兰历史学家认为仅在 340 人左右。特别是在 2015 年选举右翼政党上台之后，他们更强烈呼吁在耶镇重启挖掘遗骸，证明这不是波兰人干的，而是德国人的罪行。据说在耶镇遗址上次开掘时曾发现数枚德国的子弹。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也能看到一个访谈，一位前耶镇老太太说她亲眼见到，全是纳粹干的。

所谓重启掘墓，的确已经有过一次开掘。2001 年格罗斯的《邻人》出版后，为核实犯罪，由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Polish: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IPN) 调查机构在谷仓附近埋尸遗址上进行了挖掘，而这次挖掘和媒体报导中的犹太人死亡人数变更有相关性。

格罗斯在《响应》中重点对此做了说明。他声明说，他完全不想剥夺他人生命，哪怕是在纸上；他也不愿意夸大耶镇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数字。他宁愿这个数字没有那么多，但 1600 人这个数字却并不是他发明出来的。首先，这个数字或者说规模出现在很多史料描述中，有瓦瑟斯坦因的证词可以对照。而且，作为纳粹的罪行，最早是波兰当局将这个�数字刻入耶镇屠杀遗址碑铭。而在二战后的审判过程中，也有波兰人作证说有一千五百人遇害；同样的数字还出现在秘密警察的总结报告里。格罗斯书中曾引用耶镇犹太人同乡会纪念册里的证言，我也在网上查阅了他提到的证言文章，其中具体说到，耶镇屠杀的遇难者有两千左右，其中耶镇犹太居民遇难者 1460 人，其

⁶ Neighbours part 1, Youtube 上有英文字幕版

⁷ Gross, J.T.(2002).A response. *Slavic Review*, 61(3), pp. 483-489 “”，可以通過 <https://jstor.org> 檢索獲得

他大约有 600 人。这批人是因为耶镇 12 公里外的维兹纳发生大屠杀后逃到耶镇投亲靠友的 (Rogers & Hundt, 1980)。

格罗斯认为, 这些数字众所周知, 并且是既成事实。再根据 1931 年的人口普查, 那时大约就有 1600 犹太人生活在耶镇。他继而分析说, 波兰方面将遇难犹太人的总数缩小为数百人, 源于 2001 年 6 月开始的第一次遗址挖掘, 这是 IPN 调查中唯一欠缺的方面。

他说, 根据专家意见, 像耶镇这样大规模的遇难遗址, 至少要用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挖掘。但问题在于, 耶镇的挖掘仅用了五天。波兰当局决定缩短这个过程, 其说辞是要照顾犹太人的宗教情感。而根据犹太教相关律法 (Halacha), 禁止打扰人的遗体; 除非这么做可以防止更大的侮辱损害, 或者是为了挽救人的生命。格罗斯说, 他当时就发表了文章提出抗议。因为在挖掘现场, 确有来自华沙、以色列和伦敦的著名拉比先后到场, 他们在现场监督, 确认处理这些遗骸是遵循了犹太教的相关规定, 还是有哪怕任何一点违背。事实是, 只有一个公墓的最外层被打开, 那些遗骸并没有因开坟检验而受到破坏。法医当场直接认定了好几十具遗骸, 死者中有女性、儿童, 也有老年人。

2003 年 Anna M.Cienciala 在《波兰评论》48 卷第 1 期发表文章《耶德瓦布内大屠杀: 更新与回顾》(Cienciala, 2003), 她引述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2002 年 7 月 9 日, 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的检察官 Radoslaw Iwanow 发布了司法调查的最后结论。他强调大屠杀有着事先计划这一特点, 这表明德国人参与了组织屠杀。他指出, 尽管德国方面的积极参与没有被记录下来, 但人们都知道德国人如此就是蓄意不留任何踪迹。因此, 他认为, 在刑法的总体框架下, 这个罪行要归咎于德国人。但是, 参与屠杀的依然有耶镇的波兰居民, 至少有四十个男性实施了犯罪行为。有一小拨德国人很可能在驱逐犹太人到市集广场上起了协助作用。但是证人证言在这方面差异很大, 以至于不清楚他们是否参与了最后的行动, 即送这些受害人到达处决现场, 或者他们是否出现在了谷仓那里。尽管如此, 总之不能把德国人排除掉。Iwanow 评估在

谷仓最后被烧死的犹太人大概是三百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但是他也说到，在把这部分犹太人从市集带到谷仓去之前，也有犹太人被其他人杀害。⁸

IPN 的耶镇屠杀调查后来有专书出版，编者之一、波兰历史学家 Pawel Machcewicz 在导言中指出，这一历史性的调查留下了如下问题有待回答：

（一）道德问题：当代波兰人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些波兰人的态度——他们压迫犹太人，或者敌视、冷漠，拒绝帮助他们？尤其重要的还有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态度，他们对此惨案不发一声，却忙于庆祝 2001 年 5 月所有波兰主教都参与的一场感化弥撒活动。（二）政治方面：波兰国家的代表需要为六十年前在德国占领下发生的事情而承担责任吗？（三）心理 / 社会方面：一群「普通人」如何可能成为杀人犯，而且残酷杀害与之几十年来相处的邻居？（四）历史问题：真相到底是什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格罗斯的事实重建是可靠的吗？就耶镇屠杀以及发生拉姆扎和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其他 22 个村镇的屠杀，波兰人的历史观应该有哪些改变？

（见 Anna M Cienciala 书中第 51 页）

他提出的问题也是与格罗斯的积极对话，正如格罗斯所说：在直面大屠杀的历史时，也许我们有望找到的唯一安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无休无止地提出问题，对此我们也将继续寻找答案。

捌、影像对话之一：纪录片里的耶镇大屠杀

如前所述，格罗斯的《邻人》这一著作，最初来自纪录片的启发。我在网上查到有关耶镇大屠杀的纪录片有三部，其中，波兰女导演阿格涅斯卡·阿诺德（Agnieszka Arnold）为电视台制作的同名纪录片【邻人】（*Sąsiedzi*）是最早的一部。她也因此被称为「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女人」，她是比格罗斯更早揭秘耶镇屠杀真相的电影人。

阿诺德是波兰女导演、剧本作家和记者。她与杨·格罗斯是同龄人，也是校友；他们都毕业于华沙大学，她的专业是波兰研究。她执导了近三十部

⁸ 詳見：<http://info-poland.icm.edu.pl/classroom/J/index.html>

纪录片，其作品有多部聚焦于二战时的大屠杀，还有对波兰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她 1997 年开始采访耶镇惨案中的当事人、见证者和幸存者，后来她还去了哥斯达黎加、美国等地采访证人、帮助犹太人逃生的人。但她觉得【邻人】是没机会面世的。因此她放给朋友们和有兴趣的人看，杨·格罗斯因此开始关注耶镇惨案，又用了近四年时间完成他的著作。阿诺德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把自我的考虑放在一边，因为我知道，他的著作出版后，我的片子就可以和观众见面了。

果然如此，2001 年 4 月 3 日、4 日，波兰国家电视台连续两天播放了阿诺德的这部纪录片的上下集。时任波兰总统的顾问、波兰总理的顾问团队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真相令人震惊，必须了解这些事实。

这部片子网上能够找到，不过目前只有上集有英文字幕。⁹出现在格罗斯《邻人》中的人物在屏幕上说话，让观众思绪在过去和现在的耶镇流动，受到震撼也引起思索。

阿诺德在采访时也是小心翼翼的，有的人在纪录片中只留下声音而没有露脸。阿诺德记录了这样的证言，一位幸存者的后代说：

当我们跟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找罪人，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脸。他们告诉我父亲，一个人在他临终前说：「别问了，忘掉。」谁能忘记他母亲在火焰中被焚毁时的哭声？他们在那一天还敲着鼓去盖住孩子们的哭喊声，这些孩子是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被杀害的。能忘掉这些吗？

另一位见证者说：

我父亲身边有很多赶车人，在黑夜中，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犹太人塞进车里，把他们扔进沟里，一个接一个，他们都是窒息死的。第二天地面一直都在动，老百姓会过去看热闹。很多人都是

⁹ 參見 <https://vimeo.com/255173962>

活埋的，当凶手离开后，地面一直都在起伏。那些在车上的会抬起头，但是不能说话了。他们会抓住犹太人的小孩子，用他们的头去撞墙。每个人都很脏，衣服上沾满血迹。第二天妈妈往车上倒水，拿刷子把车上的血迹刷干净。我记得的就是这样。

那位隐身于黑暗中的男性说：「整个镇子都浸透了犹太人的血。如果不是父亲，那么就是儿子、叔叔或者兄弟干的。有那么大的仇恨，好像我们成了另一个民族。」

片子里有后来受审获假释的耶日·劳丹斯基，也有第一位挺身而出为惨案作证的犹太人瓦瑟斯坦因。片中出现了谷仓的旧址，也有屠杀后的坟场。一群穿白衣的犹太人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去出席活动，这个画面来自瓦瑟斯坦因的家庭录像，但他们全部消失在那一天。片中女人在问：孩子有什么罪过？砍了头当球踢，只有最坏的刽子手才这么做。如果是德国人或者俄国人这么干，我可以理解，波兰人怎么能这么干？

大约有二百万的电视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现场，听到这样的证言：

他们把这些人拖到这里杀害了，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情景。拿一把屠夫用的刀，凶手划开他们肚皮。拿棒子打头，就这么杀人。坟墓就在这里，现在是垃圾场。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后，狗开始刨底，扒出来一根骨头，就是人的肩胛骨。任何一个人，只要看到了大屠杀，过一百年也忘不了。完全无法想象人对人做出这种事。我想不出来，我也不愿意想。

2005年，第二部有关耶镇的纪录片【耶德瓦布内的遗产】(以下简称【耶镇遗产】)，¹⁰由导演莱沃米尔·格伦伯格完成。他1951年生于波兰卢布林，毕业于罗兹的波兰电影学院，1981年移民美国。格伦伯格是导演、制片人和摄影师，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

¹⁰ 【耶鎮遺產】片長75分鐘，其國際交流版有英文字幕是56分鐘，字幕可以全文下載。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Odb9ythfE>

这个片子的主要叙事线索是耶镇犹太人的后代（有些人是战前从耶镇移民到美国等国家的）和幸存者老人到耶镇参加 2001 年的新墓碑揭幕仪式的过程，随着他们行程的展开，穿插了人们对战前生活的回顾和惨案发生的情形，也记录了犹太人来到波兰后政府官员和本地人的反应。历史和现实在影像中交汇，耶镇大辩论中的各个代表性人物一一出现在屏幕上。格罗斯谈到他写《邻人》的初衷，雅各布·贝克拉比唱起家乡的歌，镇长 Krzysztof Godlewski 诉说他接受真相、推动转变的心理历程，生气勃勃的记者安娜·比康特驾车在乡间路上穿行，顶着偏见和误解，坚持探索真相¹¹。

格伦伯格去了阿根廷、以色列等国寻找耶镇幸存者，采访了曾经在耶镇生活过的犹太老人，他也请女记者比康特谈她对拯救了犹太人的波兰女性安托西亚的理解。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物，过去的事件和今天的现实构成对话。惨案的后果依然存在，幸存者在故乡无处立足：曾经的老宅被杀人者占据，他们在犹太人的血泊里建起自己的家居。一个犹太家庭的二十位成员全部被烧死……这些创伤记忆在幸存者心里从没有消失。时任镇长 Krzysztof Godlewski 决定要搬走代表谎言的老碑，但他被另一部分镇民视为叛徒。然而远道而来的犹太人代表团看到，在新的纪念碑上没有写出谁是凶手；他们在年轻人 Ty Rogers 的协调下，前往波兰外交部门表达抗议。

令人深感沉重的是，当地居民对远道而来的犹太人依然是冷漠、警觉和拒斥的。有这样一幕，格伦伯格跟拍了一位移民墨西哥的犹太老太太寻找旧居，左邻右舍都不肯告诉她老房子就在眼前。当她最后终于找到并想拍照留念时，里面的住户勃然大怒，把老人赶了出去。

安托西亚·维日考夫斯基的遭遇更能说明耶镇本地人对屠杀罪行的讳莫如深。六十年过去，她还是非常恐惧，身处本地人的谎言和敌意中，她不能对记者坦然讲出她曾将七位犹太人藏了两年半的经历。战后，她救助犹太人的行为被人知道，她和她父亲竟惨遭毒打，被骂为「犹太人的奴仆」。

影片在许多犹太人的家庭老照片迭印中结束，片尾字幕写到：耶镇大屠杀故事依然是波兰基督徒和犹太人内心和精神的痛苦创伤。人们唯一的希望

¹¹ 安娜·比康特後來完成了另一本重要著作《罪行與沉默》，2018 年 10 月底剛剛出了中文簡體版。

是：真实的历史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揭示自身，尽管这也许要等到几代人之后。

九年之后，在 2014 年，耶镇大屠杀发生七十三年周年之际，以色列导演海姆·赫特 (Haim Hecht) 拍摄了纪录片【两个谷仓】(*Two Barns*)。¹²

海姆·赫特是以色列记者，他和剪辑 Taly Golderberg 是剧本作者，【两个谷仓】片长 61 分钟。与前面介绍的两部作品一脉相承的是，在这部纪录片中，艺术家、幸存者和历史学家们，面对激烈的争议和反对，坚持不懈地寻找和讲述真相。除了幸存者外，这部影片访问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邻人》作者杨·格罗斯、加拿大的波兰裔历史学家杨·格拉博斯基 (Jan Grabowski)、波兰大屠杀研究中心负责人哈维·德瑞福斯博士 (Havi Dreyfuss)，还有受到《邻人》启发而拍摄的故事片【后果】(Aftermath) 的导演达瑞兹·雅布伦斯基 (Dariusz Jablonski) 等；此外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驻波兰大使谢瓦·韦斯 (Shevah Weiss)。

影片在谷仓大火画面中开始，格罗斯在新书发布会上，而抗议者的诅咒声不断。话外音提示出一个秘密：战后那些审讯耶镇被告的卷宗在收入档案时带有一行备注：「所有这些数据三十年后烧毁」。

可能是有人忘了销毁，六十年后，档案落到了杨·格罗斯手里。

片中循着耶镇屠杀事件前后的时间线展开，通过海姆的介绍、研究者的评论和大屠杀见证者与幸存者的讲述，影片以更多的细节证明了耶镇惨案的真实性。片中采用了很多来自大屠杀纪念馆 (YAD-VASHE archive) 档案、老照片和影像数据，包括证人录音。这些都证据确凿地揭示出：不仅是耶德瓦布内，而且，在其他村镇也发生了同样的惨案。血流成河，不是一句修辞；在惨案发生现场，人们不得不用沙子去掩盖漫过地面的人血，以便通行。

影片里还穿插了两位乐手在耶德瓦布内各个场所演奏的画面，小提琴和手风琴合奏的旋律在路边飘荡，在街头邻人的门前盘旋，在通向谷仓的路上回响。时而优美时而悲怆的乐曲伴随着故事展开，引导观众在黑暗的历史隧

¹² 影片可見：<https://vimeo.com/104504131>

道中思索，那是在惨案的现场：杀人犯的同伙用音乐演奏来掩盖濒死者的悲号。

加拿大的历史学家杨·格拉博斯基教授也是波兰华沙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大屠杀幸存者之子，毕业于华沙大学。2011 年他在波兰出版了重要著作《追捕犹太人：德国占领时期在波兰的背叛与谋杀》(*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这也是在波兰引起巨大争议的书。他在书中揭示了纳粹大屠杀的一种「人质机制」，那就是在波兰人中制造恐惧，实行人质连坐。在每个小区纳粹指定人选，这些人每隔几周轮换一次。他们负责向波兰警方或德国人通报躲藏在该镇的犹太人，如果知情不报，人质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每个人都积极摆脱犹太人。和杨·格罗斯的《邻人》一样，他的这一著作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波兰形象的玷污。

在纪录片中，格拉博斯基强调，耶镇屠杀里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如果仇恨是一个人恨另一个人，那么在耶镇的谋杀里，更多的是冷血谋杀，并非有多少愤怒在里面。其中，贪欲是一个重要动力，杀死犹太人可以得到物质好处，这对穷人就够了。而格罗斯则指出，种族灭绝中熟人暴力是一个普遍的模式。基于种族、宗教和后天培养的敌意，仇恨很容易被挑动起来，转化为非常个人化的残忍性。他们的评说涉及到大屠杀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在那个历史时期，道德失范，人们对杀犹太人不再有犯罪感；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一直延续到战后。

以色列大使韦斯的故事，代表了波兰人在战争中的另一真相，这是片名【两个谷仓】的含义。战争开始才 4 岁的韦斯，有三年时间和家人在波兰邻居的阁楼、马厩、私人祈祷室里找到藏身之处。在耶镇屠杀真相引爆公众舆论的激烈气氛中，他就任以色列驻波兰大使。他与波兰总统并肩来到耶镇，参加纪念犹太人遇难日的仪式，他也讲述了自己得到救赎的故事。有位帮助过他们全家的波兰邻居，她不仅要防着德国人和其他邻人，还要防自己的儿子；因为她儿子是警察，他的衣服上沾染着杀害犹太人的血迹。救助犹太人的邻人除了冒着生命危险，还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韦斯亲临当年藏身的现场，讲述了救助者的义举。一位波兰女人让她 12 岁

的小儿子做帮手，每天将八个人的粪便带到河里倒掉。多年之后，他见到了拯救了他的波兰老人的孙子，给他过世的祖父母颁发了国际义人奖。他说：「那是黑暗中的闪光，它成为人类道德的灯塔，不能也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影片最后向每个人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几乎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格罗斯认为，这样一种生死考验，是不应该让人们经历的。如果迫使他们身临其境，残忍的事情必会发生。

总的来说，这几部纪录片把与格罗斯《邻人》的学术对话转化为了栩栩如生的影像叙事，让我们从耶镇的实景、老人的回忆里建立起对历史事件的知识；也让我们进入到研究耶镇惨案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看他们如何顶住压力，揭秘大屠杀的真相和人性的变异。

玖、影像对话之二——死者魂灵的回归（《沉默的共谋者》）

格罗斯的《邻人》激起的公众讨论，在电影艺术家中也启发了故事片的创作，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故事片是瓦迪斯瓦夫·帕西科斯基（Władysław Pasikowski）作为导演和编剧的故事片 *Aftermath* (2012)，中文直译片名应该是【后果】或【余波】，该片入选2014年台湾电影节的意译片名为【沉默的共谋者】。

瓦迪斯瓦夫·帕西科斯基生于1959年6月14日，他毕业于罗兹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和罗兹电影学院导演系。1991年他完成第一部电影【逃兵】(*Kroll*)，在波兰电影节获最佳首部电影及特别评审奖。帕西科斯基擅长讲故事，他还写过科幻小说，得到获奖提名。他擅长拍摄动作片和电视惊悚片，他导演的电影作品翻译到中文圈的有【华沙谍战】(*Jack Strong*, 2014)。此外，他也是安杰依·瓦依达著名影片【卡廷】的联合编剧。

【沉默的共谋者】经过了几年的酝酿，2005年影片在申请波兰电影研究所资助时遭到拒绝，因而在媒体上引发争议。它最初的片名是 *Kaddish* (*Kadisz*)，意即犹太教中每日作礼拜时或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帕西科斯基说过：这个剧本最直接的灵感就是杨·格罗斯的著作《邻人》。在媒体评论中，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没有获得资助，片中包含了太重

要的波兰历史信息。尽管如此，人们都认为，必须有一部关于耶德瓦布内的波兰电影。帕西科斯基说，耶镇屠杀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绝不可能不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就算我现在不拍，很快就会有人来拍，说不定就是美国人来拍了。」(Pakier, 2013, p, 160)。

帕西科斯基后来在波兰著名的独立制片人亚布龙斯基 (Dariusz Jabłoński) 那里得到了资助。亚布龙斯基也是罗兹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他是波兰电影奖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也是独立电影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在 1990 年创办了苹果电影公司，这个公司支持和推广了很多独立导演的作品，也与欧洲电影界保持着活跃的交流与合作。

在前述纪录片【两个谷仓】里，亚布龙斯基接受采访说，当他拿到帕西科斯基的剧本时，他不敢相信故事有真实依据：「我认为这个剧本在某些方面是走得太远了，然后我去找历史学家。我说，请你们直言不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剧本是不是可靠的？接着我大吃一惊，他们说：这个剧本的各个方面，你都能在某处、某个地方找到真实依据。我还得说，我从这些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例证比这个剧本更骇人听闻。」他认为：必须清楚地讲出这一切，不加任何掩饰。因为这种邪恶应该被认识到而且得到准确表述。

帕西科斯基如愿以偿，他在通俗电影类别里驾驭了这个主题，而且独辟蹊径地展开故事：死者从未离去，今人面临种种后果。过去终有和现在碰面的时刻，通过一个接一个偶然的遭遇，村庄里人们沉默被打破，出现了探索秘密的兄弟俩。

影片开始于哥哥弗兰尼克的返乡之旅。他离开波兰家乡二十年了，连父母去世都没有回来告别。那还是在共产主义的波兰，他不想回家被追究，也不愿意牵连家人。如今他的弟妹突然带着儿女到芝加哥来投奔他。于是他启程还乡，想弄清弟弟约瑟夫是怎么回事。

在接近村庄的一片树林，弗兰尼克像中了蛊一样跑到树林里找东西，结果撞到树枝上。再回到路边时，旅行箱丢了。接着，怪事连续发生。进了家门有人砸窗户；在咖啡馆里，弟弟被暴打。小警察告诉他说他弟弟约瑟夫破坏公路，村民恨不得把他搞死。兄弟俩到银行为种地贷款，经理不给办手续，说他们没法证明土地是他们的。两人说过去不是一直在这里贷款吗？经理

说：时代变了。弗兰尼克再跑到市里想把事情搞清楚，结果又有人找上来揍他。

从土地的权属问题，有背景知识的观众已经会联想到耶镇屠杀的后果。接下来，弗兰尼克终于得知，这一切和过去村里犹太人有关系。在自家的麦地里，弟弟约泽克搬进来 328 块高大石碑，上面全部写着希伯莱文。约泽克告诉他，洪水过后，村民开始清理过去通往皮革厂的老路；在清理路面时发现了这些墓碑。战争时期，德国人毁了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老墓地，把墓碑当石头来加固路基，后来有了新路，这些石碑和老路都被遗忘了。还有村民拿这些碑来做门坎、井板，甚至用来盖厕所……

当约泽克听说人们还要用沥青来平整老路时，他认为不合适。他开始把路面上暴露的墓碑收集起来，接着又从村民那里买下来……就这样他花了大量自己的钱，把妻子也得罪了。在他家的麦田中心，一个犹太人的墓园逐渐成形。

也可以说，冲刷路面的是记忆的洪水；它要洗刷遗忘；把被摧毁的生命故事带回。但是，故事在这里设置了几个层面的冲突和翻转。首先兄弟俩有了冲突，哥哥觉得事不关己，而弟弟则坚持他安置墓碑的人道考虑。当弟弟逐步说服哥哥时，他们遭遇了村民的集体敌视和暗中报复。最后，逐步暴露出来的真相击倒了兄弟俩人：第一个翻转是，他们现在的土地原来都是村里犹太人的。不仅是他们，所有那些希伯来文墓碑上有名有姓的人都曾经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左邻右舍占有了这些土地。第二个翻转是，兄弟俩开始向老年村民寻找答案，最后在自己河边的老宅，挖出了遇害犹太人的遗骨：这里的 28 户三百多人全是被本村人杀害的。第三个翻转是，兄弟俩终于追到了当年点燃谷仓的凶手，并把他打倒；而老家伙爬起来咆哮着告诉他们，正是这两兄弟的父亲在谷仓另一边放火；而且他还抓住一个他追求未得逞的姑娘，狠狠地在地上砸，砸她的头，拧断了她的脖子。

在象征的意义上，两兄弟仿佛变成死去的犹太人的重影；房子外墙被涂污，他们被诅咒为「犹太人」；家里的狗被大镰刀割了脑袋；麦地里无端起了熊熊大火。犹太人遭遇的邻人暴力几乎要在他们身上重演一遍。而得知父亲竟是元凶之一，他们陷入了道德困境。面对自己在老宅经挖掘出来的受害

人遗骨，怎么办？面对村民和媒体，怎么办？良知和亲情对立，怎么办？而继续保守秘密至死，又是多么沉重的负担！约瑟夫建议哥哥一走了之，哥哥不肯，争执中两人扭打起来，刀斧相向。

这是承受真相后的良心压力，在影片中，它无法通过社会正义得到解决而走向了扭曲的自残。无奈中弗兰尼克踏上归程，又被村里的护士拦下车。他们一起来到一个旧的谷仓，推开门，出现血腥一幕：约瑟夫被绑在了谷仓的门上，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模样。

周围还是那一群沉默、阴郁的村民，其中拒绝讲述真相的老人摘下了帽子，这也许象征着冷血的解冻吧。还有片中那位允许约瑟夫将墓碑移出教堂的老神父，也代表了人性的开明和良知的涌动。片尾，一群远道而来的犹太人的后代们在拉比的带领下念诵 Kadish，这是在约瑟夫重新竖立起墓碑的田野里。弗兰尼克过来，点燃一盏蜡烛，沉默地放在其中一块墓碑上。犹太人的魂灵和他们的后代，和另一个时代的邻人的后代，在这片和平的气氛里重逢了。

有影评注意到，片子里其实没有出现任何战争场面，没有穿军服的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数据影像。它是从惨案的影响 / 后果来回溯过去的。理论上，人们可以假设罪行从未发生，全村的目击者都可以守口如瓶。但是，正如片中人的一句话：时代变了。在无知中承继了先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的人，注定在此刻遭遇无知的报复，这是责任感和良心面临的挑战。

【沉默的共谋者】在波兰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帕西科斯基认为这就是影片的积极影响。在接受《以色列时报》采访时，他说：「超过 30 万人前往电影院看电影，超过 10 万人购买了 DVD。这部电影一般都很受欢迎，它激发了对这个议题的集中思考和反省。」(Hoffman, 2013, October, 13)

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指斥它是反波兰宣传，恶俗操弄历史以谋取商业利益；也有的地方影院拒绝放映。扮演弟弟约瑟夫的演员甚至收到死亡威胁，他的形象在波兰周刊上被框在犹太星中以示嘲讽。还有批评认为，这部片子是自我指涉的，它并非关乎过去。它的艺术比拟有问题，即把今天正视历史的人遭受的敌意与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苦难混为一谈了；而且片尾的烈士形象也延续了波兰作为受害者的神话 (Pfeifer, 2014, June)。

但我认为，不能架空片子的叙事内容来引申其意义。毕竟，导演选择讲述邻人的后代的故事，这是进入历史阴影和社会心理创伤的独特角度。一方面他以故事片的创作自由再现了纪录片所不可能重构的人物和场景，另一方面他也呈现了弥合创伤的可能。这是格罗斯《邻人》的继续，也是解决问题的开端——正如制片人所说：「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修复他们的坟墓，他们的葬身之地散见于波兰各地的废墟。我们修复坟墓，在那里祈祷，请求他们原谅。」对于超过四十万的波兰观众来说，影片带来的情感冲击，正是重建当代社会历史记忆的起点。

拾、代结语：进入燃烧的谷仓

格罗斯《邻人》出版迄今已经超过十八年，2017年才有了中译本，我读到去年出版的中译本，开始注意到他的论题。中文圈里对《邻人》的书评不少，不过，很少见到对这本书相关影响的延伸阅读以及扩展研究。

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来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一系列读书（看片）笔记，相对于格罗斯的五年研究，相对于《邻人》出版以来在波兰国内外持续至今十八年的公众讨论，只能算是匆匆浏览了几个重要的页面。《邻人》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资料，十几年来受到大屠杀研究领域各方面历史学家的检验，我还远没有读完所有的批评响应。因为，我这里写出的感言只能算是这一系列笔记的结尾，而不能作为结论。然而，作为历史悲剧的记录者，我希望学习格罗斯的研究方法；作为关注转型正义的读者，我也觉得这本书依然很重要。

格罗斯第一次提炼了「邻人」这个概念，使之成为一个分析范畴。它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灾难，实有普遍意义。从土改到文革，从北京大兴屠杀到遍布全国的大型武斗……或者，仅仅只是读一读《炎黄春秋》上湖南道县大屠杀幸存者周群自述¹³，还有新浪博客上王德邦有关广西桂林武斗回忆以及2017年桂林洞穴探险队进入东山坑勘察七十多位被杀害村民的

¹³ 陳秉安整理，參見 <http://psce.pw/J9GGH>

图文《天坑 - 93 条人命》¹⁴就能理解，类似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名的邻人灭门、灭族的血腥暴力，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发生得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格罗斯之后有历史学家 Jeffrey S. Kopstein、Jason Wittenberg 扩展了「邻人」的概念，他们用「亲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的概念来分析种族暴力和大屠杀，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解释。作者将暴力的根源定位于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统治地位的努力，而不是反犹太主义仇恨或对共产主义的报复。我们可以看到，亲密暴力的概念，原来主要用于定义家庭暴力中的熟人和伴侣关系之间发生的暴力；扩展开来，可以有更大理论张力。也许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其熟悉程度上再细分出相同又有差异性的范畴，例如邻里、校园、职场以及族群关系中的暴力。

在这些熟人关系之间发生的暴力，让我们思考另一个在研究大屠杀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在广西、在湖南，把邻里乡亲全家灭族推下天坑的人，并非天生作恶的杀人犯。一个令人惊愕的逆转就是幸存者周群后来再嫁的大队书记，他自己就参与过当时的暴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此不会陌生，个人、家庭和小区，也能够不同的政治环境和话语里修复关系，平复创痛。正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句——纪录片【两个谷仓】以此作为结束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战争 战争 战争
但是在战争之间有中场休息
立正——坏人
稍息——好人
立正——创造破坏
稍息——努力工作建房子
赶快搬进去

辛波斯卡 《这里》

¹⁴ 參見

<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vt=4&cid=169938&articleId=3c39efc70102ykb2>

在辛波斯卡的诗里，人的生命在善与恶的两极之间流动；改变一个姿势非常容易。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被卷入那破坏的烈焰，你平日的邻居、朋友、社群伙伴，在某个时刻（例如西安反日游行）突然对你暴力相向；那岂不是比外族入侵、战争爆发更有毁灭性，因而也更令人恐怖？这就是「普通人」包括格罗斯的《邻人》在大屠杀研究中的理论意义。Małgorzata Pakier 博士在《欧洲大屠杀记忆建构：1989 年后的德国和波兰电影》一书中阐明了这一点，她写道：

在 1989 之后，普通人这个观念作为有关大屠杀的话语范畴，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它的增长标志着在德国和波兰的历史讨论中有了根本变化。在德国，这一类别与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布朗宁《普通人》(1992)（中译本为《平民如何变成屠夫》，张孝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一书引发的对大屠杀的犯罪和责任问题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有关，同时也与另一展览有关，这个展览是「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年-1944 年」（歼灭的战争：1941 年至 1944 年德意志国防军的罪行），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于 1995 年组织。在波兰，「普通人」在大屠杀期间的负面作用这个问题首先随着波兰历史学家扬·格罗斯出版《邻人》（2000 年）而引起公众辩论。

我在前面介绍的与《邻人》相关的纪录片和故事片里，看到的都是普通人的形象。当然，普通人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变成杀人凶手；但是，人性的脆弱和败坏在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尤为常见。在这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煽动仇恨、制造分化并激化其对立，还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拉大等级距离，以多数和主流人群的需要压制和阻隔少数人群——越是在这样的小区，越容易发生大屠杀。除此之外，对罪恶的沉默和不关心他人命运，也足以使这种恶得以畅行。这是另一个问题，也是安娜·比康特在：《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一书中重点探讨的，这本书也正是上个月出版了中文简体版（季大方译，2018）。

前述影片【沉默的共謀者】的一位影评人 Moritz Pfeifer 这样评价了格罗斯《邻人》的深远影响，他说：每过几十年，就会有一本书，它显示出的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受过霍华德·辛恩 (Howard Zinn) 的《人民的美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教育的学童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对美国统治者的功绩比他们的父母更带有批评倾向。同样，波兰儿童最有可能对他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受害者的角色有另一种看法，如果他们是由 Jan T. Gross 的《邻人》这本书作为指导的话。¹⁵

在波兰，情况正是这样。《邻人》出版十年之后，一位行为艺术家做了《燃烧的谷仓》这个作品。2010 年 7 月 11 日，艺术家拉斐尔·贝特勒犹斯基 (Rafal Betlejeski) 在波兰中部的扎瓦达 (Zawada) 村焚烧了一座事先建好并装置在田野里的谷仓。面对一千多围观者，他说：

十年前，在 2000 年，杨·格罗斯出版了他的著作《邻人》，这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他让我认识到我完全不了解波兰犹太人的历史，不了解他们有多少人在波兰生活过、他们对波兰文化的贡献；**我也不了解大屠杀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能理解大屠杀；为什么我们不谈论这些。**

拉斐尔·贝特勒犹斯基把这种无知称为「典型的波兰人的愚昧」，他邀请愿意像他一样与这种无知的自我告别的人将名字告诉他，由他写在一张张白纸上。他带着这些名单，进入谷仓，将这个没有读过《邻人》的自我、十年前对历史一无所知的自我彻底烧毁，从而宣示：「我，作为波兰人、天主教徒，我有能力换位思考，即我能够改变历史给我的位置—那个位置是在谷仓的外面，手里拿着火炬—将自己置身于谷仓内部。」

在浇了汽油的谷仓内，艺术家点燃谷草和白纸；整座谷仓迅即烈焰熊熊。在广袤的田野里，燃烧的谷仓成为一个耀眼的火炬。这是与谎言和愚昧誓不两立的火炬，是年轻一代重新定义历史和权利的火炬。

¹⁵ 參見 <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掩卷沉思，在掩埋了大量历史事件的此地和依然面对谎言和压制的此刻，作为研究者和记录人，不能放弃努力。这是为了将来重建我们的历史记忆，也为了那些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亡灵。

参考书目

- 季大方译 (2018)。《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祝馨译 (2017)。《邻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原书：Gross, J.T.[2011].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薛雍乐 (2018年1月28日)。〈波兰议会立法拟禁止指责波兰人参与纳粹屠犹，被批否认历史〉，《澎湃》。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2173
- Cienciala, A.M.(2013). The Jedwabne massacre: Update and review. *The Polish Review*, 48(1), 49-72.
- Hoffman, J. (2013, October 13). The film Poles don't want you to watch debuts in the US. *The Times of Israel*. From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he-film-poles-dont-want-you-to-watch-debuts-in-the-us>
- Pakier, M.(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holocaust memory: German and Polish cinema after 1989*. Peter Lang. From <http://libgen.io/book/index.php?md5=D95CFA7B89A049DF88E161EED2DF476D>
- Pfeifer, M.(2014, June). Poles and the Holocaust. *East European Film Bulletin*, 42. From <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 Rogers, M.T., & Hundt, A.(1980). *Yedwabne: History and Memorial Book(Poland)*. From <https://www.jewishgen.org/yizkor/jedwabne/Yedwabne.html>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
评介德布雷的媒介学与《普通媒介学教程》

唐士哲*

書 名：《普通媒介學教程》（簡體版）
作 者：雷吉斯·德布雷（陈卫星、王杨译）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出 版 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

本文引用格式

唐士哲（2019）。〈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评介德布雷的媒介学与《普通媒介学教程》〉，《传播、文化与政治》，9:123-134。

投稿日期：2018 年 10 月 14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 作者唐士哲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e-mail: telsct@ccu.edu.tw。

1916 年，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两个学生将老师生前教授的课程讲义集结成《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出版。书中高举语言不仅是服务人意识的工具，而是人类社会互动的集体性产物、蕴含社会价值体系运作的符码。索绪尔身后的立论影响所及不只语言学，还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但「语言学」激起当代思想涟漪的机缘却非立论者本人，而是传承者 Charles Bally 及 Albert Sechehaye！若非两位弟子将教程讲义编纂成书的形式发行，教程便只是尘封于某不知名图书馆的档案夹里零散的讲稿。

不难想见一本书同样取名为「教程」的书引发的联想。在人文思想「向语言转」的列车行过 20 世纪的大半后，出现了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的《普通媒介学教程》(*Cours de Médialogies Gēnērale, Debray, 1991* ;陈卫星、王杨译, 2014)。以思想的社会史格局，德布雷在书中大谈这种立论与传承的关系，并试图以「媒介」概括这种关系。德布雷以「媒介学」(mediology) 在人文社会学科里另起炉灶，将媒介视作文化得以传承(递)(transmission) 的生态系(亦参考 Debray, 1997)、一个社会后勤学的主题。即便甘冒无中生有之评，德布雷仍力陈媒介应作为一门跨领域、但独立的探问。

壹、德布雷其人其事

集革命份子、记者、国策顾问、社会科学家、政治哲学家、艺评家与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德布雷是斜杠志业的先行者。1960 年代初期，德布雷就读高等师范学校时，是路易·阿图赛 (Louis Althusser) 的学生。之后他来到古巴，与卡斯特罗交好，并任教于哈瓦那大学。他关于武装革命的组织策略小册为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所采用，两人因此开始密切接触。1967 年时，德布雷出版《革命中的革命？拉丁美洲的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Armed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1967*)，主张拉美左派的解放运动应与斯大林教条主义划清界线，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扬弃政党、阶级与都市路线，由乡村发起自主独立的工、农游击战。同年，他赴玻利维亚，加入格瓦拉的游击队，但在格瓦拉

遭处决前不久，他被当地政府军逮捕，遭判刑 30 年。德布雷被囚禁时曾引发跨国救援潮。除了惊动当时的教宗，西方世界公知如鄂兰、沙特、I. F. 史东、杭士基、巴特、阿宏等人联署为他奔走请命。身系囹圄近四年后，德布雷才被释放。

德布雷随后出走智利，出版了一本阿叶德 (Salvador Allende) 总统的访谈录，在阿叶德政权遭皮诺契特 (Augusto Pinochet) 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后，返回法国。1980 年代初，德布雷被密特朗总统延揽担任外交与文化事务顾问，但几年后因理念不合请辞。他批评密特朗表里不一，任内的政策早已偏离标举的社会主义路线与共和的理想。与密特朗分道扬镳后，德布雷的公职生涯并没有因此结束，他也曾在齐哈克政府主政时期进入法国的「国民议会」。

前半生见证拉美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衰败，后半生的德布雷潜心研究，五十多年间的思想围绕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宗教与国族主义，以及思想的媒介学等主题 (Vandenberghe, 2007)。他独创的「媒介学」无疑是标举他近期间荡学术社群最鲜明的印记。德布雷的媒介创见最早出现在《当代法国的知识分子》(*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1979/1981) 中，他探讨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思想领域出现的结构性转变时，开始使用「媒介学」这个字眼。《普通媒介学教程》于 1991 年问世后，他号召同好，提倡媒介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于 1994 年完成博士论文，论文内容集结为《媒介宣言》出版 (*Media Manifestos*, 1996)。他创办期刊《媒介学笔记》(*Cahiers de Mediologie*)，集结了当时法国钻研媒介技术主题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 Michel Serres、Bernhard Stiegler、Bruno Latour、Pierre Lévy 等人。每一期的《媒介学笔记》主题环绕在一个特殊的媒介对象上，发行了十八期的《媒介学笔记》陆续探讨了道路、框格、纸张、脚踏车、纪念碑、音乐等主题。

在一系列以媒介为名的著作中，《普通媒介学教程》应该可以算是触及面最广的代表作。虽然书名为「教程」，德布雷另辟蹊径，不谈意义如何再现，而是突显使得符号象征得以传递的脉络。索绪尔的符号学主张「能指」(signifier) 与「所指」(signified) 构成诠释表意行动的二元模型，但德布雷批评符号学忽略了构成表意关系成立的关键第三方——即表意行动发生的

物质环境。而「媒介」一词，便成为串起符号象征与物质环境的关键中介场域。

贰、作为探索「传承」的媒介学

媒介学关切的既非有形有体的「传播媒介」，也不是窄义的、以人传递讯息为主的「传播」或「沟通」行为，而是任何在意义生产的黑盒子里，介于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环境 (milieu; Debray, 1997, p. 7)。对于历史过程以及技术对象的看重，使得德布雷区分了「传播」(communication) 与「传承」(transmission, 或译「传递」) 的差异。¹德布雷认为传统的传播研究着重于可见的媒介传播如何处理讯息在短时间内于空间的移动，但这仅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中的片断。」(Debray, 2000 / 刘文玲译, 2014, 页 5)。讯息除了透过媒介在空间中传递，也在时间的流逝中传承下来，沉淀为意义、文化，可是这层意涵却始终为目光短浅的传播研究忽略。因此，他疾呼研究意义传承的重要性。

传承涵盖甚广，可以展现在所有表现集体记忆的事物，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传承同时探索连结的空间与时间意涵：这里与那里的连结形成网络，构成了「社会」；而过去的与现在的连结则是延续成为「文化」。因此，传承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传播只是传承的一个面向、一个短暂的命题。但传播与传承互为表里，传承得以持续不中断，先决点仍是倚靠特定的传播技术或行为，就像福音教义散布的前提是耶稣与弟子的谈话，以及他的传道过程中、面对异端邪说的指责时的响应。但耶稣基督的话语是一时的，话语成了福音则是因为讯息的传承得到了制度性的庇护 (institutional housing; Debray, 1997, pp.10-11)。

当关于媒介的探问由传播移转至传承（但同时也包含传播），由制造或接收讯息的个体转移至个体间连结关系的时间与空间脉络，德布雷得以扩展媒介学的探讨范围。引发他好奇的不是讯息的内容本身，而是讯息得以被传

¹ 参考德布雷的另一本中译著作《媒介學引論》(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劉文玲譯)。該書中，譯者劉文玲將 transmission 統譯為「傳承」，藉此詞的歷史指涉與「傳播」(communication) 有所區隔。

递，乃至产生集体的凝聚力，其背后的一系列物质性过程。德布雷关切的核心问题是：**思想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物质力量？**

德布雷将生态学方法的规则，用于观察思想的传递过程。他认为观念不应被当作事物看待，观念犹如生物机体，无法独自存在，总是与一个群体的生存环境相连。因此，媒介学想要研究象征现象与物质技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2016，页 61）。两千多年以前那撒勒人如何成为今日被顶礼膜拜的耶稣基督？巴哈的音乐如何历久弥新？这其中牵涉到种种传承的手段。当想法成为主义或信仰，其耀眼的光晕让人忽视这些历史过程，但即便如此，所谓超越物质或肉身的精神，只有透过文化对象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其传世的踪迹。

因此德布雷主张：精神世界里没有身后的世界，有的只是制度的总和（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2016，页 61）。思想（宗教的、政治的）要在空间里传播，以及代代传承，靠的不是内涵本身，而是一整套技术配件、传递路径，以及人为制度建立搭配产生的结果。亲炙言教身教的使徒屈指可数，但观念的爆发性扩散，往往倚赖并没有承载观念的其他实体：裹尸布、篆刻经文的石板、墓志铭、纪念碑、教堂里一扇彩绘玻璃窗，乃至广场上人手一册的小红本子，这些象征物件，是肉身灭亡后，意识复活或存续的物质性痕迹。换句话说，一个思想活动无法同纪录、传递和储存的技术条件分开。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透过对象产生的关系，总是和环境相连（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2016，页 266）。

构成观念具备号召力的物质条件，同时结合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其一是「组织化的材料」(organized matter)，其二是「物质化的组织」(materialized organization)。

「组织化的材料」是将精神物质化的工具，调和了语意的模式（使用的符号型态是文本、影像或声音）；传输、播放或导引的型态（线性、辐射、炼结或网络化）；物质基础（石头，木材，莎草、纸张或电波）、交通手段（人或讯息是透过道路、车辆，或特定基础设施，范围较大的体系或产业等）（Debray, 1997, p.12）。透过不同的组合方式，组织化的材料是观念或思想的载体，它们发挥的影响力，甚至远大于内容。

「物质化的组织」则是上述这些因素的串连与部属。例如教会作为宗教的组织，链接了教堂、印刷圣经出版、神学研究组织、慈善团体等常态性活动。「启蒙」作为欧洲近代思想体系，建立了新的理性秩序，但启蒙算不上是政治思想的集合，而是产生于旧的社会惯例与新的措施碰撞后产生的新界面上 (Debray, 2000 / 刘文玲译, 2014, 页 174)。而马克思的思想能够启发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就无法不去注意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人教育的三个基石：免费的学校教育、大量生产的书籍，以及便宜的报纸。透过组织的网络化与部属，宗教、思想、主义等「精神性活动」才能够在不同的世代之间传承，以及在空间上达到扩散的效应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298-330)。

上述这两个因素的调和，构成了德布雷所称的「媒介域」(mediasphere)。相应于每一个观念的普及与传承，是环绕这个观念所形成的「媒介域」。它是一个信息和人的传递与传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应的知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每个媒介域都是已有作法和新工具相互妥协的结果，并嵌入不同时代的技术网络。每个媒介域同时也对应一个时、空组合的现实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261)。

一如技术决定论者惯有的、以纪元划分历史中社会型构的作法，德布雷区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媒介域，分别是逻各斯域 (logosphere)、书写域 (graphosphere) 与影像域 (videosphere)，分别以书写、印刷、与电化的视听媒介为核心。与技术论的形式主义者如尹尼斯、麦克鲁汉、基德勒等人不同的是，德布雷更在意由特定的思想建制如宗教、主义检视媒介技术所中介的社会过程。他的媒介域形同拉图 (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是承载与传递讯息或人的中间地带、环境或背景，媒介技术仅止于提供特定社会文化型态成为霸权的关键物质条件，而非单一成因。一如谷腾堡的活版印刷术并无法单独塑造西欧自十五世纪以后的变化，但随着印刷术而来的出版量激增、书籍的普及，以及大众的识读能力提升，则使得活版印刷加入已然量产的木浆纸张、纯熟的书籍线装技术，以及随后的蒸气驱动滚筒印刷，成为特定组织或文化型态得以崛起、观念得以擅场的主要诱因。

參、由「媒介域」体察宗教的世俗性与世俗的宗教性

在德布雷的媒介域分析中，信仰俨然提供一个检视思想如何在媒介域中运作的绝佳范例。德布雷分别由耶稣基督与卡尔·马克思，突显思想传承的物质力量，如何协助思想在媒介域的历时场景转换间窜升、延续或式微。基督精神的灵光（aura）既远且近，千年以来启发艺术世界透过笔触、线条、雕工将其独特性更往「人性」的身影拉近（Benjamin, 1936 / 许绮玲译, 1999）。马克思曾经视宗教为人民精神生活的鸦片，宗教的苦难既是人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的表现，也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然而马克思思想一如基督教教义，透过历史传承，都成了后世追随者的「信仰」。

以耶稣基督信仰为例，数千年的传承见证了信仰的制度化由逻各斯域迈向书写域的演进。基督信仰必须摆在犹太世界的历史长流中，方能窥其堂奥。

德布雷以犹太教为例，说明信仰世界中一神论宗教的形成，对应的是人在特定地域环境之下的生活经验。犹太教义里的神超越了人体的形象，成了「超验」的上帝，其实与沙漠中游牧民族的生活体验习习相关：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们，世代过着资源匮乏、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当生存面临危机，互助共生的父系体制、财产共有于焉而生。对于在极度干旱的地理空间里讨生活的犹太人而言，频繁的迁徙与逃难使得信仰生活具备高度的机动性，信仰生活中沉重的祭坛建筑或偶像雕塑对于帐篷的游牧者来说只是累赘（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280-288）。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铭刻的十诫与一只抬得走的约柜，成了耶和華交付信仰子民们世代信守的契约。戒律用字俭省，但蕴含寓意无穷的神秘文本之钥，等待先知、圣者与博学之士开启。「一神教就是以最小的神学体积获取最大的移动速度。」（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283）日后透过先知口述立法、讲道、编纂经文、法典等口语与书写文本手段，犹太教信仰得以在荒漠里传承下来。耶和華信仰在时间的历程中，透过不同形式的媒介化，终究逐渐固化、厚重。

耶和華信仰超越封闭的沙漠，成为普世的基督宗教，则起始于一个肉身媒介：后犹太教宗派的创始者、号称是救世主降临的那撒勒人耶稣。在没有更动旧约内容的基础上，耶稣透过讲道、肉身殉道，以及复活的神迹，感召了基督信仰的第一批使徒，他们同样因使用口语、散布当时被认为的异端邪

说而受到极刑的试炼，但一如耶稣基督，使徒殉道成了福音最具渲染力的宣传媒介。基督思想得以广为传布，得力于布道——生活化的故事、寓言，以及使徒们往来的书信。没有诘屈聱牙的神学辩证，福音运用浅显易懂的口语故事，迅速感召了社会上最底层的贫民、手工业者、女性与移民，向弱势阶级打开了通往天堂的道路。而公元四世纪时出现了装订的手抄圣经，则普及了上帝的话语，且使得新约终究摆脱零散的手卷，取得了像旧约一般铭刻的象征性权威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143-156)。

基督教传承的历史，成为德布雷不同著作中检视的范例，正如在《教程》中强调的，这个宗教的成功，在于它展现了传播的共同体功能。人类伟大的信仰产品，通常都是拓展集体组织的手段和工具。如果基督教的扩张足迹，有着令人赞叹的宣教历程，这个以教会为信仰核心的宗教，也陆续繁衍出帮助讯息扩散活动的机构、组织，以及等级化的权力制度，包括梵蒂冈、各级教会、修院、大学、医院、救济组织、慈善会等，层层交迭的组织化安排成了上帝与俗世之间维系信仰的「沟通界面」，透过这个层级分明的势力，基督思想可以扩散、流传。犹如教宗穿梭于不同的国度之间，成为国际政治坛坫周旋不可或缺的势力，「基督教正是通过在表面上完全的非政治化才能追求一个完全的政治化，即对全世界的传教征服」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152)。

犹如天主教会成为一个等级化的权力制度，是对应到其发展出来的媒介领域里特殊的工具、传播渠道、象征与制度化机构，同样启发精神的物质环境安排，也见诸于 19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起。德布雷指出：「一个「主义」不只是论题和信念的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生活环境、一个安全的掩蔽所、一个互助和社会保护的家庭」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162)。马克思的共产思想成为主义，乃至成为德布雷口中的「宗教」，倚靠的也正是十九世纪发达的书写域：免费的学校、人人有书读，以及便宜的报纸——这些因素成为散播工人阶级意识的铁三角。这其中特别是免费的报纸，同时扮演了宣传者、集体煽动者，以及组织者的角色。就像列宁透过《火星报》为党播种，左派思想得以生根散布，发生在这个报纸大众化的伟大世纪 (页 324)。透过有主张的日报，政党成为一个社团自我思考的场所，也正是这个

每天定时跟读者交流的阅读工具，一种思想得以日复一日地被社会化。

社会主义思想于 20 世纪的没落，也正起因于媒介域的汰换。德布雷为这个周期的衰退提供一个确切的事件：1968 年的「五月事件」，他认为从此之后，「书写域」被「图像域」取代。随着通讯与传播媒体的便利，个人关系的领域被扩大，也更加私有化。作为主义号召整体人群的文化后勤以及思想转化、扩散的媒介生态，已随着书写域的式微而不复返。德布雷主张要重振思想，就必须思考如何介入思想得以传递、散布的图像域。

肆、「传承」作为媒介生态的动力学

德布雷主张媒介不是传播的附属品，媒介研究不应只是电视、广播、电话、或是因特网等技术主体的研究，任何一个时空背景下的传播不能没有媒介，媒介学是含纳这些传播技术如何传递讯息、但范围更广泛的思想后勤学。

如果要以化约的「定义」浓缩德布雷庞杂的、犹如百科全书风格的思想史考察，媒介学关切思想传递的三个中介层次，分别是技术、文化与社会，透过这三个层次的交糅，思想得以扩散、传承。人说了话、一些人记了下来并复诵、转传，再有一些人转化为文字或图像纪录储存下来，这些纪录日后被复诵、复制、诠释、整理、档案化，乃至衍生出诠释的社群，透过社群成员跨越不同世代间的复诵、再制与辩证，累积成文化。对德布雷来说，思想总是对应到特定的物质起源或过程，即便技术或科技在传承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德布雷小心不掉入形式的决定论陷阱，亦即在单一技术形式上膨胀其打造或影响整体社会形态的主控角色。在德布雷对这三个层次的共构分析下，媒介成了一跨越时空的整体性的生态，对于中介各方社群成员过程的描绘，使得媒介学分析成了突显思想传承生态的动力学。

德布雷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正是实证导向的传播研究里始终失落的一块拼图。如果「传承」这个字眼所提示的传播研究的技术与历史意涵至关重要，它无疑在「传播与社会变迁」这个主题上，与过往传播社会学的功能论思维分道扬镳、另辟蹊径（见 McQuail, 1983）。回顾过往的传播理论进程，不论是发展理论或者是依赖理论，分析传播活动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往

往聚焦在微观的个别受众与共时性的行为趋势上。功能论假设受众对于大众媒介有依赖性，因此当代人类社会要图转型与发展，媒介提供大量、有用的讯息便成为必要的条件。换句话说，功能论将当代的大众媒介嵌入整体社会系统中，媒介的价值是「有用」。

但功能论的思维正是媒介生态变迁下的产物，其本身跳脱不出目的论的眼界。十九世纪以来，大众化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与电影的出现，大大扩增了人类的传播活动的范围与复杂性，也使得这个组织化的建制被当成国族国家政体下的一个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因此，发展主义将传播媒介的建制化，当成衡量社会进步的普世标准。然而，犹如传播史学者尹尼斯（Harold Innis）所言，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执着于一时的社会变迁，是犯了「只看当前」（present-mindedness）的毛病（Innis, 1935/1995）。文化即是关切个人透过时间与空间评估问题的能力，也赋予人在对的时机采取对的步骤（Innis, 1951/1984, pp.85-86）。人类使用技术传递讯息，解决生活问题、凝聚共识，乃至巩固特定的权力体制，是一个与文明状态相生相息的课题。传播实证研究为一时的社会之所需服务，却往往忽略了文化与技术。前者是历时性的积累产物、代代相传，后者则现身于人类生活中每一种创造性的意识活动过程里。媒介是意义的载体，透过媒介记载、保存与传递，文化底蕴方得以显露。如果我们承认这也是传播的课题，媒介研究的幅员本该何其之广阔！

德布雷的媒介学既不囿限于一时，也意图打破人 / 物的主、客体界线。人类学家牟斯（Marcel Mauss）主张精神与物质是所有事物的一体两面。牟斯发现电影发明以后，美国电影里女主角曼妙的姿势也开始影响法国女人上街时的走路姿态。身体机能有其社会性，简单如走路或使用圆锹挖掘壕沟，都有文化规范的痕迹。因此，「没有技术或传递能在传统缺席底下为之」（Mauss, 1935/1973）。在德布雷的宗教社会史分析里，先知、使徒、殉道者与传道者正是以身体为媒介技术，而殉道正是传承。人的身体既是器具也是技术，「身体的技术」正彰显了物质与精神、或意识与官能、自然与人文并非截然二份，而是互有连通。「传承」由宗教的社会史获得启发，其打破意识或思想的「人本」框框，着重传递过程的物质条件以及因为传递产生的社会连结。因此，德布雷也将「transmission」这个字眼多义化为讯息的传递（神

諭、基因)、病毒的传染, 犹如德布雷自承深受其影响的哲学家米榭·赛荷 (Michel Serres) 所示 (见 Debray, 1997 第三章的讨论)。

德布雷在教程中的第十讲〈一个公民媒介学提议〉中指出, 在当前由图像域主宰的年代里, 人类历史首次出现观念和表现的流通直接控制了观念的生产。自由社会中媒介舆论的生产, 已超出任何政治审查可以管控的范围。当政治不再是媒介的主人, 媒介反倒是成了决定政治的因素。德布雷认为在口语、文字沟通主导的「逻各斯域」(logosphere) 时期里, 上帝的权威建立在其不可见上, 然而到了今日的图像域, 权威的建立已经被可见性所取代。也因此, 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现的批判不能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 而是对支配观念和表现的机构的批判。德布雷的公民媒介学刍议, 因此定位在传递技术、象征功能与统治方式标准三者相互依存的集合。相较于布迪厄仍旧坚持以一个文人场域的自律性, 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典律的权威地位辩护, 并因此厉色谴责电视纵容的「速思」(fast thinking)、「能见度」对知识状态造成的象征暴力 (见 Bourdieu, 1996 / 林志明译, 2002), 德布雷反倒主张应该顺应媒介域的不可逆, 利用占统治地位的媒介其特定的传递优势创造新型态的媒体民主。

德布雷主张一个主权系统的运作, 同时包括象征持有者、政治控制者, 以及团体, 这三者透过媒介产生链接。以当代社会来说, 象征权力持有者扮演将私人信念公众化的角色, 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则扮演将公共信念私人化的角色, 以政治政权与资本势力为代表。前者关切公开, 而后者则在乎私有化。两方的肉搏战中, 媒介变成了枢纽, 媒介将思想行为转变成政治操作, 也将政治权力转变成知识操纵手, 透过媒介作为两方交会的节点, 共同指向一个目标, 即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在突显媒介学作为思想、主义、信仰传承、传播的后勤学之余, 德布雷对于台面上的「实体媒介组织」该如何增益知识信念的公众化与保障公民的权力, 着墨不多, 但《教程》末了这段话的剴切疾呼, 聊以作为德布雷的媒介 / 政治立场表态 (Debray, 1991 / 陈卫星、王杨译, 2016, 页 416) :

共同空间的国家管理不应该向任何个体利益或狂热让步, 否

则将自我毁灭，谁都不能作自我利益的仲裁人。

参考书目

- 林志明译 (2002)。《布赫迪厄论电视》。台北：麦田。(原作：Bourdieu, P.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suivi de L'Emprise du journalisme*. Paris, FR: Liber-Raisons d'Agir)
- 许绮玲译 (1999)。《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湾摄影工作室。(原作：Benjamin, W. [2007/1968]. *Illuminations*. London, UK: Schocken Book)
- 陈卫星、王杨译 (2014)。《普通媒介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原作：Debray, R. [1991]. *Cours de Médialogies Gënërale*. Paris, FR: Gallimard.)
- 刘文玲译 (2014)。《媒介学引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作：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FR: PUF.)
- Bourdieu, P. (1998).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London, UK: Pluto.
- Debray, R. (1997). *Transmitting cultur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bray, R. (1996). *Media manifestos*. New York, NY: Verso.
- Debray, R. (1979/1981). *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Paris, FR: Rams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UK: New Left Books.)
- Debray, R. (1967).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Armed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Grove Press).
- Innis, H. A. (1951/1984).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Innis, H. A. (1935/1995).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 In D. Drache (ed.),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pp. 429-437).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uss, M. (1973). The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 2(1), 70-88.
- McQuail, D. (1983).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 Vandenberghe, F. (2007). Regis Debray and mediation studies, or how does an idea become a material force? *Thesis Eleven*, 89, 23-42.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A Fake News of Taiwan's Martial Law Period:
Nanhai Blood Letter*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Zhou Xiaoping' s papers*

Research Notes

- *The Research Trends of Nationalism in Digital Era:
In the Cases of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ast and Present

- *Neighbor homicid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Régis Debray' s mediology and his book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Academic translation

- *Othr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rough constructing moral panics over
'im/migrant(s)' in the coverage of migration in three British newspapers, 2011-2016*